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Wealth

乔建新 著

财富的量化分析

——透视市场的真相



企业管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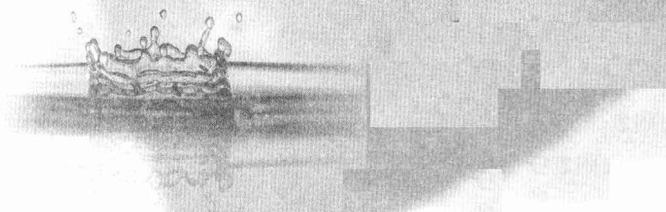
ENTERPRISE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Wealth

财富的量化分析

——透视市场的真相

乔建新 著



企业管理出版社

ENTERPRISE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乔建新著. —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7-80255-938-7

I. ①财… II. ①乔… III. ①经济分析：量化分析 IV. ①F224.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1929 号

书 名：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作 者：乔建新

责任编辑：丁 锋

书 号：ISBN 978-7-80255-938-7

出版发行：企业管理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 邮编：100048

网 址：<http://www.emph.cn>

电 话：总编室 (010) 68420309 发行部 (010) 68701638
编辑部 (010) 68701074

电子信箱：emph003@sina.cn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170 毫米×240 毫米 16 开本 15.25 印张 19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本书虽然就当前的几个经济热点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是，其初衷并不是在做专题的市场研究报告。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一方面，对于完成这几个经济热点问题的市场研究而言，本文所做的调查以及所掌握的数据仍然显得不够充分；另一方面，实际上本文最终目的也并不在于就事论事，而是希望通过对于这些经济问题的讨论，强调治学态度、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就是，在笔者看来，做市场研究，“方法决定结论，细节决定成败”。

目前，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流行的现象是，我国的一些专家总习惯于在一维逻辑的框架内，按定性的思维方式进行程式化的推理，对于复杂的经济问题，既不掌握分析模型，也不做深入细致的定量分析和市场研究，有的甚至仅凭经验、感觉、书本知识、历史业绩和学术地位发表观点。例如，对于股市、楼市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经常会使用泡沫、过热、通货膨胀等字眼，来提醒市场可能要出问题。然而，实际上泡沫或通货膨胀都不是一个绝对和定性的概念，而完全是一个相对的、需要量化的概念，并且任何测算泡沫和通货膨胀的指标也必须有条件。简单地说，测算与控制泡沫和通货膨胀需要做全面的定量分析，不能仅以孤立的单项指标做判断。

具体到我国的资本市场，国内普遍地认为“政策市”至今仍是主导，

而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换言之，政府的直接管理机构，即证监会的政策成为了决定资本市场运行的主要因素。表面上看，市场存在的各种问题，如市场缺乏长期的投资理念，投机气氛浓厚，以及中、小投资者的权益难以得到充分的维护，是投资者自身的问题。但是，其实这些问题与新股发行制度不合理、分红制度不完善、市场大起大落、运行不稳定密切相关，前者是结果，后者是原因。此外，还有市场制度不健全，违规交易不断，以及与国际资本市场比较，证券化率水平低等问题，如果“政策市”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其根源当然也在于政府的主管机构。

2007年12月，在谈到“资本市场教育首先要做监管者领导者教育”时，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刘纪鹏先生指出：现在所谓的教育者的教育，也就是对监管者的教育，这才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紧迫性要远远超过对投资者的教育。目前一些政策的反复都是由于种种不规范的监管部门的行为和言行造成的，而市场的很多不稳定正是由于一些朝令夕改的政策所致。中国股市到今天还是政策市。

如果说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可以简单地用“政策市”来加以描述的话，那么，对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特点，或许用“政策与市场的博弈”来描述更为恰当。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在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房价不断上涨是长期的必然趋势。具体说来，房价的上涨既有历史因素、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历史因素是政府在城市住宅建设上的欠债，短期因素与投机行为有关，长期因素则主要是随人均GDP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升级，以及城镇人口大量增加所导致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结果。其中，改善型的消费升级占据全部住房需求的76%。因此，虽然解决保障性住房存在困难，但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也只能缓解或者适度地减少商品房房价的上涨，并不能从根本上对其产生抑制作用。因为这

里面对的是两个市场和两个消费群体，所以商品房的缺口与保障性住房的缺口同样不能忽略，而限制不符合国情的消费升级应当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基本思路看，增加供给，限制非理性的投机性购房、开发商的暴利，以及房地产市场上的利益输送，是其主要的目标。而在此背后，又与一部分专家和经济学家对于消费升级和城镇保障性住房的巨大刚性需求、城市化所带来的新增人口的住房需求、土地资源的紧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周边环境建设的不足（尤其是大中城市中）、商业地产对住宅地产的价格拉动作用等问题的认识不充分有关。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很复杂，问题也很多。政府不断地出台各种政策，希望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但是效果并不显著。为什么呢？原因是，政府的决策咨询机构不了解市场，部分能影响政策的专家和经济学家观点不符合实际，我国存在学术危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了30多年，这其中，有我们的专家和主流经济学家的贡献。然而问题是，成绩属于过去，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的是新的思维、新的知识结构，甚至是新的权威。

上述在我国经济学术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看似孤立，其实这其中既包含有现实体制方面的因素，又有来自历史和文化两方面更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由于我国政府所属研究机构是长期计划经济的产物，从不参与市场竞争，一方面研究经费来自于政府，另一方面研究成果又服务于政府，所以，与国外的研究机构比较，其研究领域单一，研究机制、业务模式和服务流程落后。

其二，改革开放前，中国有近30年一直执行的是计划经济，因此，受此影响，我们的一些专家和经济学家过于传统，头脑中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则习惯于照本宣科和生搬硬套；而另一

些研究人员的经营理念 and 市场竞争意识差，工作效率不高，更缺乏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能力。

其三，学术风气不好、研究水平低下也只是现象，其背后必然与我国的教育水平、人才培养机制，以及用人机制等体制上的问题有直接关联。

其四，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基于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在这种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来的特性是定性、归纳、辩证，而缺乏做细化分析、定量分析和演绎推理的习惯。换句话说，与西方人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比较，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属于经验主义的，缺乏一种物理学的观念，即不善于从分析事物的产生、结构、机理、发展的动力、阻力、内因、外因、相关因素、影响因素、整体变化和局部变化等多视角、多维度和多层面出发，全面、系统和动态地分析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以防止通货膨胀为目标，关注的调控政策当然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忽略的是制度性的因素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因为，从协同论的角度看，这其实就是一个“输入”与“输出”的自调节问题：如果作为“输入”，政府过度地依赖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那么其结果必然是作为“输出”，市场就一直会频繁地在“过热”和“过冷”之间震荡。然而，如果作为“输出”，市场主要是由消费带动的，那么作为“输入”，政府宏观调控和防止通胀的压力自然就会减小。因为前者属于政府行为，后者属于市场行为。

2011年3月22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时说：“希望中国可以避免犯美国犯过的代价沉重的错误……与其说我担心通胀，不如说我更担心政府对通胀反应过度，做出很多愚蠢的决策。现实情况常常是政府出台应对通胀的政策，反而导致劳动力、食品、石油价格都不断上涨，通胀也因此加剧。”

由此可见，改善利益分配机制，让民众能从 GDP 的增长中分享到更多的好处，降低全民的储蓄率，促进居民的消费升级，引导信用消费，以及做大做强资本市场，鼓励民间资本和居民直接投资国民经济建设，应当成为改革的方向。在此，也许很有必要重温一下 1992 年邓小平南巡时说过的这句话：“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

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固然是发展我国经济的重要方面，不过，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还在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使我们的民族能够强盛，不受外来的欺辱。关于这方面，比较有权威的文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有关全球形势的年度报告——《国际形势黄皮书》。该报告已经连续出版了有 10 年之久。有观点认为，社会科学院 2010 年的这个报告视角广阔、人文色彩强烈，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与取向。然而，报告的主题，究竟是以阐述“综合国力”为主，还是以“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主，其结果完全不同。对于前者来说，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客观、准确地评价出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家实力才是问题的关键。

具体说来，首先，“综合国力”的课题完全是一项带有度量概念的“软课题”研究项目。因此，科学地建立系统模型，注重应用技术手段，做深入的定量分析，使研究结论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是必然的选择。其次，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作为一项大的科研项目，“综合国力”论本身就必然带有博弈性、整体性、层次性、相关性和持续性，其中，博弈性至关重要。在西方冷战思维和价值观输出的强权意识的主导下，只有当西方大国和非西方大国之间在战略博弈上达到平衡，世界才可能和平，中国的发展环境才可能安全。否则，抛开现实的国际环境谈发展，只能是一厢情愿。

由于综合国力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并且具有高模糊度的系统，所以，在研究方法上，不可能期望通过简单的数据列表和算术求合，来获得具有

科学性的结论，而必须运用系统科学和模糊推理的方法求解答案。另外，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研究人员所具有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团队整体的配合也必不可少。也就是说，除去需要具有良好的数学与军事知识以外，研究人员还必须同时在经济学、社会学、外交、文化以及战略管理方面成为专家。

多年来，由于在拉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政府投资、消费和对外贸易中，对外贸易一直占据最主要的部分。截止到2011年4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首破3万亿美元，其中2/3是美元。此外，我国还持有约1.1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此，既然在我国的国家财富中，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占据了相当大的成分，那么，由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形势必然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涉及到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更主要是面对由美国“次级贷”所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以及在近30年内，美国所一直采取的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们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观点，其中，在已出版的书籍中，仅中文版的就有几十种。不过，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只是单纯地运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或国际金融理论，分析由于短期利率和汇率的变化给国际贸易带来的风险及其对于各国经济所造成的冲击。或者，至多像某些经济学家所做的，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定性地审视这一现象背后的缘由。然而，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学者们的论证缺少的是由准确的数据所支持的、严谨的定量分析和完整的论证。

应当看到，美国是一个数学、科技、经济和金融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政府发国债、印钞票、制定利率和汇率、平衡就业和通货膨胀，当然会有准确的数据和完整的理论模型。但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能全面地深入到技术的层面，从美国政府制定

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基础，以及控制全球信贷流动的策略入手，揭示所发生的一切。

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金融经济，可以发现，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制度性的，起因源于其政府的实质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而中国政府面临的决策困难是技术性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有限。虽然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实际上并不容易被理解。

首先，如果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学家做一下对比，便可看到，美国的经济学家大都掌握良好的经济数学知识，所以他们具有理论创新的能力。而在我国，经济数学一般只掌握在少数数学工作者的手中，甚至是一些非常有分量的经济学家的数学基础其实并不强，因此，我国的经济学家也很难在经济理论或经济研究方法上有所成就。

数理经济学，包括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创建于19世纪70年代，属于量化的经济学，是经济理论、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三者的结合，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可操作性，以及预测功能，是当代发展最快的经济学分支，并且绝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对于经济理论的贡献几乎都集中在这个领域。因此，如果我国的经济学家希望赶超世界经济理论的水平，就必须在这个领域内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另外，在美国，早期的市场研究方法就已经具有学术研究的性质，并且，在市场研究的领域内，数学模型、统计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等也早已得到广泛的应用。而在我国，面对当前的股市、楼市、综合国力和美元等经济热点问题，绝大多数专家和学者论述问题的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注重经验，只习惯于定性的逻辑分析与推理；另一类是注重传统经济理论，知识结构狭窄。并且，一般说来，这两类专家和学者对于市场研究的了解都不深刻。因此，其结果便是，在学术观点上人云亦云，在研究方法上普遍趋同，在数据分析上粗制滥造，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物理学家钱学森也曾经说过：整个自然科学都可以看成是广义的物理学，因为无论是天文学、化学，还是生物学，从对象上看，都只不过是对客观世界、处于不同层次结构的物质的研究。由于客观物质世界的本质特征、运动形态，以及物质在相互作用与联系中所反映出的功能，都与物质所处的空间层次与结构紧密相关，所以，对自然科学的传统分类大多应以物质所处的层次、结构为依据。

综上所述，可以预料，如果通过认真地学习西方人在分析和量化方面的优势，并充分地结合自己在概括与归纳上的优势，中国人当然有希望能在西方人所创建的理论基础之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并将其成果应用于推进经济发展的实践。不过，能胜任这项事业的人，既不可能是单纯的数学家或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是单纯的市场分析专家，而只能是具有多重学问的“数理经济学家”加“市场分析专家”。

目 录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1
一、解读证监会的报告	1
二、政策市与圈钱之说——读懂政策心理	7
三、泡沫与通胀并不只是概念	17
四、技术分析与预测的方法	28
五、不懂股市的经济学家	40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43
一、质疑《经济蓝皮书》	43
二、推高房价的多种因素	53
三、测算泡沫的前提和条件	76
四、人口、资源与环境	88
五、少数派的观点	92
六、政策与市场	95
 第三章 有关综合国力论	 101
一、一篇前后矛盾的报告——中国发展了，排名却靠后了	101
二、战略博弈	107
三、为何要使用模糊推理	110
四、没有永远的权威	113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117
一、美元霸权和美国的“三座大山”	117
二、美元的本质	121
三、权力与利益的“三角形”——政府·美联储·华尔街	126
四、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132
五、计算美元泡沫	136
六、专家们的盲点	145
七、G2 时代与汇率之战	155
第五章 创新的含义	167
一、方法比结论更重要	167
二、量化流动性与价值评估	172
三、理论框架与发展模式	184
四、危机的根源	196
五、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奖	202
六、高级“智库”的对比	205
第六章 发展的逻辑	213
一、多元思维的模型	213
二、技术方法的共性含义	215
三、结构、动态、系统	219
四、机制、趋势、环境	221
五、行为与表达	223
六、有关定量分析	225
主要参考书目	229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一、解读证监会的报告

2008年2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由证监会主编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白皮书。与近年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经济蓝皮书》中提及股市的相关部分比较，该《报告》相对更全面。《报告》分为4个章节，约有14万字。参与《报告》写作的专家组成员有四十几位。同其他的官方出版物类似，由于作者的身份以及面向的主要读者群体是特定的，所以，除了全面以外，《报告》的特点自然是既简洁，又具有权威性。

不过，“山外有山”，如果希望将所要讨论的问题说得更深入、更透彻，也许有必要将我国官方的报告与国际上独立专业研究机构的报告做个比较。具体来说，因为受历史文化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两种报告除了在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上有所不同之外，两者在关注点、写作手法、服务对象和市场操作上也还存在许多方面的不同：比如，在关注点方面，作为管理者，我国官方的报告通常总是以诸如管理原则、管理目标、产业的发展历程、方向、成就和问题等作为其考虑的主要内容；在写作手法上，官方报告多采用记叙和陈述性语言，注重的是现象、事实、数据、趋势和

结论；在服务对象方面，官方报告的读者主要是其上级或同级的相关政府机构，当然也可以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在市场操作上，因为是政府开支，所以官方的研究机构不需要考虑市场竞争，报告出版也不需要担心成本和市场的销售。

而后者，作为国际独立的专业研究机构，其关注点自然是以市场为中心，写作手法多采用描述性和论证性语言。因此，除了全面和准确以外，其报告的内容还必须深入、细致、真实，阐述观点必须注重分析、推理，有论、有据，给出的结论和建议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在服务对象方面，国际独立研究机构报告的购买对象一般有两类，一类是由企业或政府部门独家订制的，另一类是面向社会公开销售的。另外，在市场操作上，由于没有政府开支，获取数据与信息的渠道也不如官办的研究机构方便，所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这样的机构必须有能力拿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否则读者就不会购买，公司也无法生存。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相对于我国官方的报告而言，国际上独立研究机构的报告会更难写。换句话说：因为官方的报告只是一份“总结”，所以它可能仅需要全面，不需要深入和完整；而专业研究机构的报告是一项“软课题”的研究项目，因此它必须既要全面，又要深入和完整。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运行态势，还能引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有一个现象，整个社会一直争论不休，那说明的是，人们缺乏使用建立在严格逻辑推理之上的“报告”的语言。

回到证监会的这份《报告》上来。进一步地说，如果以完成一项国家的“软课题”研究，或者以市场的可操作性为标准，例如，读者对象是准备投资于我国 A 股市场的外国资本 QFII，那么与政府所出的报告比较，专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业研究机构所能提供的报告应当如何来完成呢？很显然，这里首先需要做的是确定目标的主体，构建研究对象的结构层次、理清研究事项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然后再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与判断，最后给出结论，提出意见和建议。也就是说，如果同时考虑到学术性和可操作性两方面的需要，专业研究机构的报告还需要有更多方面的思考。当然这些内容哪些要纳入报告，哪些不纳入报告，是根据客户的要求而定的。这些方面的思考可能包括：

（1）政府直接和间接的管理部门都有哪些，其相互间的层次与关系如何确定，各自的职能是什么，已经出台了的和可能还将要出台的政策有哪些，政府主管部门制定了怎样的行业发展战略，政府管理对于市场的运行与发展起了什么作用，取得了哪些成就，存在哪些问题等等。而不是只讲证监会，不涉及其他政府部门；讲成绩多，讲问题少；只有问题，没有责任；只有措施和方向，没有进程和标准。

（2）上市公司的总体状况如何，包括上市公司的总体规模、扩展进程、行业结构、企业结构、股本结构、经济运行指标和财务指标等，以及企业上市和退市的总体情况如何。而不是只罗列现象，只有部分数据，没有完整的数据。

（3）交易机构的总体构成与规模、服务与运行状况如何，包括市场的交易品种、交易机制，券商的盈利模式、服务质量、交易成本管理、设备保障条件等，以及交易机构进入和退出的总体情况如何。而不是泛泛地一带而过。

（4）投资者的总体发展状况如何，包括投资者的规模、组成结构、持股结构、行为特征等，以及投资者进入和退出的总体情况如何。而不是只关注到了部分，没有关注到全部。

（5）市场运行与发展的总体状况如何，包括市场的规模、结构、功

能、效率、特点、运行机制、直接的动力与阻力、投资价值、风险和趋势预测等。而不是只有数字罗列和历史回顾，没有对于市场运行的总体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深入分析。

(6) 市场的外部环境与影响因素如何，包括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政府的宏观调控、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其他相关的市场，如股指期货、商品期货、金融衍生品和国际主要资本市场等。而不是只有单一的市场和政策，没有环境和其他影响因素。

(7) 其他对市场有影响的相关机构的总体情况如何，包括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媒体和从业人员等。而不是将这些相关的机构全部忽略掉。

(8) 在结论中，需要对于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需求，给出不同市场策略和决策建议。而不是只注重官方读者，不注重企业和社会读者。

(9) 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完全地满足客户的要求，使公司能够赚到钱。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写高水平市场调研报告的难度是很大的，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明显的现象是，许多报告要么只有文字，没有图形；要么只有两维的直角坐标图形或者表格，而没有能描述事物之间复杂逻辑关系的系统模型。八卦学说出自《周易》，《周易·系辞》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词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显然，八卦采用形式化方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由此可见，对于表达方法重要性的认识，古代的中国人已经做到了，然而当代的中国人却未必都能做到。具体来说，如果在报告中能使用一些框图来表明市场各相关事项之间的逻辑关系，或者是市场运行的传导机制，那么市场研究的工作就完全可以变得更为直观、清晰、简单和明了（如图1-1、图1-2所示）。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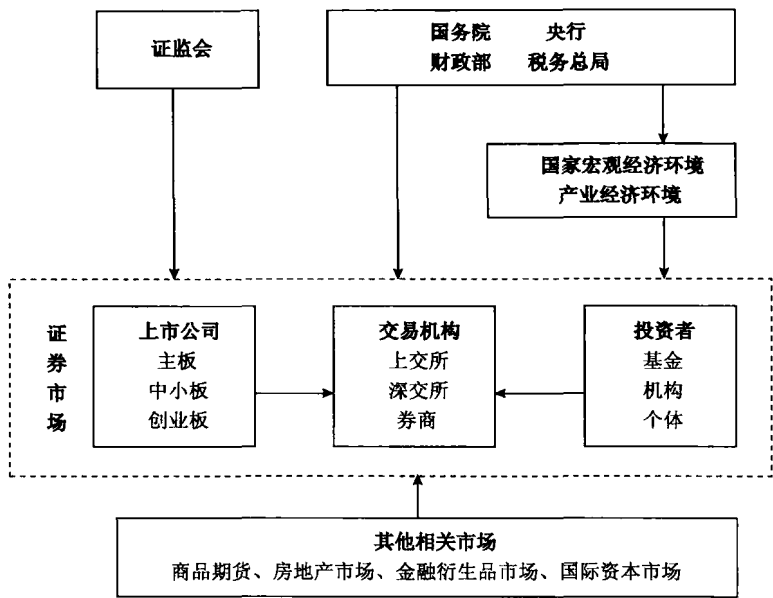


图 1-1 我国资本市场的结构及其相关的管理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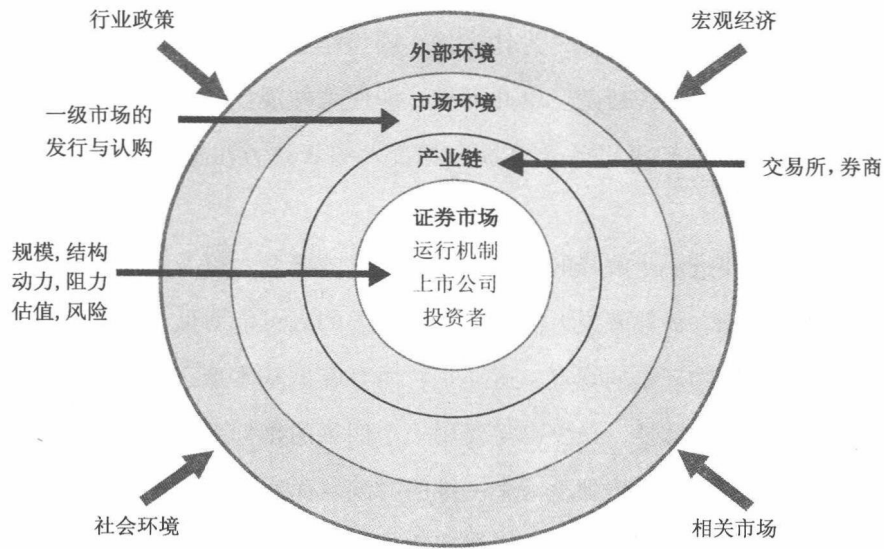


图 1-2 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与环境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由上面的图形还可以看出，用一个扁平结构的文章，描述清楚一个多层级的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从物理学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相互关联的、具有多层级的立体结构，并且，在这个立体结构中，各个节点间的能量交换、相互作用和信息传递，无时无刻地在进行，所以，为了认识这个世界，研究与表达的方法也必须依据相同的原理，这就是所谓研究与表达的方法论。幸运的是，作为宇宙间最高级的生物，其实人类的大脑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物质，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

进一步分析，以学术文章为例，现实中人们通常能看到有如下通病：一类是一维逻辑范围内的平铺直叙，基本没有数据、分析和比较，只有定性的推理、判断和结论，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作者是权威，而权威的观点当然不需要深入地论证；另一类是过多地使用层级，先有部或篇，再有章和节，然后是大一、二、三和小1、2、3，不够了再用英文字母A、B、C、D来补充，层次繁多、结构复杂、逻辑关系混乱，但内容匮乏；只有局部论述，没有整体和要点，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是学者，而学者就需要将定义、概念和层次说清楚。由此可见，即便是做现代的学问，除了需要掌握一点物理学的知识以外，学习一点古人的表达方法应该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所谓一维逻辑的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层次和结构的概念。一般来说，没有学过物理学的人可能对此了解不深。如上文所述，按照物理学的观点，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态和特性。世界上任何物质的运动属性，最少也需要用一个四维的坐标系来描述，即一个三维的立体几何空间，再加上一个一维的时间。而所谓一维逻辑就是只用一个一维坐标，如时间序列，来表示事物的属性，或者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一般的时序关系、逻辑关系或因果关系等。而不能系统地从分析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事物的产生、结构、机理、发展的动力、阻力、内因、外因、相关因素、影响因素、整体变化和局部变化等多视角和多维度，全面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

另外，一维逻辑与多维逻辑也是相对而言的。多维逻辑本身就是由多个、按横向展开的一维逻辑所构成的。简单地说，一维逻辑就是单视角和单维度；多维逻辑就是多视角和多维度。显然，一维逻辑并不能全面地揭示事物的整体发展和运动状况，更不用说涉及到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事物之间存在的相互作用与联系的描述了。现代物理学的统一场论所反映出的正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复杂性。此外，如果从物理哲学的角度看，除去运动以外，结构是物质与事物存在的另一基本属性，是物质与事物的空间构成。结构具有层次和多种不同的组合，可以显示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蕴涵着一定质态下的动能、规律、秩序与特性。所以，如果将物质的横向结构称为维度的话，那么，其纵向结构就可以被称为层次。

小结上述所言，此处希望说明的问题是，物质与事物在结构和层次上所蕴涵着的绝对不仅是数量上的变化，也有质的变化，并且，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复杂，而不是更简单。具体到市场研究方面，这里希望强调的有两点：一个是化繁为简，掌握事物之间逻辑关系的形式化方式；另一个是既有整体，又有局部，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整体结构，科学地设定分析问题的维度和层次。

二、政策市与圈钱之说——读懂政策心理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999年7月1日，我国颁布了证券法；2002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国9条”；2005年5月，资本市场的股权分制改革开始实施；2009年以后，我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国资本市场已经完成的多项改革包括客户保证金制度和第3方托管业务的建立、融资融券、股指期货、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推出，以及新股的发行上市。

从市场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资本市场运行与发展的驱动力以及影响因素有五个方面：①上市公司总体核心竞争力的变化；②国内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③政府直接和间接管理部门的政策；④世界经济的运行状况，以及世界主要资本市场的走势；⑤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由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引起的新问题等。

从1991年到2010年底，我国的上市公司已经由最初的14家发展到了2062多家，20年来扩大了140多倍，其规模每年扩大7倍；证券公司106家，总资产约2万亿元，管理客户资产约9.6万亿元；基金管理公司62家，共管理基金621只，基金总份额2.45万亿份，基金净值2.67万亿元；各类债券1552只，面值16.5万亿元；机构投资者持股（包括国有股和法人股）约占流通A股市值的70%；证券投资基金超过了各类投资机构持股总额的50%；投资者开户数约1.3亿户，持仓账户约为5500万户，其中持股市值100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者持股账户数占总数的99.4%，持股市值约占50%。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消息，2010年我国沪深股市A股总市值超过26.5万亿元，流通市值超过18.5万亿元，其中证券投资基金、保险资金、社保年金、QFII等机构投资者持有流通市值的比例约为48%，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流通市值比例约为52%，股票总市值全球第二，商品期货市场成交量居世界第一位。资本市场的证券化率，即上市公司总市值占GDP总量的比例约达到了78.6%，每年平均增速约9%，与GDP增速基本相当。这预示着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如股权分置给政府决策带来的困难已经得到了适当的缓解，我国A股市场步入“全流通”的时代已经到来。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与问题，国内比较普遍地认为“政策市”至今仍是主导。而所谓“政策市”是指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政府的直接管理机构，即证监会的政策成为决定资本市场运行的主要因素。存在的问题是：市场大起大落、运行不稳定、自行调节机制差、投机气氛浓厚、违规交易不断，市场结构与投资结构不完善，以及与国际资本市场比较，证券化率水平尚有较大差距等。如果详细地分析市场的这些特点与问题，其内在的原因在于：

(1) 推动市场运行与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没有主要以我国 30 年来经济平稳、高速的发展为原动力，股市也没有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政府管理部门的观念、管理水平和调控能力对于市场运行与发展的影响过大。

2010 年，A 股融资创出历史新高，融资额为 10 067.27 亿元，其中 IPO 融资 4 921 亿元，增发融资 3 708 亿元，配股融资 1 438 亿元，几乎达到了 2009 年总额的两倍。其结果是，2010 年中国经济增长列全球第一，但是股市跌幅却为全球第二。上市公司中蓝筹股，如银行的平均动态市盈率已经跌到了 8 倍左右，其投资价值约为年定期利率的 3 倍多，接近于国债的 2 倍，但是仍然不被看好。原因是市场缺乏信心，尽管有所谓“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说法。

那么，管理层为什么无视市场的承受能力和投资者的信心还要巨量扩容呢？问题的答案可以从相关人员只言片语的讲话中看出些端倪。例如，2009 年有证监会的高级官员表示：股市的功能就是融资，如果不能融资，要它有何用？其潜台词是，股市并不是一个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公平交易的平台，其功能就是圈钱。再如，还有官员称，国际上资本市场的年换手率平均在 100% 左右，比较高的韩国在 200% 左右，而 2007 年我国 A 股换手率在 900% 以上。其含义是，我国股市投机性过高的责任在于市场和投资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者，需要用巨量扩容来对冲。此外，又有评论说，管理层对于调控股市是很有经验的。对此，在2011年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栏目中，证监会某官员的表态也证实了这一点，称股市完全在掌控之中。

由此看来，这便成为了一种合理的解释，管理层既认可了政策市说法，又对此并不负有责任。因为，其一，对于一个过度投机的市场，作为相关的政府机构，其管理理所当然地要以控制股指宁低勿高为原则，低了没有关系，多发新股是业绩；高了会有泡沫，是责任。其二，目前政府实行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管理层自然要对上面负责，与政府的步调保持一致。如此，用大扩容压制住股指，无疑是顺理成章的，而此时估值的高低并不重要。其三，在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的大环境下，中国股市走势低迷当然也无可非议。至于相对而言A股的跌幅是否过大，那是属于宏观经济的问题，部门经济无需为此担忧。其四，既然已经实行了IPO的市场化改革和所谓的双向扩容，一切就应当由市场自行决定，与政策无关。至于这个双向扩容究竟是名义上的双向扩容，还是实质性的双向扩容，原则上管理部门没有责任。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当市场失去信心的时候，如果管理层仍然不能控制好IPO的节奏和规模，不对新股发行的融资量、“解禁股”上市的流通量、新基金中“偏股型”基金的发行比例做比较精确的计算，那么，此时虽然新股和新基金都在发行，但是，由于既存在投资者对于新基金认购和入市意愿的问题，也同样存在融资与扩容的匹配问题。这种情况就像一个医生为病人看病，他不能只管开药方，不管治疗效果。有报道称，2011年4月以来新老基金的认购情况一天比一天惨淡，有的日均认购额已经不足1000万元，而处在正常认购状态的250多只开放式基金，几乎每天都有新基金出现零认购的情况。

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这种现状，有经济学家的评论是，政策“管涨不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管跌”，与美国资本市场的“管跌不管涨”完全相反。而社会舆论的说法则更为尖刻，称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吸血股市”。另外，也有经济学家指出，资本市场需要扩张，需要用扩张来逐步化解货币存量过高的难题。虽然这种扩大直接融资的原则是正确的，然而，这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直接融资”不等于“直接圈钱”。换句话说，“圈钱”和投资者信心的问题不解决，货币存量过高的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因此，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既不可能是孤立的，也不可能是绝对的，更不能成为一种粗放管理的借口，而只能是相对的。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我国股市存在的这些症结呢？有专家指出了“一行三会”（中央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相互协调的重要性，即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应当只管融资，不管回报；只有上市，没有退市；只有双向扩容的实施，不看双向扩容的效果。进一步说就是，“一行三会”不能没有协调，各行其事。这其中更重要的是，证监会需要考虑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

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政策市”的属性其实具有更广泛含义，并不局限于资本市场。我国经济运行中行政干预过多的更基本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计划经济的思维、体制与惯性根深蒂固；其二，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其他改革相对滞后，对于行政权利约束机制并没有真正形成。而这又与各级管理机构的职责主要不是对市场，只是对上级负责有关。其表现是，现实中，所有的对于管理政策的质疑都不会有效果，任何实质性的变化都只能以物极必反的方式进行。

国内有业内人士指出：2001 年上证指数就已经达到过 2 200 点，至今 10 年多过去了，虽然我国的 GDP 增长一直保持在 9% 以上，成为世界第一，但是股指仍在 3 000 点左右反复振荡，10 年内上证指数只涨了 500 来点，涨幅仅约 30%。到 2011 年 9 月底，股指更跌至 2 400 点左右。与此同

时，“金砖四国”股指的涨幅却全都超过了 300%。对于股市长期低迷的状况，国内的许多专家和学者都认为，我国的股市存在制度性问题，这其中甚至也包含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数次评论。不过，涉及制度性问题，批评归批评，一切仍在继续。总之，从效果论的角度看，问题的实质最终还是管理体制和管理水平的问题。如没有观念上的转变和体制上的改革，同许多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我国股市的特殊运行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很难被改变。

2007 年 12 月，在谈到“资本市场教育首先要做监管者领导者教育”时，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刘纪鹏先生曾指出：①现在所谓的教育者的教育，也就是对监管者的教育，这才是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其紧迫性要远远超过对投资者的教育。目前一些政策的反复都是由于种种不规范的监管部门的行为和言行造成的，而市场的很多不稳定也正是由于一些朝令夕改的政策所致。中国股市到今天还是政策市。②对中介机构和上市公司的教育，对律师、会计师、证券公司这些中介机构和上市公司进行教育，远远比对投资者教育更重要。③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经营者进行教育。监管部门是掌握政策的部门，中介机构是政策的具体执行机构，上市公司则是市场运行中的主体，这三者都是资本市场中关键的角色。投资者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对投资者进行教育，其重点应该是如何倡导股市新文化，如何树立正确投资观。

2011 年 4 月 14 日，央行首次发布了社会融资总量的全新指标。业界专家称，社会融资总量指标既包括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也包括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该指标与 GDP 和 CPI 指标之间需要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有可能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新指标。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央行由此将可能改变以往仅以单项经济指标决定货币政策的做法，正在试图通过建立更完整的系统模型，来完善调控流动性的方法。由此看来，尽管央行的这

一举动已经过于滞后，但是，这毕竟还是表现出了我国的金融政策似乎正在逐渐走向成熟。

(2) 市场发展得快，政府管理部门及其出台政策所依赖的市场调研机构的人员素质和水平普遍跟不上。这一矛盾不仅存在于基层，也存在于高层；不仅存在于局部，也存在于整体。

首先，我国政府对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包括上市、发行、交易、增发、信息披露、结构治理、并购重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退市等，与其对于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和微观经济，即企业经济的认识水平有关。其中，涉及的问题不仅有产业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与地域布局的问题，也有企业所有制结构与企业经营效率方面的问题。换句话说，要管理好上市公司，还需要有更全面的理论、更完整的统计数据、更多的各类专家和更切实可行的政策。举例来说，有关退市问题，根据深交所投资者教育中心的数据，近十年中，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年均退市比率不到1%，远小于世界其他主要资本市场的退市比率。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退市比率为6%，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每年的退市比率大约为8%；英国AIM的退市比率约为12%，即每年有超过200家公司从市场退市。

一个成熟证券市场完善的退市制度不但可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对于市场的平稳运行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过在我国，数据显示，从2001年至2010年，A股市场曾有136家公司被暂停上市，退市后，其中的44家又转入三板市场。2006年股改以后，退市的上市公司仅有10家，数量明显减少。2011年“两会”期间，我国证监会的官员表示，证监会已经成立退市工作小组，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有关退市制度的问题。该官员认为，统一退市的制度应当借助建立上市公司退市问责制来解决。2006年深交所推出《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特别规定》之后，之所以很快就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其中存在利益的博弈。目前，虽然这一项工作看似

有了新的进展，但是其进程毕竟过于缓慢。由此所产生的影响是，在一级市场上，“热炒”新股的风气从来没有得到抑制；在二级市场上，“圈钱”也始终被认为是我国股市的一大特点。

另外，政府对于交易机构的管理与业务指导，包括交易品种、交易机制、盈利模式、行业集中度、业务准入和运营监管等，与其对于金融经济理论的认识和金融管理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有关。目前，与美国和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我国在这方面的不足是整体性的，并不只是局限于资本市场。因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主要是依赖于“劳动力红利”、管理体制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能源和资源的高消耗，以及高污染和对于环境的破坏，而不是依赖于理论创新和科技人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全员劳动生产力水平和教育水平没有提高，问题是提高的速度滞后于整体经济的发展。

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国内有业内人士提出了批评。2011年5月，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发表了“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制度缺陷”的文章。文章指出制度缺陷存在的几个方面包括：①资本市场是一个长期投资市场，但我们把它定位为融资市场，导致许多企业只融资却不回报投资者。是初始功能定位和制度设计错误；②发行制度不合理——发行价放开，但发行规模、行政审批等没能同步放开，股票在一级市场还是稀缺资源。是发行、交易、信息披露、公司制度等方面问题较多；③缺乏强制分红制度；④退市制度不完善。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最终结果是，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3) 管理层及其所属的研究机构缺乏对于资本市场的运行、价值、泡沫与影响因素做出科学和准确判断。换言之，管理层出台政策的理论依据不充分。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已经持续了30多年，2010年GDP总量为39.7万亿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元，比2009年增长10.3%，已经超过了日本，列世界第二位，但是资本市场的证券化率水平目前仍不足100%，与西方发达国家200%~300%的证券化率比较，尚有很大差距。究其原因，除去市场起步晚以外，基本点还在于不能科学地判断市场的运行机制、价值与泡沫。

此外，能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的其他因素，还包括商品期货、新闻媒体，以及其他相关的市场中介机构等。这其中，很容易被忽略掉的是新闻媒体的作用。在新闻媒体的有关节目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人云亦云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许多专家在被邀通过媒体发表意见时，大多是先知先觉，言必称泡沫。可是，对于如何定义泡沫，怎样科学地测算泡沫，却未见有人进行深入详细的分析。似乎只要股市大盘的指数或PE指标一高，就可以认定有泡沫了。难道问题真的会是如此之简单？

2011年2月4日，央视财经频道开始连续播出8集电视片《大市·中国》。该片由上海怡桥财经公关公司、证监会、深沪交易所和央视联合制作。在内容上，《大市·中国》以反映我国资本市场20年的发展过程为线索，揭示了资本市场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变迁的关系；强调了资本市场的特有功能，颂扬了资本市场20年的发展成就。不过，如果以全面、客观和深入为标准，该片的表现力明显不足。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创作单位的官方背景过重。另外，商务公关公司毕竟不是市场研究公司，况且，即便是专业的市场研究公司，其研究水平也还有高低之分。

(4) 既然有“政策市”和“圈钱”的说法，那么市场大起大落、投机气氛严重、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难以得到保护的责任就不在投资者身上，这才是其中的因果关系。

按资本市场一般的规律，风险与利润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稳健的市场上，多数股票的投资者可以获得高于债券投资的收益。可是，中国的股市却历来有“七亏两平一盈”之说。2001年，被称为是专家理财的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投资基金获批入市以来，似乎局面会有好转。但是，据有关人士统计，实际情况是，到2008年9月末，基金业累计投资亏损高达9625亿元。在8年的时间里，基金投资不但没有为投资者创造财富，反而吞噬了近万亿元的资金。2010年末，上证指数在2800点以上时情况虽然有些好转，但也只有少数基金的收益率超过了20%，远低于许多优质上市公司业绩的增长，而有约一半的基金业绩仅略高于CPI，此外还有20只基金的业绩跑输上证指数。表面上看，市场存在的各种问题，如缺乏长期的投资理念、投机气氛浓厚，以及中小投资者的权益难以得到充分的维护，是投资者自身的问题。其实这些与新股发行制度不合理、信息披露不对称、分红制度不完善、市场大起大落、运行不稳定密切相关。前者是结果，后者是原因。

有关理性投资的问题，美国著名财经专栏作家约翰·斯蒂尔·戈登（John Steele Gordon）在其所著《伟大的博弈》一书中写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理性的人是不存在的，信息完备也只是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可以接近，但却永远无法达到。……资本这个曾一度被称为“罪恶之源”的东西，实际上和劳动力、资源、技术一样，是任何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要害。”因此，单靠风险提示与风险教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还必须从铲除产生问题的根源入手。如果“政策市”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那么问题的根源当然也就在于政府的主管机构。

总之，要解决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种种问题，首先要有对于市场全面的分析和深入的了解，而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能依赖于高水平的专业研究机构，依赖于市场的竞争机制，依赖于优胜劣汰。当然，这种高水平的专业研究机构可以是官方所属的，也可以是非官方的，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因为两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三、泡沫与通胀并不只是概念

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市场有没有泡沫和投资价值，以及市场是牛或者是熊的争论从来没有中断过。其实，这其中既包含了一些基本概念的问题，也有量化标准的问题。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说明我国已经存在严重的经济泡沫，而诱发泡沫产生的原因就是我国长期的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货币政策，所以，控制泡沫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需要适当地提高利率。此外，另有类似观点认为，一方面，政府用直接投资、增加货币供给和提高流动性的政策措施来促进经济复苏，势必会引发通货膨胀，具体的反映就是 CPI 指数的上涨；另一方面，美国第二次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导致美元的持续下跌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由此引发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不可能通过紧缩国内货币的方式得以彻底解决。

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待上述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的是泡沫与通货膨胀在概念上的区别和联系。泡沫的概念一般是指，在生产资料的市场上，包括资本市场，资产价格的上涨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而通货膨胀的概念是指，在商品市场上，由于与 CPI 相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导致了货币的缩水，或称货币贬值。两者比较，虽然都与价值相关，但是，一个是用于描述或测算商品价值的，一个是用于描述或测算货币价值的。两者的关联是，资产价格的上涨最终也要传导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来。

以资产价格和一般商品为例，国内有学者认为，泡沫与通货膨胀在四个方面存在不同：①资产泡沫是指某种资产的价格相对于其价值的非理性上涨；而通货膨胀是一般物价的持续上涨。②资产泡沫是同期资产的市场

价格与理论价格之间的差；通货膨胀是即期物价和前期物价的差。③资产泡沫所造成的社会现象是财富的增加和虚假的繁荣；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社会现象是货币贬值和财富减少。④泡沫增大到某种程度时，会发生自行破裂，导致价格回归，甚至是暴跌；而在一般情况下，理论上通货膨胀则具有不可逆转性，如果不加治理，损失掉的财富将不可能再得到补偿。

另外，需要弄清的是导致泡沫和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有什么不同。一般认为导致产生泡沫的原因有三种：超出合理预期回报率的投资、超出现有支付能力的信用消费、以赢利为目的投机性的炒作，包括国际流动资本的投机性炒作。这其中，超前的信用消费具有双重作用，因为它既可能成为通过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原因，又是可能成为导致某些资产产生泡沫的原因。至于导致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传统的观点认为也有三种：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贸易推动，即所谓输入性的通货膨胀。非传统的观点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还应当将货币发行和所谓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包括在内，即指通货膨胀只发生在部分商品或部分领域，并不是市场物价的普遍上涨，而对于货币发行的另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流动性问题。

其次，对于如何抑制泡沫的产生，国内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提高利率，直至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是直接有效的措施。因为这既可以抑制消费，又可以抑制投资。不过，国内持反对意见的专家认为，加息将导致国际热钱的大量涌入，其结果必然会对股市、楼市等资产价格造成冲击，并对出口形势造成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制约我国的经济转暖。对此，国内有专家用加息后现金流 M_0 大幅度增加，以及企业储蓄大幅度减少等现象和数据，说明加息的结果已经造成了产业资本的短缺。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物价上涨和通胀是流动性过剩的直接结果。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是世界经济理论界泰斗级人物、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学生。2001年，靠“不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斯蒂格利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11年3月22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时斯蒂格利茨说：“希望中国可以避免犯美国犯过的代价沉重的错误……与其说我担心通胀，不如说我更担心政府对通胀反应过度，做出很多愚蠢的决策。现实情况常常是政府出台应对通胀的政策，反而导致劳动力、食品、石油价格都不断上涨，通胀也因此加剧。中国政府需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发挥作用，不能够完全依靠地方财政，要靠中央向地方转移支付来解决问题。如果中国完全模仿美国模式，把教育、医疗这类公共服务市场化，那将是一个大错误。”在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芮成钢的专访中，当问及如何应对通货膨胀，他的观点是：提高利率只会吸引更多的资金，使价格上升更严重，从而增加流动性，所以不应提高利率，而应限制信贷流动。

通过参考上述的观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认为低利率是导致泡沫产生的论点是不充分的。因为这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因素被忽略掉了，一个是巨量的国内和国际游资的投机炒作，另一个是货币的过量发行。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更为深入的讨论，实际上还涉及到保罗·A·萨缪尔森在其所著《经济学》中所列举的从利率变化传导到价格和产量的因果链条，以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于货币理论的贡献。简单地说，萨缪尔森认为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是随利率变化的；而弗里德曼则认为，由于存在所谓“乘数效应”，即GDP和P（物价）对i（利率）有负反馈作用，所以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相反，物价水平应当是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

目前我国的经济情况是，在政府巨量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下，虽然工业产能严重过剩，但是商品的价格还是在上涨。一方面，在低利率或负利率的情况下，人们不一定只会选择消费，更有可能的是转向投资，如购买房屋、古董和艺术品种；另一方面，我国既存在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又有

大量的民间游资和热钱流入，再加上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因而，那种简单地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的做法是缺乏针对性的。这里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无论我国政府出台何种政策，也不可能阻止国际黄金、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而国际所有资源和矿产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这种价格传导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它还能使拥有大量能源和资源的美国的财富总量获得相应的增加，从而对冲掉其经济运行成本的提高。

从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看，在维持负利率的条件下，政府似乎赞同了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更多地还是选择使用提高准备金的数量工具。不过，对于如何把握数量工具的“度”的问题，国内有专家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专家的观点认为，防止通货膨胀不但应当从控制物价、保障就业、平衡贸易以及削减政府赤字等方面做综合的考虑，而且也需要顾及到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大环境。因为，其一，实际上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也同样会损害到实体经济，而企业运营成本的上升除了不利于保障就业以外，最终也必然要转化为物价的上涨，结果是适得其反。其二，如果国际金融政策的主流是宽松的，而只有我国是紧缩的，从存量资产的角度来考虑，吃亏的一定是紧缩的一方。

由此，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引出以下的一些问题：①无论是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还是斯蒂格利茨，虽然这些人的观点都是从开放环境下的美国经济中得出的，但是并未提及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②对于美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来说，货币政策需要考虑到的不仅是本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也必须将美元贬值对于国家财富总量的影响计算在内，其中不但包括国家持有的外汇储蓄、美国的国债，也应当包括国家所拥有全部能源和资源的价值，因为美元仍然是当前世界的主导货币；③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传统的理论和政策手段已经不能解决日益复杂的现实问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题，探讨新的理论、建立科学的数量模型，或许应成为分析市场和出台政策的必要前提。

从哲学上说，这是一个内因与外因的问题，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外因也能起到主导的作用，因为内因与外因本身就是相对的。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我国面临的是一个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之间的流量互换和政策博弈的问题（见图 1-3）。从市场学的角度考虑，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要把握住经济运行的规律，就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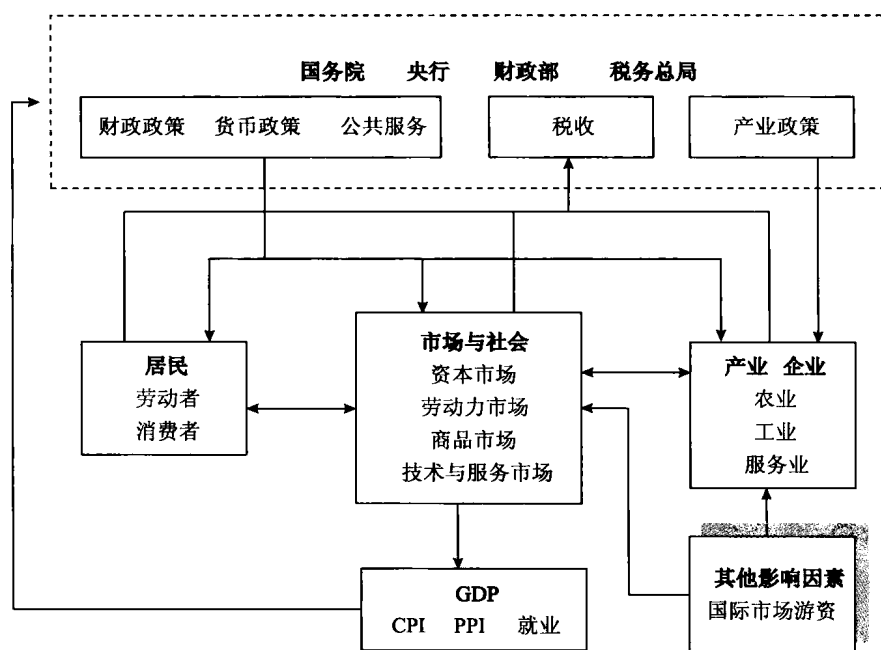


图 1-3 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与市场环境

通过图 1-3 可以看出，经济运行受多个参数的影响，那种仅以单一的参数作为制订政策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与时俱进，就是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需要在这方面有所提高，不然的话，那只能是空话。2010年四季度，面对我国部分农产品和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上涨，国家并没有再次提高利率，而是采用了16项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最终也产生了效果。这个例子说明的问题是，传统的思维、惯性的调控手段和书本上的理论并不能解决所有现实的问题，掌握真实的情况、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大量的市场细分，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2011年4月27日，在“议息会议”后，美联储发出公告：“更长期通胀预期一直都保持稳定，用于衡量基底通货膨胀的各项指标仍旧处于受抑制的状态”。对此，中央电视台证券资讯频道首席财经评论员钮文新指出：目前美国一方面“挺美元”，一方面“量化宽松”，这种看来自相矛盾的做法，目的是保证发行国债的同时消灭债务负担。如果美元滥发之势不减，很快世界将面临“滞胀”危机。如不改变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特里芬困境”决定了美元将永远地贬值。面对美国的金融战略，在谈到应如何确保我们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失的问题时，钮文新先生提出了超常规的“以涨对涨，以涨对滞”的主张。理由是，美国经济正在走向滞胀，并且其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就是转嫁危机。因此，必须认清治理通货膨胀所付出的代价总不能比通货膨胀本身带来的损失还要大。

2011年5月中，我国CPI的指标仍运行在5%以上，政府继4次连续地使用数量工具和2次使用价格工具以后，又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了21%，使之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以上。对此，国内各界绝大多数权威和专家们都表示了赞同。不过，也有极少数的专家持不同意见，其观点是：2010年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是印度12.4%、越南9.2%、俄罗斯6.7%、巴西5.1%。与这些国家比较，我国的GDP是最高的，CPI是最低的，应当可以接受高一点的通货膨胀率。况且，世行的专家也认为新兴市场国家3%~5%的CPI是合理的，所以不必过度反应。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另外，我国的 CPI 是由食品价格、工业品和服务价格构成的。通过对这三类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制造业和劳动力都相对过剩，所以工业品和服务的价格都难以大幅上涨，CPI 的上涨只能由食品价格的上涨所导致。如果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价格和部分居住价格，我国的核心 CPI 并不高。因此，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方面，我国货币政策应当紧盯核心 CPI，而不是 CPI；另一方面，不适当的加息也一定会加大热钱的涌入，导致储蓄增加，消费降低，从而使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目标难以实现。2011 年 7 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6 月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 6.4%，创三年新高，其中猪肉价格上涨 57.1%，影响 CPI 上涨约 1.37 个百分点，对 CPI 贡献超过 20%。这个现象进一步说明，抑制 CPI 的上涨需要深入地分析原因，不能单纯地依赖货币政策，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再回到有关判断股市有没有泡沫的问题上来。一般说来，实际上判断股市有没有泡沫与判断股市有没有投资价值是一回事。不过，情况也有例外。和平年代，在商品拍卖市场上，古董、字画和艺术品的成交价格被拍卖得很高，一件圆明园瓷器拍卖的成交价格高达 5 亿多元，一幅画可以卖到 4 亿多元，一块翡翠的饰品可以卖到 1 000 多万元，但是人们并不在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一种奇缺的物品。在现货和期货市场上，黄金的价格一直在上涨，已经远超过其工业上的使用价值，但也只是有少数人说这里面有泡沫。为什么呢？因为黄金代表了国际信用，既是一种被世界认可的政治金属，又是一种趋于枯竭的、不可再生的自然矿产资源。同样，对于高档的奢侈和化妆品而言，人们关心的是品牌，价值并不重要。

具体到对于股市泡沫的判断，也就是对于股市投资价值的判断，一般认为股市的动态市盈率 PE 值在 20 倍左右，或 PEG 值在 1 左右为合理的价格。

值投资空间，超出这个投资空间即为有了泡沫。PEG 值为 1 的含义是，市盈率 PE 值的倍数与业绩增长的幅度相匹配即为合理。虽然表面上看，使用动态市盈率来估算价值比使用静态市盈率科学，但是，实际上这还是不全面的。一方面，实际利率一般小于名义利率，是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的差；另一方面，市盈率 PE 值是名义利率的倒数，即 $PE = 1/i$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为负相关。换句话说，在低利率和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无论是对于投资，还是对于保值而言，对应的只能是高市盈率。

举例来说，20 倍的 PE 值对应的是 5% 的年定期储蓄利息，即 $100 \div 5 = 20$ 。也就是说，储蓄 100 元，年终获得 105 元的本金加利息，与用 100 元购买一股年赢利为 5 元的股票是等价的。同样道理，如果一年的定期储蓄利息降低到 2%，那么 50 倍左右的 PE 值也算合理，不能说出现了泡沫，因为两者还是等价的。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有两点，一是人身份的变化，储户变成了股东；二是风险与收益程度的变化。做储户，其风险与收益是由银行的信用和效益保证的；做投资人，其风险与收益是由上市公司的信用和效益保证的。众所周知，高风险与高效益是并存的。一般的情况是，银行的信用高，但效益低；而上市公司的信用低，但效益高。因此，泡沫并不是一个绝对和定性的概念，而完全是一个相对的、需要量化的概念，并且任何测算泡沫的指标也必须有条件。

以上的计算并没有将利息税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利率缩水考虑在内，然而，伴随着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总是存在的。如果将通货膨胀也考虑在内，当然用实际利率测算 PE 值才算更合理。这样的话，理论上得到的 PE 值将更高。其实，用利率水平作为参照物来判断市盈率 PE 值的高低并不是绝对的。虽然在低利率水平下的高市盈率理论上合理，但是，高市盈率意味着长周期的投资回报期，而长周期的投资回报期，意味着投资风险的增加，以及边际收益的损失。补充的方法是进行综合判断，即投资者同时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也还可以参考其他的技术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市净率、成长性，以及品牌的价值等。

企业的品牌价值属于无形资产，一般不会计算在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中。例如有人对上市公司贵州茅台做了计算，在最高价位时，其投资回报需要 200 年，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投资者乐于持有这样的股票呢？其原因就在企业的品牌价值上。2010 年四季度，当市场处于调整的低迷阶段时，贵州茅台的股价却逆市上涨，股价超过 200 元，其走势完全验证了其品牌的价值，而且市盈率也大幅度降低到 35 倍左右。

根据 2008 年 12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为 2.25。按照以上公式 $PE = 1/i$ 计算，2009 年，理论上合理的市盈率应为 $1/0.0225 = 44.4$ 倍。2008 年 A 股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益为 0.3443 元，2009 年底上证指数 3 000 点时，平均市盈率约为 30 倍，平均股价 12.3 元，平均每股收益 0.41 元，因此，其年增长率约为 $0.41 \text{ 元} \div 0.3443 \text{ 元} = 1.2$ 倍，即 20%。然后，再将对 PEG 的计算值纳入其中，即 $44.4 \times 1.2 = 53.28$ 倍。换句话说，上证指数 3 000 点时，理论上市场合理的市盈率应为 53.28 倍，相对于当时 30 倍的市盈率而言，股市仍有 77.6% 的上升空间，即如果不调整存款基准利率，上证指数在 5 328 点也算合理。并且，这里还没有将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实际利率水平一般总会低于名誉利率，以及上市公司的分红等因素计算在内。不过，相对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上的主流观念而言，这样的预测结果恐怕只有少数人能够接受。

国内有专家称，2001 年到 2010 年上半年，我国的上证指数上涨不到 50%，而巴西涨了 7 倍，俄罗斯涨了 6 倍，印度涨了 5 倍，而 A 股市场市盈率平均为 18~20 倍，没有泡沫可言。如果只看企业盈利能力的话，2009 年我国 A 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增加了 25% 左右，即使市场估值水平不上升，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资本市场也应当会有 20% ~ 25% 的上升空间。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状况却并非如此，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很明显，上述两个问题十分容易理解。然而，非常普遍的问题是，许多人，甚至是很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实际上对此并没有做过分析，也不去做以上的计算，更没有过个人投资股市的经历，却总是依仗专家的声望，仅以市盈率 PE 值作为标准，对资本市场的牛市、熊市和所谓泡沫大发议论。在这些专家看来，50 倍左右的 PE 值太高了，股市一定是出现了泡沫。殊不知，市盈率与利率是一对共生的指标，利率低，市盈率必然会高，这是由货币需要寻求保值的属性所决定的。

另外，也有经济学家可能连市盈率的 PE 值也不看，而仅以大盘的点位数值判断股市是否出现了泡沫。更为可笑的是，有的专家或媒体甚至连上交所与深交所的交易账户是分开的都不知道，误将 1 亿多的交易账户，看成是 1 亿多股民，并且由此推论股市肯定有了泡沫。还有一些人则利用个案判断股市。比如，由于社会上出现了和尚和小学生炒股，所以就认定股市有了泡沫，这其中可能也有经济学家。

我国股市的这一次大牛市始于 2005 年 6 月 30 日上证指数的最低点 998 点，终结于 2007 年 10 月 19 日上证指数的最高点 6 124 点，涨幅高达 614%。面对这样的一种市场现象，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向政府和社会呼吁，股市的泡沫过于严重，政府必须尽快干预。然而，这其中的许多细节并没有在他们的考虑之内：

(1) 股权分置改革成功的推动作用。中国经济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持续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上证指数以 1994 年 7 月的 325 点为起点，至 2001 年 6 月 29 日，达到了 2 245 点的最高点，7 年内上涨了近 7 倍。但是此后，股市却经历了 5 年的大熊市。上证指数从 2 245 点，下跌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的 998 点，跌幅为 55.5%。对于一个新兴的股票市场，

股指初期的高速上涨应当属于正常，为什么又会出现暴跌呢？对中国股市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主要原因在于股权分置所造成的各种不公平，以及由关联交易所导致的利益输送。而此次股市前期的上涨，即上证指数回到2006年6月29日的2 245点以上，应看成是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市场对于上一次大跌的修复。

(2) 大扩容对股指点位的拉动。由于股改的成功，资本市场的融资作用得以恢复。从2006年开始的扩容已经使中国银行、中国国航、工商银行、中国石化、大秦铁路、交通银行等大盘蓝筹股成功上市，加上中、小盘股，以及各种“大非”、“小非”的解禁，有人测算由此而导致的市值增量约在600点以上。如仅以点位计算泡沫，当然也要将该部分剔除在外。如果用上述推导出的53.28倍市盈率相对应的上证指数5 328点与之比较，可以发现， $6\,124 - 600 \text{ 点} = 5\,524 \text{ 点}$ ，两者仅相差了约200点。这说明市场总是有其自身内在规律的。

另外，从2007年股市这一次的疯狂可以看出，只有大牛市，才有大扩容。2007年以后，上证指数一直在3 000点左右徘徊，估值是合理了，但是大盘股还发得出去吗？这就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从辩证的角度看，凡事总有两面，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市场总是有其自身的规律，否则也不可能有什么黄金分割的定律存在。股市上有人说过一句话，很值得思考：“为什么政府的有形之手，总是先于市场的无形之手出手？”

(3) 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中国有各类企业约7 000多万家，而当时的上市公司仅有1 430多家，且多为优质公司，因此上市公司的平均成长性达到了30%左右，绝对高于GDP的8%。其中，如有色、钢铁、石化、金融等行业的平均业绩增长超过了100%。另外，据证监会统计，2006年，7%的上市公司构成了69%的市值总额，并且其中多为市盈率比较低的大

盘蓝筹。所以，综合而论，只要这部分的企业没有出现泡沫，整体市场的估值即为合理。

(4) 股指期货推出的时机对于市场的影响。2007年8月，上证指数在4700点左右时，技术指标已经显示出了有下跌的迹象，因为市场总是会提前于53.28倍市盈率及其相对应的5328点做出反应的，但是，此时政府将要推出股指期货的消息却又进一步推高了股指，最终使上证指数上涨到了6124点。究其原因主要是，消息出来的时间点不恰当，对于股指期货的宣传教育不够，以及管理措施没有跟上。所以，其结果是，导致市场错误地将此消息理解为重大利好，从而继续地推高了股指。相反，2010年4月，证监会在上证指数处于3000点左右时正式推出股指期货，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一次没有出现机构大规模地加仓大盘指标股的现象，因而也没有引起股指运行的大波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们的一些专家和权威的治学态度的确值得警惕。如果政府出台调控市场的政策是以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为出发点的，其后果可想而知，市场的大起大落也在所难免。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很可惜的是，我们的技术分析专家不是经济学家，更可惜的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不懂技术分析。可以这样说，我国的学术水平真的到了急待提高的时候了。

四、技术与预测的方法

谈到对于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是牛市还是熊市的判断，这其中，既需要做定量的技术分析，也需要做定性的综合分析。技术性分析指应用各种技术手段做定量分析；非技术性的综合分析是指对于政策、资金、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以及其他的环境和影响因素的分析。这里需要认清的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是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要知道：对于股指的运行而言，所有非技术性因素的历史数据都已经刻录在现有的技术图形之中，而技术图形未来的变化，将会是今后可能随机发生的所有非技术性因素和现有技术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资本市场上的技术分析方法有几十种之多，其中波浪理论属于最为复杂的一种。以黄金分割率和所谓神奇的斐波纳奇（Leonardo Fibonacci）数字系列为理论基础，波浪理论认为：股市中，一个完整的波浪周期由 8 个浪构成，上升阶段有 5 个浪，下跌阶段有 3 个浪。上升阶段 5 个浪的过程是，1 浪上升、2 浪回调、3 浪上升、4 浪回调，至 5 浪上升，其中 3 浪被称为是主升浪。上升阶段 5 个浪的结束，就是牛市的结束。下跌阶段 3 个浪的过程是，A 浪下跌、B 浪反弹，至 C 浪下跌，其中 C 浪下跌为主跌浪，幅度远大于 A 浪下跌。下跌阶段 3 个浪的开始，就是熊市的开始。从时间维度上看，每组浪之间的时间间隔点符合费波纳奇数字系列；从价格维度上看，每组浪的上升与下跌的幅度又与黄金分割率相吻合。

另外，波浪理论还认为，波浪还能再细分，即所谓浪中有浪。这就是，如果将上述的 8 个浪看成是一个中级浪，那么，它就又可被看成是构成另一个更大的浪的 1 浪上升和 2 浪下跌。并且，这个中级 8 浪中的每一个浪，又由 34 个小浪构成。这其中，熊市周期中的小浪涨跌过程与牛市相反，即 A 浪下跌由 5 个小浪构成，B 浪反弹由 3 个小浪构成，C 浪下跌也由 5 个小浪构成。

依照“波浪理论”，一般的牛市周期为 3~5 年，熊市周期为 2~3 年，然而，实际上影响市场波动周期的因素有很多，并且各国的情况也不相同，所以难以给出精确的结论。图 1-4 是按波浪理论显示的牛熊转换图，细曲线所示为多个小浪，粗曲线所示为一个中级 8 浪，虚直线所示为一个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大1浪的上升和一个大2浪的下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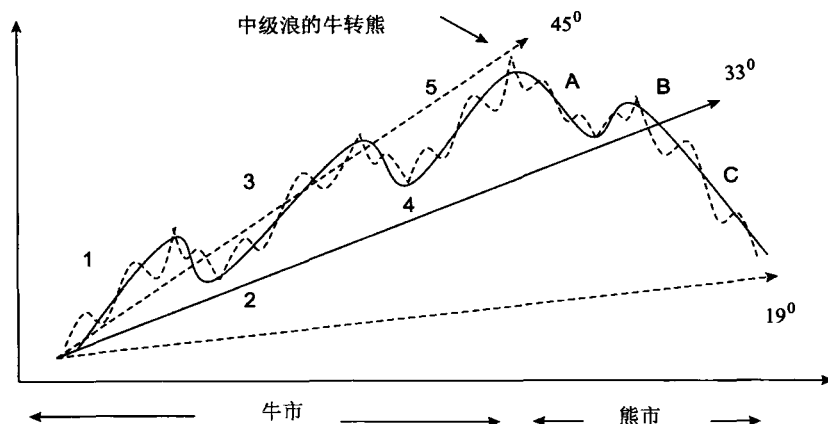


图 1-4 按波浪理论显示的牛熊转换示意图

对于这种浪中有浪的多重结构，有专家将其归结为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所谓“分形数学”的理论范畴。其简单的含义是，不规则图形的局部与整体之间有自相似性的特征，并且这种特征普遍地存在于自然地貌、生物形态和宇宙星辰的分布之中，可以说无处不在。

在实际应用中，“波浪理论”往往是与被称为是“金融几何学”的江恩理论相配合的，即利用所谓的“江恩箱”（时间与价位所构成的正方形）、“江恩角度线”（时间与价位的对角线）和“圆形”（时间与价位所构成的角度）来分析波浪的趋势，以及细分股价上涨或下跌的阻力位或支撑位。江恩的“圆形”理论，实际上是“黄金螺旋”理论的一种简化模式。

江恩理论认为，股价的涨落与时间周期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相关性，即股价的每一次高点和低点的出现都会遵循一个固定的时间节奏，循环发展，并且循环中又有循环，而所有的预测就是依据这种循环周期和数学序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列作出的。按照这种理论，人的情绪受月亮和太阳的运行周期的影响，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只要能正确地选择股价已经出现的高点和低点的位置与时间点，就能够根据下一个时间周期的起始点和终结点，推算出下一个高点或低点的位置。

与波浪理论和江恩理论有更为直接关联的是“社会统计学心理学”。具体来说，其分析方法的基础是，股价的上涨和下跌与绝大多数投资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操作节奏有关，即与 0.618 的黄金分割点相吻合，符合一种社会统计学的规律。所谓神奇的斐波纳奇（Leonardo Fibonacci）数列，是源于几何的黄金分割法的一种算术表达式。如果一定要在自然现象、人的心理情绪和股市运行三者之间建立起来某种联系，这至少显得有些过于牵强和格式化。因为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现象相比较，其他诸如政策或基本面等因素对于市场的影响更大。

波浪理论的最初来源是艾略特（R. N. Elliott）的时间 - 价格模型，这个模型就是波浪理论与江恩理论的结合。在艾略特所著的《波浪理论》中，对于斐波纳奇数的应用方法是，将上升浪的 1 浪、3 浪、5 浪用斐波纳奇数字系列中的 13 表示，回调浪的 2 浪、4 浪用斐波纳奇数字系列中的 8 表示。在后 3 浪中，下跌的 A 浪、C 浪用 13 表示，B 浪反弹用 8 表示。其根据是，一方面，对于求得黄金分割点 0.618 而言，数字系列中的前四位误差过大；另一方面，使用 8 和 13，又远比使用以后的数字更为简单和方便。

根据斐波纳奇数字系列 1, 2, 3, 5, 8, 13, 21, 34, 55, 89, 144, 233……的特性，即每两个相邻的数字相加等于后一个数字，以及，除前四个数字外，每个数字大约是其前第一个数字的 0.618 倍和其前第二个数字的 0.382 倍；每个数字也大约是其前第一个数字的 1.618 倍和前第二个数字的 2.186 倍。由此，可得到的四个主要比例是：0.618、0.382、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1. 618、2. 186。将此四个数字按一定的法则做进一步的分割，便可得到重要的黄金分割率：0. 191、0. 236、0. 382、0. 618。细分方法是， $0. 382 \div 2 = 0. 191$ ， $1. 618 \div 2 = 0. 809$ ， $0. 382 \div 1. 618 = 0. 236$ ，或者 $0. 618 \times 0. 382 = 0. 236$ 。

在艾略特的时间 - 价格模型中，以上数据是按纵轴分割所获得价格比例。如果将 13 与 8 看成为时间周期，则 8 浪的时间间隔为，13 天，21 天（13 + 8），34 天（21 + 13），42 天（34 + 8），55 天（42 + 13），68 天（55 + 13），76 天（68 + 8），89 天（76 + 13）。

通过上述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波浪理论的特点是，以黄金分割比率为基点，用斐波纳奇数字系列中的一些特殊数字及其经过再分割所获得的一些衍生数字，模拟了股指的实际运行规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波浪理论仅适用于成熟和理想化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股市，而对于指令性过强的股市，或者某些所谓完全的“庄股”并不适用。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波浪理论可以看成为是一种力求精确的定量分析与预测的方法，然而，反过来看，波浪理论又过于复杂和程式化。

波浪理论的长处是，依据股指的形态变化规律、空间比例和时间周期等参数，力图完整和精确地描述和预测股市的走势，其不足之处在于：

（1）忽略了对于量能这一非常重要的指标的分析。然而，量价配合，或者量价背离，往往是行情逆转，或者发生变化的先兆。人们常说的“量为价先”，说的正是量的重要性。

（2）由于观察角度相对单一，主要以波浪形态为依据判断行情的变化，所以，应用中出现的逻辑分支点较多，难以把握。而如果采用多周期的方法测算，再加上存在“浪中有浪”的多重结构，其分析过程会更加复杂和繁琐。

（3）现实中，完全能与数学模型或数学表达式相符合的股价波形和时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间窗口肯定极少出现，所以，过度地追求精确，其结果反而只能是不精确。

(4) 任何技术指标所显示的结果都不可能是绝对的。由于政策和市场环境的突然变化会导致股指运行的不稳定，而且“浪”会有变形，时间节奏也会有延伸或缩短，因此，运用多种技术指标做综合性的模糊判断，其预测效果未必不如波浪理论。比如，综合运用量能、形态理论、均线理论、MACD 或 KDJ 等指标做多周期的技术分析，就完全有可能使繁琐的数浪和对于时间周期的测算得到简化。应用不同周期做分析，其显示的结果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而做预测最本质的过程其实就是去虚存真和确定最高的概率。

(5) 如图 1-5 所示，依据所谓的“江恩箱”理论，即时间与价位构成正方形，一个中级推进浪的起点到终点的角度应为 45 度，即年增长率能够达到 100%；一个完整 8 浪的起点到终点的角度应约为 19 度 ($0.5/1.5 \approx \text{tg}19^\circ$)，即年增长率能够达到 30% 以上；股价增长曲线的中轴线约为 33 度 ($1/1.5 \approx \text{tg}33^\circ$)，即年增长率能够达到约 65%。然而，即便以中国每年约 9% 的高 GDP 的经济增长为基础，股指最多也只能按 19 度角的曲线上升，因为 9% GDP 的增长对应的角度约为 6 度夹角的上升曲线，而 19 度夹角的上升曲线对应的是 33.3% 的增长率 ($0.5 \div 1.5 \approx 33.3\%$)，这意味着从长期看，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是全国平均增长率的 3 倍。实际上，这至少不符合中国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当然，这其中也需要考虑到股指扩容的影响。由此，对于 45 度夹角“江恩箱”的解释只能是，由于股指多数情况下是处在振荡周期之中，所以“江恩箱”仅存在于局部的时间周期。对于“江恩箱”存在的另一种解释是改变纵坐标轴或者横坐标轴的点位距，这样无论如何也能使增长的夹角达到 45 度。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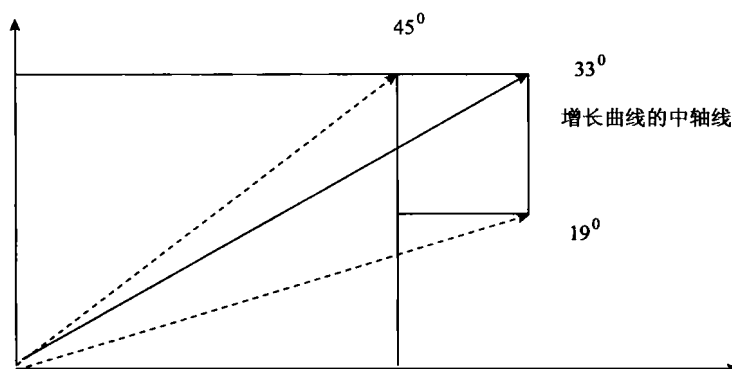


图 1-5 有关“江恩箱”理论的结构示意

与“波浪理论”比较，其实“均线理论”也与股价走势的波形有关。不过，两者的不同在于：“波浪理论”的预测方法是通过分析 K 线的波浪形态与时间周期之间的关系，判断股价的走势；“均线理论”的方法是通过分析多条不同均线之间的形态关系，判断股价的走势。均线中出现的“金叉”和“死叉”实际上蕴涵着行情变化的速度或强度，而且，与趋势有真有假一样，“金叉”和“死叉”同样也有真假之分。此外，按不同周期走出的均线，实际上代表了在不同时间段介入的投资成本，所以，均线之间存在的偏离与粘合，以及压制与支撑的关系也完全可以作为判断行情的依据。当然，在应用中要想掌握好“均线理论”的分析方法同样不容易。

涉及有关牛熊转换的问题，如果按“均线理论”表述，问题则可能比较简单。“均线理论”认为：在移动平均线（MA）的日线图中，如果被称为生命线的 60 日线，正在或者已经与 120 日线（或称半年线）形成“金叉”，并且被称为牛熊分界线的 120 日线也由原来的向下逐渐走平，甚至转而向上，即为熊转牛的标志。一般情况下，此时如果再有量能和其他长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期均线走势的配合，则反转的趋势将更加可靠（如图 1-6 所示）。反过来情况也一样。而相对保守的观点是，当 120 日的半年线与 250 日的年线之间形成“金叉”时，就可以认为是出现了牛市，并且只有当 1 年线与 2 年线之间形成“金叉”时，牛市才算得到了确认。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行情可能出现的反复考虑在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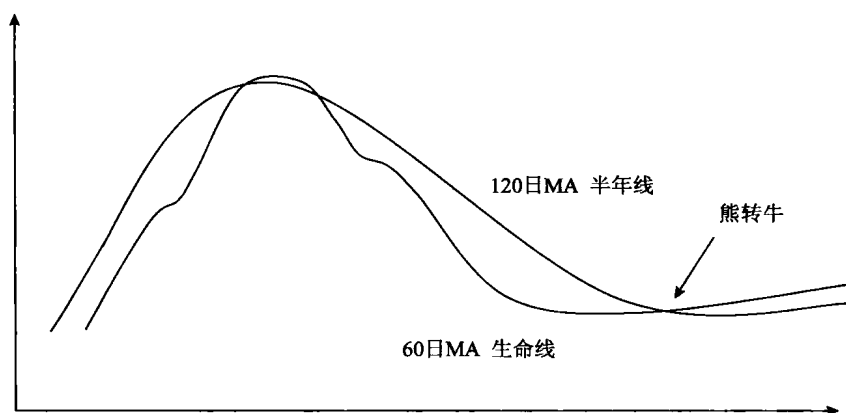


图 1-6 按“均线”理论显示的牛熊转换示意

当然，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人会根据不同的分析方法操作。对于股市的长期变化规律，长线投资者使用周线、月线或者年线来分析股价的走势；绝大多数做短线的投资者更习惯于按短期均线，如 5 日、10 日或 20 日均线，或是按更短的分时图，如 30 分钟或 60 分钟分时图来操作；更激进的投资甚至连短期的分时图也不看，而只按趋势线所显示的重要点位来操作。

至于为何要将 60 日均线称为生命线，将 120 日均线称为牛熊分界线，那是因为：根据我国 T+0 和 10% 的日涨跌停板制度，一般的统计规律显示，在短期均线的多头排列中，如果股价击穿了 20 日均线，短期内，相对于前期高点，则下跌幅度将可能会在 5% 左右；如果股价击穿 60 日均线，

则下跌幅度将可能会在 10% 左右；而如果股价击穿 120 日均线，并转为熊市，则下跌幅度将可能会达到 20% 以上。当然，这些都是理论数据。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牛熊的转化同样是一个需要做量化分析的问题，虽然这类问题并不算复杂，但是也需要花一点时间做些研究。如果不做技术分析，不掌握科学的量化指标，只凭主观、简单和武断的方式来做判断，体现出的只能是一种不良的学术风气。

对于资本市场的趋势是否可以预测，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可以预测，是多数。可预测派的理论基础是：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但会有征兆，也存在惯性，历史总在不断地重复，因此市场是可以预测的。可预测派一般又分为三类：常规技术分析、特定的数量分析及定性的综合分析。常规技术分析是指在常用的计算机行情软件中都会带有的、公开的技术分析手段，如 K 线、均线、MACD 和 KDJ 等。各种常规的技术指标各有特点和不足。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能根据个人习惯的操作节奏，使用不同技术指标，按不同的时间周期，对股指的运行做出综合的分析和判断，就有可能避开使用单一技术指标的缺陷，收到较好的预测结果。

常规技术分析依据的三大原则是，第一，“市场行为包容一切”；第二，“价格总是沿着趋势运行”；第三，“历史会重演”。特定的数量分析一般是指专业研究机构内部特有的分析方法，包括大量地收集有关数据，绘制图表，以及使用一些独创的分析模型等。这类分析模型往往是常规技术分析模型的综合或变形。而定性的综合分析是指从业人员常规性的股评，一般包括对于市场或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分析，对于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对于行业发展状况的分析，对于政策和消息的分析，以及对于周边相关市场与环境影响的分析等。

另一种认为市场是不可预测的理由是，事物的发展趋势不可能总是延续其自身的惯性，突发环境因素的变化，在不断地改变着事物自身的发展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规律和趋势。因此，技术分析和其他的分析手段均不可靠，只能做为参考，趋势是不可预测的，精确的预测更不可能。以上的两种观点看似都有道理，所以综合一下，结果可能会比较全面。这就是，降低依赖技术分析和数量模型的预测期望值，增加对于突发事件和环境变化的关注和研究。

常规技术分析完全是公开和透明的，所以便于交流，用得好也还是有效的。比如，以上证指数为例，使用“炒股”软件，在移动平均线的分时图中，选择月线图为周期，通过按 10、20、30、50 和 100 分别设置月线参数，便可得到近似于 1 年、2 年、3 年、5 年和 10 年的移动平均曲线。这里可以看到是周期越长的移动平均曲线会越平滑。实际操作中，如果设横坐标点距单位为 1 年，纵坐标点距单位为 1，则 10 年的移动平均曲线可以近似为一条按 12° 角向上倾斜的直线，其他相对短期的移动平均曲线基本都处于 10 年移动平均曲线的上方，并且仅在较短时间内有小幅度的下穿（如图 1-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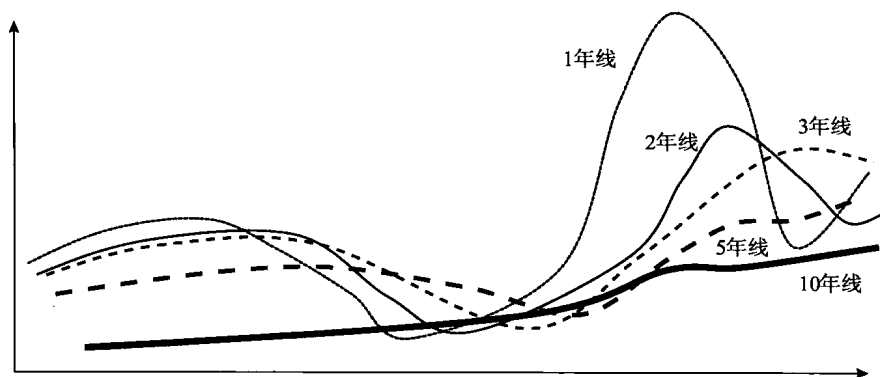


图 1-7 年均线

如果在 10 年的移动平均曲线上，任意选择 2 个时间点，使 2 个时间点之间的时间差是 1 年，然后，通过计算 2 个点之间的点位差，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10 年内股指的平均涨幅约在 20% 左右（如图 1-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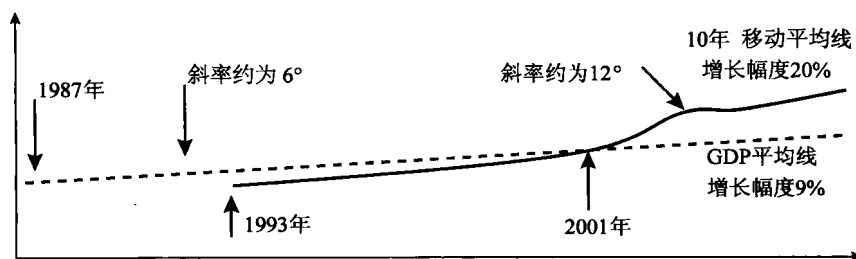


图 1-8 长期均线与 GDP 增长线的相关性示意

通过分析月线图上 1 年、2 年、3 年、5 年和 10 年移动平均曲线的形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从长期看，中国股票市场的确一直在发展，并能与 GDP 的增长保持同步。然而，从中短期看，市场大起大落，运行极其不稳定，完全失去了成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作用。

2010 年 5 月，英国《金融时报》更将中国股市列为全球倒数第五位。其中，倒数第一位是债台高筑的希腊，然后是斯洛伐克、塞浦路斯和西班牙。理由是，虽然在此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是率先走出低谷的经济体，但是该年从 1 月份到 4 月份以来，中国股市的上证指数一路从 3 306 点下跌到 2 604 点，跌幅达到了 21.2%，相当于蒸发了 3 万亿元。此后，直至 2010 年 7 月初，股指继续下探到了 2 382 点后才有有所反弹。国内有专家对此的解释是，市场对于国家调控房地产政策有过度反映。不过，这种说法大概未必能得到普遍的认同，因为我国股市存在的问题很多，这是不可否认的。

(2) 10 年移动平均曲线稳定、平滑，可以作为一项可靠的参照物，用于预测市场的长期发展趋势。不过，10 年移动平均曲线 20% 的涨幅仅为理论数据。从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和投资收益的角度看，扩容的因素需要排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除在外。

中国股市的超高速扩容为世界瞩目，由于过度扩张，18年来，IPO已经有了“七停七启”的历史。2005年3月1日，《中广网》的一篇文章提到的数据是，纽约股市至今200年，IPO只有3 000多只股票，中国香港股市40年，IPO只有1 100只股票，中国台湾股市40年，IPO只有669只股票，而中国A股市场在14年内，IPO扩容1 500多只股票。表面看来，用扩容来挤压泡沫似乎无可非议，然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究竟应当如何科学地测算估值与泡沫。

(3) 如果一个比较稳健的投资者，在10年移动平均曲线的附近买进股票，然后长期持有，则理论上不会亏损，并且其收益率理论上可以达到20%。当然，这里的前提是，投资者所买进的股票不应当是垃圾股，并且股市的扩容速度完全适度，是市场化的。

(4) 10年移动平均曲线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该曲线与GDP运行曲线的关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87年，在之后的多年内，我国GDP的平均增长率约为9%，即GDP曲线在以斜率约为6°左右的角度上升。

中国资本市场始于1993年，其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0%。通过简单的制图，可以看到，两者约在8年以后，即2001年左右相交，并形成了一个约6°向上的夹角。此后，在某一时间段内，10年移动平均曲线与GDP曲线之间的距离将被逐渐拉大。然而，若干年后，此种现象必然会改变。因为股指运行毕竟要以GDP的运行为大环境。理论上两条曲线之间的合理关系应当基本保持同步，不可能形成越来越大的剪刀差。国内已有专家指出，2010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国内外经济的逐渐企稳，以及政策调控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股市、楼市将会趋向于“三稳”的局面。因此，资本市场不再可能有过于火爆的行情出现。

五、不懂股市的经济学家

如果对中国资本市场进行一项社会调查，问一下股民、机构投资者、基金经理、券商的从业人员、相关的市场研究机构、股评专家和新闻媒体主持人等各类参与者，在经济学家和操盘手之间谁的观点更可信，大概赞同后者的概率更大。原因是，经济学家一般属于理论派，缺乏实际经验；而操盘手是技术派，有实战经验。当然，如果两者能结合，必然会更好。

面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形势，我国股市中存在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6%，但是中国股市的几次暴跌，完全失去了资本市场融资的功能，政府不得不去救市。2007年10月19日，上证指数的最高点达到了6124点，然后便急转直下，下跌至2008年10月31日的最低点1664点，最大跌幅接近73%，创下了18年来的最高记录。两市总市值共蒸发20万亿元，其中流通市值蒸发超过5万亿元。按照每个投资者同时拥有沪深两个账户计算，平均每个投资者至少人均损失8万元。虽然中国并不是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并且金融与资本市场也没有完全对外开放，我国股市当年却是世界最大跌幅。

2008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了约70%左右。但是，当全世界都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面临经济紧缩之时，中国却在拼命地防止通货膨胀，制裁的重拳一个接一个。接下来，又是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救市。这其中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

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列全球第一，但是股市跌幅却为全球第二。上市公司中蓝筹股，如银行的平均动态市盈率已经跌到了8倍左右，其投资

第一章 股市与宏观经济

收益约为年定期利率的 3 倍多，接近于国债的 2 倍，但是仍然不被看好。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对整体市场缺乏信心；另一个是大资金不愿介入。因为只要蓝筹股涨了，会带动市场整体指数上涨，就有可能招致政策的打压，况且，在股市下跌时，大资金的撤离也远比小资金更为困难。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一个称职的经济学家，首先应当是一个市场研究方面的专家，其次应当是一个掌握一定技术分析手段的专家，否则其观点难以客观，其结论也难以确保正确。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如何做市场研究其实并不在行，更不用说掌握那些技术手段了。他们对股市、房市、泡沫等问题发表评论，凭借的仅是书本知识、个人的声望和头脑中的惯性思维；分析和判断问题简单、武断，因此，其结论必然很难符合实际。

以股市中的技术分析为例。一般的情况是，国际上常用的技术分析方法，大多由对于资本市场有深入了解的数学专家发明。在使用中，其中一些技术指标完全有可能相互矛盾，所以，当一个好的操盘手并不容易，除了需要有综合的分析和判断的能力，还需要有长期的从业经验。即便如此，很多时候操盘手也会出错。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接受高等教育以外，许多行业的从业资格也还需要获得认证。对于我们的经济学家而言，也许很难找到测试其职业水平的认证标准和手段，但是，市场能够检验一切。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我国股市的情况如此，房地产市场和其他许多领域的情况也如此。国家级专家的观点就是国家决策的基础，国家级研究机构的调研报告就是国家决策的依据，如果这些人错了，结果哪有可能不错呢？应当看到的是，在国家的经济活动中，一个不懂得市场的专家，一个没有参与过市场操作的专家，其实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专家。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在我国经济生活的各领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看似孤立，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并且有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改革开放前，中国有近30年一直执行的是计划经济。受此影响，一些人过于传统，头脑中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另一些人则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论生搬硬套。因此，其结果是，我国的总体学术水平，包括在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上调查研究水平，以及在国际金融和能源市场上的实际操作能力均不算高，必须尽快改进。

另一方面，传统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化所塑造出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定性、归纳、辩证，缺乏的是做定量分析的习惯。换句话说，中国人的思维属于经验主义，西方人的思维属于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问题与思维结构、思维机理和思维模式等问题相关，属于思维心理学的范畴。人的记忆力、智力，主要由人种的生理因素决定；概念的产生、判断和决策依赖于人的生存环境、社会实践和知识结构；思维与推理方式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依赖于所有上述一切。因此，学术水平落后也有文化的因素。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一、质疑《经济蓝皮书》

中国社科院在其连续发布的 2010 年和 2011 年的《经济蓝皮书》中指出：由于房价收入比超出合理范围，中国 85% 的家庭无能力购买住房。2010 年我国商品房的房价为 5 520 元/平方米，比 2009 年的 4 800 元/平方米上涨了 15%，上涨幅度降低了 10%。由于报告出自于官方的权威研究机构，所以数据的公布无论是对于政府的决策部门、媒体，还是对于社会大众，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经济蓝皮书》，许多专家发表了各种意见，有赞同的，也有质疑的。然而，像争论其他社会问题一样，绝大多数人的关注点只是局限于结论和观点的层面，很少有人对于数据的收集是否准确，市场调研的方法是否科学有所深究。

从表面上看，《经济蓝皮书》结论是有据可查的，然而，从专业市场研究的角度来分析，一方面，社科院报告中所提到的数据——85% 的家庭无能力购买住房其实只是一个主观数据，并不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经济蓝皮书》使用的数据过于笼统，没有经过多方面的比对和论证，并且分析方法也比较简单，所以道理并不充分。如果做进一步的探讨，这其中能引申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1. 仅以“房价收入比”来推断家庭购房能力是否合理？

《经济蓝皮书》的结论是仅由“房价收入比”推论得出的，然而，实际上该数据还涉及到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 85%的家庭无力购房的数据的得出，是否已经将城镇部分家庭可从现有旧房的拆迁中获得补贴、补贴有多少，以及这部分家庭在城镇中的占比等因素考虑在内了？

如果将有购房意向的家庭进行分类，一般可以分：有旧房，想要买新房自住的；无旧房，想要买新房自住的；以及买房完全用于投资或投机的。对于第一类人和第三类人，显然简单地用“房价收入比”衡量其购房能力并不合理。因为第一类人购买新房的能力需要将原有旧房的价值计算在内，而第三类人自然不用说，投机性购房本身就是国家打击的对象。因此，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购房能力的范围，应当仅指第二类——无旧房想要买新房自住的人群。

对于第一类人，以北京为例，居住地段可分为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高房价主要集中于城区和近郊区。居住在城区和近郊区的人群又可以分为有户籍的常住居民、增量人口和流动人口。这其中，大部分有户籍的常住居民的房屋购买意向属于改善性需求。此类人群一般都在城市较好的地段拥有旧房，拆迁时能得到适当的补偿。

具体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9 年的数据，北京市的人口分布为：东城区，53.6 万人；西城区，70.7 万人；崇文区，34.6 万人；宣武区，52.6 万人；朝阳区，229.0 万人；丰台区，136.9 万人；石景山区，48.9 万人；海淀区，224.0 万人；门头沟区，26.7 万人；房山区，81.4 万人；通州区，67.4 万人；顺义区，63.7 万人；昌平区，61.5 万人；大兴县，67.2 万人；平谷县，9.7 万人；怀柔县，29.6 万人；密云县，42.0 万人；延庆县，27.5 万人。不算石景山区、海淀区和远郊区，仅城 8 区的人口就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达到了 626.3 万人。该数据约占 2009 年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 1 972 万人的 31.7% ($626.3 \div 1\,972 \approx 31.7\%$)；占户籍人口 1 246 万人的 50% ($626.3 \div 1\,246 \approx 50\%$)。

2009 年，北京市中心城区有些地段的拆迁补偿费已经达到了约 3 万元/平米，到 2010 年又上涨到了约 5 万元/平米。所以，对于此类人群而言，购置新房的压力不会太大，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这部分人群改善性需求的购房能力显然不合理。也就是说，即便对于北京这样的高房价的特大城市而言，按保守的计算，至少也有近 1/3 的人不会担心买不起房，除非这类人群还希望在原来的地段拥有更大的住房。因此，对于这类人群的调研，不应单纯地以“房价收入比”做为衡量购房能力的标准，需要另行设立标准。

(2) 有数据显示，完全需要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的城镇居民不超过 10%。如果此数据准确，其所指应当是需要政府向其提供廉租房和公租房的两类居民，而不属于购房家庭，因此，这两类需要租房的居民应当与购房的居民区分开来。近年来，国家的住房供给原则是，除商品房外，还构建了由廉租房、经适房、两限房、公租房所构成的分层次的住房保障管理体系。这个分层次的住房保障管理体系包括，对于城市的中产阶层只供应商品房；对没有购房支付能力的低收入家庭实行廉租政策；对有一定支付能力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配售经济适用房；对中等收入家庭的自住需求提供限价房；针对夹心层和过渡期住房需求提供公共租赁房。其中，涉及购买保障房的应当主要指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

如果 85% 的家庭无力购房是指除城镇中产阶层以外的全部其他居民，那么，这种不做市场细分的表述就显得过于笼统，其结果既不利于作为出台政策的参考，也不利于引导社会舆论和大众的消费行为。此外，需要考虑到的还有，无论是居民的收入，还是现有的住房情况，这其中的变化和差异都是相当大的，因而，政府需要将采用行政手段控制房价与回归计划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经济的做法区别开。简单地说，还是那句老话，“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于当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业内人士发出预言：2012年以后，由政策疏漏所造成的问题将会陆续地暴露出来。

(3) 根据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比例为约23%，其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40%的居民是中产阶层。如果以上两个数据准确，那么，在得出85%的家庭无力购房数据的结论前，也有必要对中产阶层购买商品房的能力进行分析。

《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称，我国的中产阶层一般由拥有生产资料的有产者，如中小企业主、农村养殖大户，以及从事医生、律师、教授、公务员、记者等职业的人群构成。其中，中产阶层中的中下阶层占68.5%，规模约为308万人，主要是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具有中初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为5923.18元，中产阶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 007.96元，折算成年收入约为12万元。

如果以2009年北京燕郊地区商品房的价格5 000元/平方米、通州区商品房的价格8 000元/平方米，购置90平方米的住房计算，房价分别为45万元和72万元。由于社科院的数据采集就是截止到2009年之前的，所以，参照上述数据，年收入为12万元的中产阶层家庭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3.75:1和6:1（ $45\text{万} \div 12\text{万元} = 3.75$ ； $72\text{万} \div 12\text{万元} = 6$ ），处在国际上认为合理的3:1~6:1之内。由此可以推算，既然我国有能力购房的中产阶层的人口规模已经占到了约23%，并且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占到了约40%，那么，这一结果显然也与85%的城镇家庭无力购房相互矛盾。

官方研究机构的报告中存在的矛盾还不仅如此。根据《经济蓝皮书》的预测，2011年房价有可能下降，或者涨幅最多为6%。然而，在中科院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 年中国经济预测与展望》的报告中，该研究中心的结论是，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将难以维持高速增长，增速将回落，但价格水平仍将上涨，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预计将增长 12.77%。同是政府所属的两家国家级权威研究机构，但是他们给出的预测结果却相差很大。

(4) 85% 其实只是一个主观数据，是对于调查对象主观意愿的调研，并不具有客观性。一方面，这其中可能包含被调查对象不符合国情和自身条件的超预期的消费倾向，实际上购买住房存在多种选择，不但有贵贱、大小、远近、新旧之分，也有在一线城市买，或在二、三线城市买的区别；另一方面，调研对象所覆盖人群的选择是否恰当，调研的内容和方式是否科学，数据的采集量是否充分，也必须都考虑到。如果调研对象都集中在上网的年轻人身上，那么结论当然是不全面的。总之，市场调研是以社会统计学和市场学为基础的，脱离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数据不可能准确，结论也不可能符合实际。

2. 是否对当前城镇现有存量房的居住状况进行了分析？

根据 2011 年《经济蓝皮书》公布的数据，2007 年全国住宅建筑存量面积是 104.35 亿平方米，2008 年至 2009 年新增竣工面积 5.34 亿平方米，2010 年新增竣工面积约为 4 亿平方米。剔除 3 年内旧房拆除的面积，至 2010 年底，全国城镇的住宅建筑存量面积为 112 亿平方米。

据估算，2010 年的全国城镇人口约为 6.4 亿人，其中包括进城农民 2 亿人。如果城镇和进城农民还是分别按人均居住面积 30 平方米和 20 平方米计算，这样全部存量住房大约可解决 4.48 亿人口的居住问题，占 2010 年全国城镇人口的 70% ($112 \text{ 亿平方米} \div 25 \text{ 平方米} = 4.48 \text{ 亿}$ ； $4.48 \text{ 亿} \div 6.4 = 70\%$)。这一数据大致表明，现有全国城镇居民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有了住房，需要购买住房的城镇居民大约为 1.92 亿人口，约合 6 400 万个家庭，占全部城镇居民的 30%。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2011年4月，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的最新数据，我国全国总人口为13.39亿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人，比2000年的3.44人减少0.34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在全国总人口中，城镇的人口为6.65亿人，占总人口的49.68%；乡村的人口为6.74亿人，占50.32%，与2000年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3.46%。由此可见，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快于以往的预期，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城镇住房需求增长的压力。

200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曾对全国57个城市的2.28万名城镇居民进行了买房意向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城镇居民中有74%的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住房，51%的人有扩大居住面积和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很明显，人民银行统计司的数据与上述的推论非常接近。

85%的家庭无能力购房的数据还可能隐含了居住面积不均的问题，即存在一部分家庭的实际住房面积超出了人均30平方米，而另一部分家庭没有住房，或者住房面积小于人均30平方米，以及存在大量的空置房。对于前者，需要做的是更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于后者，问题在于，即便按30%的最高空置率计算，112亿平方米的存量至少也能解决3.14亿人口的住房（ $112 \text{ 亿平方米} \times 0.7 \div 25 \text{ 平方米} \approx 3.14 \text{ 亿}$ ）。这样，城镇无能力购买住房的家庭总数最多能占到51%（ $(6.4 \text{ 亿} - 3.14 \text{ 亿}) \div 6.4 \text{ 亿} \approx 51\%$ ）。

除去价格的因素外，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下所谓刚性需求的住房缺口。如果城镇和进城农民人均居住面积分别还是按30平方米和20平方米计算，这个住房需求的缺口至少在60亿平方米左右。需求与供给的比例约为1.53 : 1（ $4.4 \text{ 亿} \times 30 \text{ 平方米} + 2 \text{ 亿} \times 20 \text{ 平方米} = 172 \text{ 亿平方米}$ ， $172 \text{ 亿平方米} \div 112 \text{ 亿平方米} \approx 1.53 : 1$ ）。整体地看，由于存在相当数量的大户型和一定数量的空置房，所以，此数据小于下文按市场细分所获得的2008年全国房地产市场需求与供给比为1.95 : 1的比例。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3. 用于计算“房价收入比”的数据是否准确无误？

在2010年《经济蓝皮书》中，“房价收入比”数据采集的时间段是从1999年至2009年，计算单位是家庭，调研对象分为城镇和农村。其结论是：2009年，我国城镇房价为三口家庭收入的8.31倍，农村房价为三口家庭收入的29.44倍，与国际标准比较，中国的房价过高。理由是，有数据称国际上认为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应当是3:1~6:1。在2011年的《经济蓝皮书》中，该报告对城镇和农村的房价收入比给出的结论是8.76和10.06。此处，农村的房价收入比从29.44倍大幅降低到10.06倍的主要原因是，2010年报告的数据是农村每个家庭是以3人计算的，而2011年报告的数据是每个家庭以3.5人计算的。由此可见，《经济蓝皮书》的数据还是比较粗糙的。很显然，在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农村家庭人均数是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我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剔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增长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实际增长9.8%。以每户3人计算，全国城镇居民年家庭收入约为5.15万元人民币。2008年，全国平均房价为3200元/平方米，2009年为4695元/平方米，如果以保障性住房标准为60平方米和4695元/平方米计算，房价约合28.17万元人民币（4695元/平方米×60平方米≈28.17万元），房价与收入比大约是5.47:1（28.17万元÷5.15万元≈5.47），而《经济蓝皮书》的该项数据为8.31:1。

这组数据可以说明的问题有两点：一方面，中国社科院的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不完全符合；另一方面，2008年前，我国的房价与收入比应当是大体适当的。2009年以后，如果以90平方米的商品住房为标准计算，房价约合42.25万元（4695元/平方米×90平方米≈42.25万元），房价与收入比大约是8.20:1，似乎该数据与社科院的数据接近。不过问题

是，所有3口之家的家庭都希望能住90平方米的住房，这并不符合我国现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由此可见，主观数据与客观数据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因此，为了避免结论上出现偏差，调查研究的方法必须全面和客观。

国内有个别专家对于“房价收入比”也做过计算：2009年，我国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为4445元/平方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4695元/平方米），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年，家庭平均人数按2.96人/户计算，则家庭年收入为50838元/年。这样，一个家庭6年的收入可以购买一套68平方米的商品房；8年的收入可以购买一套91.5平方米的商品房。因此，绝大多数地区房价收入比都在6:1以下，而不是8.31:1。

此外，如果再看一下动态数据，从1999年到2009年，我国的平均房价从1854元/平方米，增长到了4695元/平方米，增长了1.53倍；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从5425元/年，增长到17175元/年，增长了2.16倍，并且是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现的，所以，其结论是收入的增长明显高于房价的增长。2011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去年我国非私营企业和非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20759元和37147元，同比分别增长14.1%和13.5%，增幅均超过年GDP 10.3%的增速。

4. 是否考虑到了“房价收入比”与人均GDP的相关性？

2009年，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人均GDP为3315美元，排名世界第106位，仅为世界人均GDP平均9900美元的33.4%，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既然人均GDP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那么“房价收入比”又怎么能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呢？所以，希望在短期内使我国的“房价收入比”达到国际上3:1~6:1的水平是不实际的。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消费层次的提高必须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当前的国情相适应，这是前提。

5. 是否对“城市化”带来的影响做了深入的分析？

除去 GDP 的因素以外，简单地使用房价与收入比的不合理性还表现在忽略了城市化对于推高房价的影响。2008 年，我国城市化率从 30 年前的 20% 左右提高到 44.9%，并且每年还在以约 1% 的速度增长，而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则分别是：美国 75%、西欧 85%、日本 77%。这说明，与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道路还要持续较长的时间。现实情况是，世界上并没有哪一个国家每年有约 650 多万的大学生和 1 500 多万的农民要进城。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当然会产生大量的住房需求，这也就成了不断地推高房价的因素之一。

对于城市的增量人口的住房需求，包括有户籍，但由于家庭成员、人口、年龄和婚姻等状况的变化，有新增独立住房需要的人群，以及在大城市中无户籍，但有长期和稳定工作的人群，例如来自外地的普通务工人员 and 所谓的白领阶层。此类人群的住房需求，既可能属于改善型的，又可能属于保障性。显然，如果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也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这其中的白领阶层和高级白领阶层的收入差异和变化都较大，需要做细致的分类统计，如果仅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得到的只是主观数据，并且数据的出入可能也很大。从被调查人员的主观愿望上说，为了能在大城市居住，谁不希望房价低一点呢？所以，主观的数据很难客观地反映真实的情况。由此可见，做市场调研，进行市场需求细分是非常必要的，凡事绝不能一概而论。

国内有业内专家估计，按当前的城市化进程和国际上的经验数据，大约到 2030 年时，当我国的城市化率达到 80% 左右，居民的住房成套率，即平均每个家庭所具有的住房套数，接近 1:1.2 时，我国居民的住房需求才可能不再继续增加。此时，我国房地产业对于 GDP 的拉动作用会失去，房价也会趋于平稳。

6. 是否考虑到有关人口密度和居住环境的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密度很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在我国的国土范围内，适宜人群居住的自然地理条件却并不理想。1935年，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提出以瑗珲——腾冲线为界，将中国划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半：95%的人口分布在东南半壁，5%的人口分布在西北半壁。目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末，我国人口总量为13.3亿人，其中有94.5%的人口居住于占国土总面积的36%的东南一侧，人口密度达到362.8人/平方公里，为高人口密度区域，同时也是符合国际上按年降雨量400毫米为标准的适宜树木和人类生存的区域；另外有5.5%人口居住于占全国国土总面积64%的西北一侧，这一侧的降雨量小，是不适宜居住的地区，因而其人口密度自然也低。如图2-1所示。



图2-1 我国人口居住的地域分布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再看一下城市中人口密度的情况。2010年1月，香港《中评社》刊登了财经杂志《福布斯》（Forbes）的报告。报告显示，在世界前20名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中，中国有四个城市上榜，分别是深圳、上海、北京、天津。其中，深圳以每平方公里1.7万人的密度排名全球第5，上海每平方公里1.3万人、北京每平方公里1.5万人。显然，这些城市人口的高密度意味着住房资源的紧缺，住房资源紧缺房价自然就会高，如此房价收入比又如何能低呢？

对于大城市流动人口购买房屋的需求，首先应考虑到的是城市的容纳能力、资源和环境的条件，大城市的发展规模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很明显，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希望到特大城市去居住的要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突出矛盾集中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分析“无形之手”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学，评价“有形之手”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不过，到目前为止，可能只有极少数人的观点是建立在严格市场分析基础之上的。

多年来，政府抑制高房价的手段多集中于增加供给和限制投资性需求和投机，但是对于强劲的刚性需求，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对于高房价的影响的认识不充分，因此导致政策调控的效果不明显。这其中集中反映出的问题是，作为决策的咨询部门，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对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认识不清，市场调研水平低下，研究方法落后，调研结论失真。实际上，这一问题并不是仅存在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其他方面，如资本市场、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国际并购和海外投资等许多领域，中国遭受到的损失和走过的弯路也都不少。

二、推高房价的多种因素

2004年以来，面对我国快速上涨的房价，许多相关研究机构的专家们

也都借助各种渠道，通过各种形式发表了多种看法。归纳一下各方观点，大致可分为四种：需求拉动、供给不足和成本推动、资金推动、监管不利和政府欠账。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首先分析“刚性需求拉动了高房价”的观点。这其中既包括城镇居民对于保障性住房和改善性住房的需求，也包括高房价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关性。不过，由于缺乏全面和准确的数据支持，所以市场对于这种观点的认识是不充分的。此种观点所依据的论据可能与以下数据和事实有关。

(1) 有关保障性住房的需求。2011 年，在政府持续出台政策遏止高房价的大趋势下，政府的保障房建设规划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有报道称，“十一五”期间，全国保障房的建造量平均每年为 300 万套；2011 年，全国计划保障房建设为 1 000 万套；“十二五”期间规划中的保障性住房将达到 3 600 万套的总目标。到“十二五”末期，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积将能达到 20% 左右。那么，政府花大力气要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根据是什么呢？显然，这还是与 85% 的家庭无能力购买住房的数据有关。然而，通过前面的分析说明，该数据的准确程度还是有待进一步论证的。

据专家估计，另外一些数据表明的情况是：全世界各国完全需要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的城镇居民不超过约 10%。目前中国城市人口接近 6 亿，故此类需求最多应约在 6 000 万之内。2005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97 人，农村为 3.27 人。以每户 3 人计算，全国城镇需要保障性住房的家庭约为 2 000 多万户。2006 年我国城镇人口人均居住面积小于 10 平方米的约为 1 000 万至 1 500 万户，低于 2 000 万户。这说明，截止到 2006 年，我国城镇居民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如果国家每年投入 9 000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万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以 60 平方米作为保障性住房的标准，那么，这相当于能解决大约 525 万人，合 150 万个家庭的住房需求。

此外，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所提供的数据，2008 年前，全国所有城市都已经建立了廉租住房制度，并且已经约有 500 多万城镇居民通过棚户区改造搬进了新居。也就是说，折算下来，截止 2008 年，政府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已经使其中约 10% 的城镇困难家庭解决了住房困难。

(2) 与城市化相关的住房需求。我国用了 30 年的改革时间解决了 2 亿农民进城，平均每年约 660 万人。这其中，可能包括长期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在城镇就业的每年来自农民家庭的大学毕业生，以及通过婚姻和其他渠道进入城镇的人群。国内有专家估计，近年来我国农民进城呈现加快趋势，每年农民进城的人口约在 1 500 万人以上，再加上毕业于农民家庭的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这部分总的增量人口约在 2 000 万人以上。

2008 年 2 月，新华社报道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所属人口司 26 日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报告称，至 2050 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 40% 增至 70%，其中城市人口总数将超过 10 亿人。按这一进程，全国城镇人口的快速增加还要持续 40 年，其总量约在 3~5 亿，是现有 6 000 万有保障性住房需求人口的 6~8 倍。而国内有专家认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要远比这一速度快，即到 2030 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就有可能达到 80%。在 20 年内，估计将有约 4 亿农民转为城镇人口，从而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提前完成。因此，相比之下，即便采用保守的数据，即按政府每年解决 1 000 万人，合 330 万个农民家庭进城，用 40 年的时间完成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来计算，我国进城农民家庭的住房需求每年也约有： $60 \text{ 平方米} \times 330 \text{ 万} \approx 1.98 \text{ 亿平方米}$ 的规模。

据环境部有关人士透露，目前中国农民工可以承受 30 万元房价的人群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约占 26.6%，约为 266 万人（ $1\,000\text{万} \times 0.266 = 266\text{万}$ ），约合 89 万个家庭。按 60 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计算，则 30 万的购房款可以承受的房价约为 5 000 元/平方米。2010 年 1 月 19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2009 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数据，全国平均房价约 4 695 元/平方米，因此，这部分农民工家庭的住房需求可以在低于全国平均房价的中小城市得以解决。这一部分人群所需建筑面积约为 0.53 亿平方米（ $60\text{平方米} \times 89\text{万} \approx 0.53\text{亿平方米}$ ）。

农业人口进城，除去上述的 266 万人有在中小城市买房的能力以外，其余大部分的 734 万人，约合 244 万户只能靠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上的投资解决。如果按每户 60 平方米计算，每年这部分的需求约在 1.46 亿平方米以上（ $60\text{平方米} \times 244\text{万} \approx 1.46\text{亿平方米}$ ）。

目前，国内各城市保障性住房的价格标准一般定为商品房的 50% ~ 60%。如以 2009 年全国商品房 4 695 元/平方米的平均价格计算，政府每年的资金投入约在 3 435 ~ 4 125 亿元。这里并未将城市化对于城镇土地的需求考虑在内。然而，很显然，我国城镇土地的供应量是有限的。

（3）由家庭小型化所产生的住房需求。有专家指出：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导致城市住房需求有大量的增加。原因是，由于目前我国三代人合住一套小面积住房的约占 65%，例如在上海，这样的家庭一般有 5 ~ 6 口人，户均面积数为 66.1 平方米，只能列全国倒数第 5 位，再加上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我国又出现了高生育率，所以其结果是导致“80 ~ 90 后”家庭分裂的局面将会延续至少 10 年。

总体数据显示，2008 年我国城市的新增家庭从 2000 年的约 700 多万户增加到 2008 年的约 1 100 多万户，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 5.7%。按照这个增幅计算，2008 年这部分新增家庭大约有 59.3 万户（ $1\,100 - 1\,100 \div 1.057 \approx 59.3$ ），如住房面积每户按 60 平方米计算，则该年度的需求为：60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平方米 $\times 59.3$ 万 ≈ 0.36 亿平方米。

(4) 由消费升级所导致的改善性住房需求。2009年3月,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8年我国人均GDP为3 266.8美元。按IMF的预测,2009年中国人均GDP估计在3 600~3 800美元左右,到2010年底,将达到接近4 000美元。另据政府研究机构报道,国际上,当人均GDP在800~4 000美元时,住房需求约为人均居住面积30~35平方米,房地产市场将进入高速发展期。不过,现实的情况是,2006年5月国家出台的“国六条”细则只是将户型建筑面积的限制标准规定在90平方米以下必须达到70%,而不是60平方米或者更小的户型必须达到70%。这其中隐含的问题是:无论是我国城镇居民希望大幅度提高住房面积的消费升级需求,还是政府调控房地产的这项政策,实际上并不符合我国人口多、土地资源少的基本国情。

2008年1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表示,30年来,我国城乡建设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极大地促进了城乡建设事业的发展,城镇住房建筑面积由改革初期的人均6.7平方米,提高到2007年的人均26平方米以上。2008年底,我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为28平方米,与2007年比较,提高了28平方米,增长率约合7.6% [$(28-26) \div 26 \approx 7.6\%$]。由于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家庭所占比例是6亿城市人口的90%,约为5.4亿人,合1.8亿个家庭,即为除去10%需要保障性住房的居民之后的全部,所以,2008年此类消费升级的住房增量需求约为10.8亿平方米(2平方米 $\times 3 \times 18\,000$ 万=10.8亿平方米),占了全部需求总量的76.6% ($10.8 \div 14.1 \approx 76\%$)。

所谓消费升级的需求,自然是由我国的中产阶层,主要是中产阶层中的上层,或称中等富裕家庭推动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2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为22.83万元。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2003年北京城镇居民平均家庭财产为47.5万元。另有学者预测，目前我国的中产阶层已经占到总就业人口的20%，如果按照目前中产阶层每年1%的速度增长，20年内我国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口的40%。2006年，一些国际著名的咨询机构也对我国的中产阶层进行了调查研究。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的报告称，到2010年，中国中产阶层的家庭总数将达到1亿户；美国美林公司预测，在接下来的1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将达到3.5亿人。

此外，美国的麦肯锡全球管理咨询公司也有报告说，今后中国的中产阶层将会出现两次发展高潮：第一次，到2011年，下层中产阶层人数将增至2.9亿人，并在2015年达到峰顶。这其中的富裕家庭2008年为160万，并还将能以每年15.9%的速度递增。到2015年，这个数字将能达到440万，成为在美国、日本和英国之后的世界第四位；第二次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扩张。到2025年，中国的上层中产阶层将能达到5.2亿人，超过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其中也包括从原下层中产阶层，上升至上层中产阶层的那一部分。

麦肯锡公司的这项调查覆盖了我们16个城市的1750个富裕家庭，其富裕家庭的标准是年收入超过25万元的城市家庭。麦肯锡的调查还指出，当前，中国的富裕家庭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南部地区，其中，30%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城市，并且居住在最富裕的10个城市中的富裕家庭能占到全国的50%。麦肯锡预计，未来中国可能有75%的新增富裕家庭将来自以上四大一级城市以外的地区，其中有33%来自于佛山、成都、宁波等六大二级城市。并且，其调研结果还显示，中国富裕家庭的年龄相对较低，平均年龄比美国和日本小20岁，其中，有80%的富裕家庭的年龄在45岁以下。

再计算一下北京中产阶层家庭住房总的需求量。因为在中产阶层中，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年轻人占了大多数，所以，如果按 540 万人中的男女各占一半，并且彼此共同组成家庭为假设，^{*}则这个人群的总体购房需求应为 270 万套，折算成建筑面积，约合 2.43 亿平方米。另外，在这 540 万人中，即便按 50% 需要组建一个家庭为假设，其住房总需求也有约 1.2 亿平方米，而 2008 年北京商品房的总供给量才是 0.4 亿平方米。也就是说，以现在的供给能力，仅解决北京这部分中产阶层的住房需求，也还需要再花至少 3 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如果在现有的供求关系下，北京中产阶层的消费观念并不是定位在 90 平方米，而是 120 平方米以上，那么房价哪有不涨的道理呢？

小结以上几个方面的情况，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导致住房需求巨增的因素共有四个：占 6 亿城镇人口中 10% 无力购房的低收入人群；城市化所产生的每年约 2 000 万人以上的农业增量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 5.7% 的城市家庭小型化所带来的新增家庭；随人均 GDP 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升级。其中，消费升级的因素所占比例最大，约为 76%。

根据 2006 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对全国 57 个城市的 2.28 万城镇居民所进行的买房意向的问卷调查，我国城镇居民中有 74% 的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住房，51% 的人有扩大居住面积和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另外，国内也有专家指出，近年来，从商品房价格上涨最快的几个大城市的市场上看，交易比例最高的还是 120 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这部分的需求约占市场总需求的 60% ~ 80%。这一数据显然与上面通过计算所得出的数据，即消费升级约占需求总量的 76% 相一致。

再看一下市场与供给方面的数据。根据业内专家测算，2007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7.6 亿平方米；2008 年为 6.2 亿平方米，其中商品房占 85%，为 5.3 亿平方米，保障性住房占 15%，约为 9 000 万平方米；2009 年为 9.4 亿平方米，三年平均增长率为 11.3%。根据以上数据列成一个表

格，并做出相应的预测，或许能使对于问题的分析更加清晰（如表 2-1 所示）。

表 2-1 近年来我国住房的供需构成与对比

城镇住房需求（2008 年）	保障房家庭	进城农民家庭	新增家庭	消费升级	总计
人口现量（万人）	6 000	20 000	3 300	54 000	
家庭现量（万户）	2 000	6 600	1 100	18 000	
家庭增量（万户）		330	59.3		
年增量需求面积（亿平方米）	1	1.98	0.36	10.8	14.1
年均增长率			5.7%	7.6%	
未来 10 年需求总面积 （亿平方米）	10	19.9	5	165.1	200
需求类型	保障房	保障房/ 商品房	保障房/ 商品房	商品房	
住房供给（2008 年）					
年实际供给面积（亿平方米）	1	6.2			7.2
年均增长率					11.3%
未来 10 年供给总面积 （亿平方米）	10	119.7			129.7

从表 2-1 中显示出的数据可以看出，2008 年，全国房地产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比例约为 1.95:1 ($14.1 \div 7.2 \approx 1.95$)，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内，需求的年平均增长幅度将超过 7%。到 2018 年，即便住房供给仍能以年 11.3% 的速度增长，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比例也仅能达到约 1.54:1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200 \div 129.7 \approx 1.54$)。因此，粗略地估计，如果没有更有效的措施，至2018年之前，全国的平均房价总体上还有继续上涨空间。

接下来，将以上通过分析所得到的数据与业内专家的说法和官方所提供的数据做个比较。2010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指出：在今后20年之内，中国住房的供求对比关系，仍处于绝对短缺的状态。另外，也还有其他几位业内的专家认同这一观点，认为我国城镇住房价格的增长最短也要持续到2030年。

201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了“2010年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暨《2010年房地产蓝皮书》发布会”。该发布会指出：当前政策主基调是“增供给、调结构、抑投资、促稳定”，不过，2010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依然偏紧。其主要原因是：①2008年竣工面积和土地购置面积均在有所减少，2009年明显减少，这对2010年市场供给至少形成预期性压力。②以趋势估算，2009年销售量在趋势之内，2008年积累的需求并未得到多大程度释放。③宏观经济环境大大好转，消费者的收入预期向好，消费者的信心增强。④经济环境的好转使2010年房地产市场开发投资较2009年将继续提高，但房地产建设投放市场有一个滞后期。另外，在调控政策的影响下，2009年下半年出现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战略扩张的态势也会有所收缩。⑤2005年以来，竣工的住宅套数一直远小于住宅销售套数。2006年~2008年，销售的套数减去竣工的套数，缺口分别为55.3万套、104.4万套、185万套和62.7万套。2009年竣工也远远小于销售的面积，供求相差2.7亿平方米。⑥从销售量的市场变化趋势来看，销售量除2008年下降以外，一直连续增长，尚未出现峰值，有继续增长的势头。因此，报告的结论是，2010年供求偏紧的压力依然存在。

参考以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并进行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推算：2009年，我国的住房需求面积约为9.58亿平方米，住房供给面积约为6.88亿平方米，供求相差为2.7亿平方米，因此，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比例约为1.39:1 ($9.58 \div 6.88 \approx 1.39$)。如果将社科院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与以上表格中的数据做个比较，可以发现两组数据存在的差距既可能与统计渠道和计算方法有关，也会与空置房有关。例如，对于需求供给比而言，表面看来，1.95:1与1.39:1的确有误差，但是，其实这也并不完全矛盾。因为前一个数据是指潜在的住房需求量与供给量的比，后一个数据是指将供给缺口计算在内的需求量与年实际的成交量的比。换句话说解释就是，既然有待售的房子，也一定有待购的客户。道理很简单，成交只有在供给与需求的条件完全达到一致时才可能完成。

通过以上的分析，得出结论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严重失衡，是推高房价的基本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随人均GDP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占据全部住房需求76%的改善型的消费升级。并且，相对而言，解决保障性住房的矛盾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困难，而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只能缓解或者适度地减少商品房房价的上涨，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对其产生抑制作用，商品房的缺口与保障性住房的缺口同样不能忽略。因此，除需要坚决遏制投机性购房以外，限制不符合国情的消费升级同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也许有人会对上述结论提出质疑，其理由是，全国不是还有价值高达几千亿元资金，需要两年才能消化完的存量住房吗？为什么没有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呢？然而，问题的答案是，房子没有卖出去，其原因无不与住房的居住环境有关。建筑房屋是开发商的事，提供住房配套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的事，两者之间在时间上需要完全的同步，否则就会出现存量住房的现象。况且，住房配套设施和城市基础建设需要政府巨大的财政投入，资金从哪里来？当然，在城市好的地段，也不排除存在开发商“捂

盘”的情况。

总之，此处希望说明的问题是，研究问题需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政府高价格出让土地，必然会推高房价；降低土地出让金，则财政收入减少，政府就难以确保住房配套设施和城市基础建设所需的投资，其结果是房子盖好了，也无法居住。

另外，对于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对于住房需求的影响也需要有所分析。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2007 年末全国总人口为 132 129 万人，自然增长率为 5.17‰。2008 年末全国总人口为 132 802 万人，自然增长率为 5.08‰。其中，城镇人口总数约为 5.8 亿，城镇化水平达到了 43.9%。另据预测，2009 年全国总人口为 13.35 亿人，2010 年为 13.6 亿人。我国人口增长已经完成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转变。所以，仅就城市本身的这一部分的增量人口而言，其对于房价的影响不大，可以忽略。

在所提及的四种观点中，认为是“供给不足和成本推动了高房价”的人不在少数，所质疑的对象既有政府，也有开发商。看上去此种观点与前一种观点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其中很可能忽略了以下某些事实。

(1) 我国国土的可耕种面积约占总国土面积的 17%，实际农业用地仅有约 18 亿亩。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用仅 18 亿亩的土地养活 13 亿的人口。另外，如果再要考虑到退耕还林、保护生态，总起来看，我国土地资源已经非常匮乏，土地供应十分有限。另外，在全国的建设用地中，需要分成基础设施用地、军事用地、工业项目用地、交通水利用地、旅游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等项；在城市建设用地中，又需要分为商业用地、办公用地和住宅用地等，而这其中，房地产用地只能占全部建设用地的 4.5%。如果再除去保障性住房用地，最终商品住宅用地就更少。这也就是开发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商敢用巨资拿地的原因所在，因为开发商看中的就是城市建筑用地资源的奇缺。

(2) 按照财政部 2010 年和 2011 年公布的数据，2009 年全国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总收入的 23.22%，约合 15 900 亿元；2010 年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 35%，约合 29 109 亿元。全国各地政府土地出让金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差距很大，有的甚至超过了 50%。有调查数据称，我国土地成本约占住房销售总价的 30% ~ 50% 不等。据此，国内许多人将其称为“土地财政”，并认为高额的土地出让金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原因。不过，这种观点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即如果没有市场需求，“土地财政”不可能存在。持反对意见的专家认为，降低土地出让价格不符合我国国情，应当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适当比例作为对保障性住房的补贴，这样更有利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2006 年，国家将提取土地出让金的标准定在 5%，24 号文将此标准提高到 10%。

涉及我国房价上涨的原因，除了土地价格的因素以外，很明显，建筑材料，包括钢材、水泥等建材的价格也在提高；能源、运输的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价格都在不断地上涨，所以，压缩建筑成本的空间并不大。例如，据中钢协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进口铁矿石的价格也一直在上涨，2008 年我国进口铁矿石达到 4.44 亿吨，同比增长 15.8%，占比总需求量达到 58.9%，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2010 年，国际进口铁矿石的价格从年初的 90 美元/吨左右，上涨到年底的超过 140 美元/吨，而进口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必然要推高住房的建筑成本。

(3) 有专家对最近几年内全国开发商的销售毛利率做过测算，其结果在 36% ~ 42% 之间。而据 2008 年有关上市公司的资料显示，这些企业的销售毛利率平均在 20% 左右。此外，另有研究机构也公布了关于房地产企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业开发费用的调研报告。该报告称，样本采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 9 个城市的数十个开发企业。报告显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净收入占其销售总收入的 26.14%。应当看到，在以上 3 个数据中，地域不同、时间不同、项目不同，以及融资成本和经营能力的不同，开发商的收益水平肯定大不相同，是否存在暴利，关键是市场竞争机制是否完善。需要认清的是，对于购房的成本而言，开发商的高利润是个问题，但不是高房价最根本的原因。

(4) 有专家指出，目前降低成本的政策空间仍然存在，包括增加供给、鼓励竞争，对保障性住房给予各种税、费的优惠政策等。有专家估计，廉租房的供应每增加 5%，则整体房价将能下降 3%~4%。然而，根据上述分析，由于商品房的需求缺口占了全部住房需求缺口的绝大部分，所以，在共同面对供不应求和城市住房土地供应紧缺的情况下，廉租房与商品房之间并不存在负相关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不可指望用增加廉租房供应的办法来降低商品房的房价，因为廉租房和商品房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消费群体和市场。

另外，我国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房子住，而是配套设施和居住环境难以跟上，其中包括房屋住宅的供水、供电、供气、供热、排污、垃圾处理，以及居住环境的交通、邮电、购物、就医、上学、健身和娱乐等条件。例如，2009 年，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公布的数据，其土地出让金用于民生的支出分为四项：①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支出为 26.5 亿元，占收入的 5.4%；②用于廉租住房建设的支出为 38.5 亿元，占收入的 7.8%；③用于城乡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为 319.46 亿元，占收入的 64.6%；④用于国有企业改革安置费等的支出为 2.51 亿元，占收入的 0.5%。

通过这组数据可以推算出 2009 年北京市土地出让金的总收入约为 490.1 亿元（ $26.5 \text{ 亿元} \div 5.4\% \approx 490.1 \text{ 亿元}$ ），并且由此可以引出以下两

个问题。一方面，用于民生项目的总支出占了市财政总收入的 73.5%
〔(38.5 亿元 + 319.46 亿元 + 2.51 亿元) ÷ 490.1 亿元 ≈ 73.5%〕，由此可见，政府的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是廉租住房建设支出的 8.27 倍（319.46 亿元 ÷ 38.5 亿元 ≈ 8.27），这说明，政府需要加快廉租房的建设固然重要，但同时重要的还在于相应配套设施的建设及其资金也需要跟上。

(5) 1998 年到 2002 年，我国经济适用房曾是供应主体，平均在 20% 左右，有的省在 60% 以上。2003 年以后，商品房建得越来越多，经济适用房建得越来越少，呈现逐年减少趋势，到后期该比例仅在 5% 以内，其中的廉租房则只占不到 1%，而大多数城市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建立此项制度。为什么呢？原因是，在利益和政绩的驱动下，由于看到 2004 年以后，随着我国人均 GDP 越来越接近于 4 000 美元，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住房需求进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有些地方政府便加大了商品房的建设，而忽略了对于城市困难居民住房需求的关注。

另有数据表明，1999 年到 2006 年，全国已经建立了廉租房制度的城市接近 78%，但是实际受益人群不大，并且实施缓慢。不过，这种情况是制度执行中的问题，对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确切的数据行事，因为全国各地区的差异很大，国家很难作出统一规定。

近期有专家提出简单明了的建议，认为建经济适用房的思路等于又退回到了计划经济的做法，应当放弃。政府的“有形之手”需要做的是提供廉租房的建设，市场“无形之手”用于自然调节商品房的价格，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因为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讲的就是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均衡与协调。此外，国内还有人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房子应分三类，高档住宅、市场调节和廉价出租房，除此之外，不当再提供其他类型的住房。2010 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黄奇帆的提法是，“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要约束”。厉以宁和黄奇帆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强调的是，政府在制定城镇居民的住房政策时，应当摒弃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所包含的另一层含义是，一方面，不应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另一方面，也不应当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论及国家城镇住房的供给能力，有一种观点不得不提。该观点认为，从分析商品房的空置面积、房屋施工面积、待开发土地面积三大数据看，我国房地产市场供给能力实际上十分巨大，理由是：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商品房空置面积一直在保持逐年增加的态势，从2004年至2008年，全国累积商品房空置面积已经有1.36亿平方米；②2008年以来，全国房屋施工面积已经超过20亿平方米，规模已经相当可观；③土地供给也并不紧张，全国尚有3.3亿平方米的已购土地待开发。

其实，有关住房的空置率问题，一直被国内各界人士所关注，其焦点在于希望借此可以判断国内投资或投机性炒房的比例究竟有多大。经过概念规范，国内现有的说法是，新建成但尚未出售的住宅与总建设住宅的比为“待售率”；已售出但没有入住，也没有出租的住宅与总建设住宅的比为“空置率”，并且空置率还分为存量市场的空置率和增量市场的空置率。

2010年上半年，媒体报道了来自国家电网公司的消息，称全国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的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国内不小的反响。因为如果数据属实，说明我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不过，此后，由于这一数据实在经不起推敲，所以该消息很快就被否认了。

那么，我国住宅的空置率到底有多大呢？根据有关报道：2003年，我国全国城镇房屋建筑面积为140.91亿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89.11亿平方米；2004年，全国城镇房屋建筑面积149.06亿平方米，其中住宅建

筑面积 96.16 亿平方米；2005 年，全国城镇房屋建筑面积 164.51 亿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107.69 亿平方米（与社科院的数据有差距）。三年中，住宅建筑面积的平均涨幅为 10%。照此增幅计算，2008 年全国住宅建筑面积应为 143.33 亿平方米。

接下来，先看存量市场。北京华远集团的总裁任志强认为，如果按照 2008 年我国城镇建筑 140 亿平方米的总存量计算，住宅的空置率不到 4%。这一数据显然还大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因为如果按 2008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累积商品房空置面积 1.36 亿平方米计算，我国存量住房的空置率只有不到 1%（ $1.36 \text{ 亿平方米} \div 140 \text{ 亿平方米} \approx 1\%$ ）。再看增量市场。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商品房空置率在 5% ~ 10% 之间为合理区。而根据北京联合大学课题组对北京 50 多个从 2004 年到 2006 年售出后入住的小区用电情况进行的调查，电表几乎不走的比例高达 27.16%。此外，也另有两家调研公司称，2010 年一季度以后，北京地区的住房空置率约在 26% 左右。不过，国内还有报道说，全国的一线城市房屋空置率已经达到了 40%，其中包括上海、北京和深圳。

表面看来，即便按 26% 的空置率计算，我国的房地产泡沫就已经很高了，更不用说 40% 的空置率了。然而，问题并不会如此简单，原因是，任何经济指标都是有边界条件的。具体来说，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除去投机炒房的因素之外，住宅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城市环境设施建设，以及供需之间的严重失衡的因素，也必须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这里需要顺便提及的是有关数据统计的问题。由于楼市出现了信息乱象，于是有专家开始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尽快拿出权威数据，似乎数据只要是由政府或者其所属部门发布的就应当是准确的。然而，如果问题真的如此简单，那么我国延续计划经济的老路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呢？应当看到的是，没有市场竞争，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无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论是做调查研究、写报告，还是收集信息和分析数据，就不可能有高水平。换句话说，对于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而言，权威性和工作上的便利并不等于科学性。

信息收集和数据处理是做好市场研究的基础，这个问题看似比较简单，但是实际却并非如此。从市场学和情报学的角度来看，信息收集和数据处理大致可以分为市场情报、市场动态、市场调研和市场发展预测四类，而每类信息和数据所具有的特点、收集方法、处理方法、分析与判断的方法，以及其最终所能提供的价值均不相同（如表 2-2 所示）。也就是说，要做好市场研究，这其中包含了许多细致和繁琐的工作。

表 2-2 市场信息的类型特征与处理方式

	市场情报	市场动态	市场调研	市场发展预测
信息特点	隐密、特殊、 不完整、难获取	突发、多发、暂短	深入、细致、全面	量化、相关性
收集渠道	特殊关系、 特殊方法	专业媒体、会议	媒体、会议、访问	统计资料、 综合数据
数据处理方式	分析、推测、完善	分类、编辑	SPSS、专家撰写	建立预测模型
分析与判断	依赖情报学、 专家的能力	要及时、讲实效	专家的知识与经验	计量经济学、 数理统计
结论与应用	决策支持、 制定发展战略	出版、发行	市场报告	价值预期、 风险测算

在这四种观点中，有关“资金推动”的观点基本上是指对于城市住房的投资需求或投机，包括了民间游资、银行释放的流动性资本和境外资本

三部分。其中，投资需求是指中、长期持有；投机是指短期炒作，一般带有贬义。不过，需要分清的是，关于资金与房价上涨的关系。由于投资或投机需求一方面是以刚性需求和供应短缺为基础，另一方面又与资本的流动性和通货膨胀的预期有关，因此很难完全避免。同其他资本项目和资产价格一样，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严重失衡，是存在投资或投机性住房需求的关键。因此，抑制投资或投机需求，应按资金的性质分别对待，出政策就必须掌握相关的数据，否则只能是无的放矢。

另外，需要认清的是，房地产市场上的投机现象与资本市场上的投机现象性质完全不同。由于我国的证券化率目前尚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我国的资本市场基本属于需方市场，上市公司是供给方，在排队等待上市，并且大型企业的上市更需要有大行情；而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则完全属于供方市场，供给小于需求，并且严重失衡。如果做进一步地解释，其含义就是，在需求大于供给的市场上抑制投机，要比在供给大于需求市场上抑制投机更加困难。具体来说，如果要分清刚性需求资金与投机性资金的区别，以下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需要引起关注。

1. 有关居民大众炒房

据官方提供的数据，2009年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有25.5万亿元，城镇居民家庭约有17142万个，按城镇居民家庭占有80%的份额计算，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每个家庭的人民币储蓄约为11.9万元（ $25.5 \text{ 万亿} \times 0.8 \div 1.71 \text{ 亿} \approx 11.9 \text{ 万元}$ ）。2009年，90平方米的商品房价格约合42.25万元人民币，如果按首付20%的按揭贷款计算，城镇居民需要的第一笔购房资金约为8.45万元，这样就占据了其全部储蓄的约70%以上。由此，可以判断，如果我国出现城镇居民普遍参与投机性炒房的现象，60平方米小户型的商品房价格应当上涨得更快。而现实情况是，近年来，从商品房价格上涨最快的几个大城市的市场上看，交易比例最高的还是120平方米以上的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大户型，这部分的需求约占市场总需求的 60% ~ 80%。所以，通过以上分析，其基本结论是，来自普通城镇居民的投资性需求不大。而过去几年，实际上住房投资或投机性需求各地区差异很大，估计的数据在 10% ~ 40% 之间，其可能的主要来源应当是民间游资、货币的流动性和境外资本。

2. 有关民间游资炒房

2009 年有报告称，目前中国有 36.4 万人的资产超过 100 万美元，中国富人的总资产合计超过 1 万亿美元，相当于 6.8 万亿人民币。如果以这笔资金的 30% 用于投资或投机性购房，其总数量也在 2 万亿元以上。2010 年 1 月 19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9 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成交量为近 9.4 亿平方米，均价估算约为 4 695 元/平方米，因此，该年度房地产的总成交额应约为 4.4 万亿元。比较一下这两个数据，2 万亿元约占 4.4 万亿元的一半，看起来的确很可怕。况且，民间游资用于投资或投机的购房资金很可能还不止 30%。当然，民间游资用于炒房的钱不会集中在一年内释放。不过问题是，民间游资炒房可以利用向银行贷款，也可以不利用向银行贷款，因此，政府如果要对其控制，必须用其他办法，并且需要分别加以对待。

2010 年以后，参与炒房的民间游资又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有数据显示，民间游资炒房进入全国一般中小城市的比例约为 20%；进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比例已经接近 50%；作为一个特例，海南一些地区的比例竟达到了 70% 以上。不过，上述数据并不一定准确。例如，根据 2011 年第 14 期《证券市场研究》提供的数据，在北京二手房市场上，来自周边省份的购房者的比例约占 27.5%，其中，河北 6.2%、黑龙江 4.3%、山东 3.9%、辽宁 3.7%、吉林 2.7%、山西 2.3%、天津 2.2%、河南 2.2%。估计《证券市场研究》所引用房地产中介机构的该组数据可能比较符合实际。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2011 年《住房绿皮书》指出，我国 35 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泡沫为 29.5%，其中，泡沫较高的占实际价格比例在 30% ~ 50% 之间，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武汉、长春、宁波、哈尔滨、大连、贵阳、郑州、成都；存在一定泡沫的占实际价格比例在 10% ~ 30%，包括广州、西安、济南、南昌、合肥、昆明、西宁、长沙；泡沫较低的占实际价格比例在 10% 以内，包括南京、重庆、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厦门、黑、银川、乌鲁木齐。应当看到，民间游资的投资或投机性购房，的确是助推泡沫的最主要、最直接的短期因素。然而，只要是市场经济，只要存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投机现象就难以避免，正确的应对方法只能是，一方面限制，一方面疏导。出台政策，也必须以准确和可靠的数据为依据，而建立在一般性的定性分析和不完整数据上的政策方案，不可能有效。

2010 年 5 月 13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文件第一次明确地表示容许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政策性住房建设、市政公用事业，以及石油、电信、航空、核电、铁路等垄断行业。国务院发布的这一项措施，被认为是对民营资本放开投资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政策。2010 年 1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国十一条”，并且其后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目的在于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的有效供给、抑制投资和投机性购房需求的相关性政策。这一现象让社会解读到的信息是，国家制定的“双向”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更接近实际。

在“国十一条”发布之后，2010 年 2 月 23 日，北京市率先出台了地方性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即《关于贯彻国办发〔2010〕4 号文件精神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有报道称“地方版”的楼市调控政策出台的地区的还有青岛、深圳、广东、浙江、重庆等多个省市的地方政府。从市场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政策的细化和差异化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此次调控政策的作用下，市场的反应是，北

京、深圳、上海等投机现象严重的城市，投资客开始抛售手中的楼盘。例如，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4月中旬以后，北京二手房房源新增了6 000套，比前期市场的平均水平上涨了50%，有些地区的房源上涨幅度则更是达到了200%。

3. 有关货币的流动性对于房价的影响

央行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年新增贷款合计9.59万亿元。其中，房地产的国内贷款加上个人按揭贷款总额为19 696亿元，占整个新增信贷的20%。也就是说，2009年，涌入房地产市场的这近2万亿元的信贷资金，的确为推动房地产价格走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2010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全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新增7.95万亿元，由此显示出全年的流动性仍然十分充分。不过，尽管如此，信贷资金所支持的只能是部分的投机购房者。

4. 有关热钱（Hot Money/Refugee Capital）或称国际游资炒房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在其出版的研究报告《当前热钱流入中国的规模与渠道》中指出：2005年至2007年三年间，流入我国的热钱累计规模超过8 000亿美元，约占2007年底外汇储备余额的54%。但是，据中行研究所的报告测算，2005年至2007年流入我国的热钱为7 080亿美元，分别是2 267亿、2 039亿和2 774亿美元。另外还有数据表明，2005年至2008年流入我国的热钱共有4 593亿美元，2009年为1 670亿美元，两项相加为6 263亿美元。按照商务部使用的残差法测算，2010年热钱流入我国的规模大约为1 593亿美元。

另有数据称，2010年我国外汇储备达2.49万亿美元，其中热钱占比为6%，即约为1 500亿美元。由于统计渠道的不同以及国际热钱流入、流出的转换快，所以以上数据有差异在所难免。不过，滞留在中国的热钱总规模有5 000~8 000亿美元的估计，可能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折算成人

民币，这笔资金的规模应当在 3.4~5.5 万亿元之间，与 6.8 万亿元的民间游资相加，这两项资金的总额将在 12 万亿元以上。

一般认为，经常项目下的货物贸易顺差、在华外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外债、非官方经常转移、投资收益等，是国际热钱流入的渠道。而国内专门进行热钱研究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黎友焕认为：国际上热钱的总规模应在 10 万亿美元以上，流入中国国内的总规模应当接近于 8 000 亿美元。而被国内官方相关机构忽略了的的热钱的流入渠道还应包括几百家的地下钱庄。这些热钱进入的领域有股市、楼市和其他的所谓敏感性商品，如曾被热炒过的大蒜和普洱茶等。由于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约为 20%~50%，因而进入国内的热钱肯定参与了楼市的炒作。不过，因为房地产项目的周期比较长，在半年以上，所以热钱并不是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另外，根据上海外汇管理局和房地产等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境外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渠道主要有三个：①直接购买内地物业，比如上海内环线以内中心城区的高档房 70% 以上的购房资金是境外资金；②成立外资房地产企业投资房产；③是以境外投资基金的方式，参与国内房地产项目的运作。

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外国企业在华的直接投资也是推动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据中新社报道，截至到 2009 年，我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超过 66 万家，累计吸引外资超过 8 700 亿美元，连续 17 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其中，有约 2/3 以上的企业是以占地面积较大的制造业为主的。因此，如果外资企业对产业地产的投资粗略地以占其总投资的 30% 计算，那么这部分间接投资我国房地产的外资总额就可达到 1 957.5 亿美元（8 700 亿美元 $\times$ 0.75 $\times$ 0.3 = 1 957.5 亿美元）。

总之，通过以上粗略的分析，可以看出，货币流动性所产生的购房资金，只占民间游资和境外资本之和的不到 1/5。所以，如果期望通过收缩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流动性来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从长期看基本上不可能，其效果只能是短期的和在心理层面上的。因为，虽然国有金融机构释放的货币流动性是可控的，但是巨量游资的去向却是难以控制的。解决的办法只能是认真研究，摸清情况，对症下药，分别对待。

最后，涉及四种观点中的“监管不利和政府欠账”的问题，前者多指国家的政策，后者多指地方政府财政与高房价的相关性。这其中的矛头所指包含了三个所谓的既得利益方——地方政府、银行和开发商。不过，此类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原因是：

(1) 由于可能存在利益输送和官员腐败，因此有关政府提供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已经被质疑，并且也有专家在呼吁叫停国家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而改建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

(2) 政府欠账的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间问题，虽然国家加快了保障房和廉租房的建设，但是距离能满足此类居民的全部需求，还需要再等待比较长的时间；另一方面是资金问题，保障性住房的配套建设，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周边环境建设，包括交通、邮电、购物、就医、上学、健身和娱乐等投资巨大，再加上，正如国内有专家所指出的，政府在保障性和廉租房建设上的欠账已经累计超过了10年，因此，需求的缺口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例如，另有学者称，从1978年到2002年，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百分比在0.33%~3.05%之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在1.79%~7.23%之间。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年均投资已经达到同期城市GDP总量2.5%和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8%的水平。可是，与联合国计划署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推荐的占GDP 3%~5%，以及占固定资产投资10%的标准比较，这一水平仍显不足。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结果可能是，住房建好了，但是仍无法居

住。长期以来，正是由于这方面的欠账过大，所以，难怪在有些地区，老百姓即便入住了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但还是将那里的居住环境称为“睡城”。

如前文所述，政府应当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要求全国的地方政府加大在城市住房建设上的投资，理论上是合理的，但是，实施起来各地区的差异会很大。由于相对于住房建设的投资而言，其他配套设施的建设，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周边环境建设的投资巨大，因此，对于财政困难的地区而言，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因地制宜，由地方政府酌情做出本地的规划。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房价的上涨既有历史因素、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历史因素与政府欠债有关；短期因素与投机行为有关；长期因素则并非是由于流动性，而主要是由于人均 GDP 快速增长产生的消费升级，以及城市化带来的城镇人口大量增加所导致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结果。

三、测算泡沫的前提和条件

2004 年以后，伴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有关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的说法一直没有间断过，然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漲却仍然在继续。正如前面所谈到的，实际上“泡沫”并非是一个绝对的、定性的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必须被量化的概念，并且任何测算泡沫的指标也必须要有条件。以股市为例，判断股市中是否存在“泡沫”需将 PE 值与利率做比较，利率水平就是测算“泡沫”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判断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需要考虑的方面则更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以及社科院近期发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住房平均价格的变化见图 2-2。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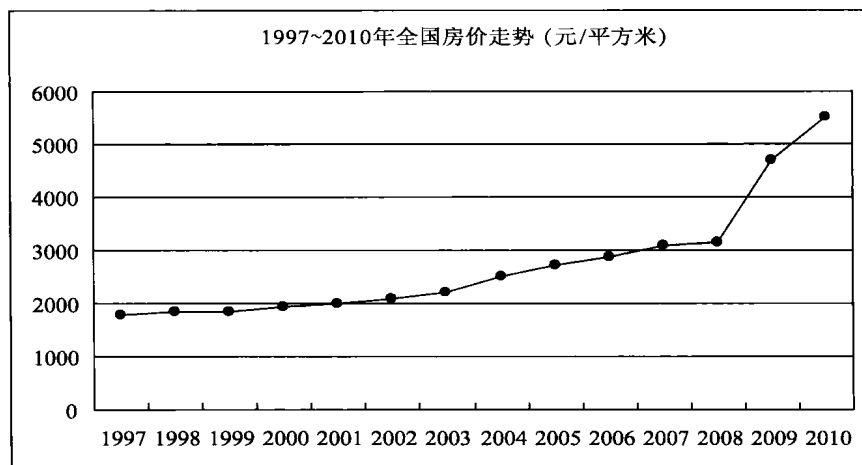


图 2-2 1997~2010 年全国住房平均价格走势

2010 年 1 月，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房地产市场数据中，2009 年的商品房均价约为 4 695 元/平方米，比 2008 年上涨了约 14.9%。照此计算，12 年来，全国房价总体上涨了约 2.6 倍，年平均增长涨幅达到了约 8%。在这期间，1997~2003 年，全国房价总体上涨平稳，涨幅约为 3.5%，基本与 CPI 保持同步；2004 年以后，至 2007 年，全国房价出现了快速上涨，增长涨幅达到了约 9%。2009 年以后，国家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开始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过全国平均房价的上涨也只是有所缓解，总体上涨的趋势并没有改变。这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几个大城市的上涨幅度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北京为例，综合国家统计局的历史数据，以及近两年来被称为《中国城市房价排行榜》的数据，从 1997 年至 2010 年，北京商品房的市场价格从 5 478 元/每平方米上涨到 22 310 元/平方米，列全国第二位，排在以 25 840 元/平方米名列第一位的杭州之后（参考图 2-3）。接下来的是，上海以均价 19 168 元/平方米位列第三位，广州以均价 12 560 元/平方米位列

第八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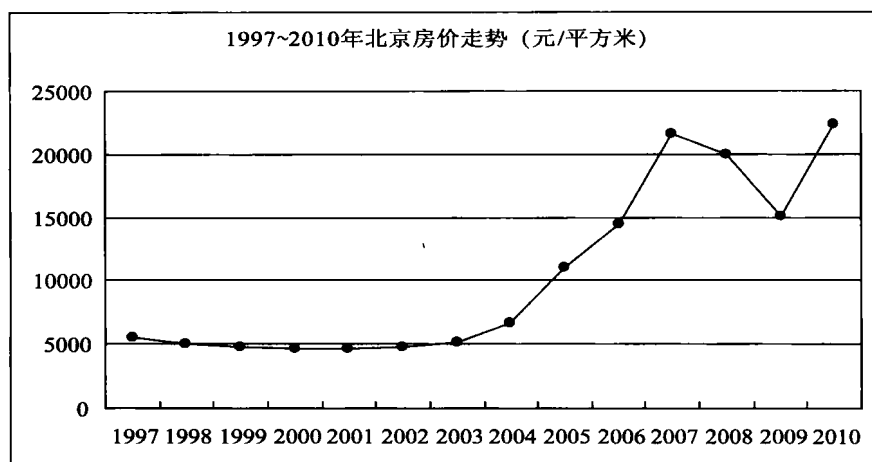


图 2-3 1997 ~ 2010 年北京住房平均价格走势

2004 年以后，全国房价出现的大幅度上涨，以及大城市房价出现的高涨，原因之一与土地成本的快速上涨有关。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所做的调查，2009 年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 1.08 万亿元，比 2008 年增长 140%，在大城市，地价上涨的速度更快。2008 年北京城八区有 13 块地的价格接近 1 万元/平方米，包括西城区德外居住项目、朝阳区奥运村乡水源九厂东地块、望京 B29 地块等；其他区县有 12 块地的价格接近 5 000 元/平方米，包括怀柔区湖光小区甲 26 号地块、通州九棵树地块、亦庄新城 III—1 街区 F 地块等。上述这些块地的整体上涨幅度达到了 178%。

2010 年 3 月“两会”闭幕以后，北京共出让了 6 个地块，市场上“单价地王”的记录不断被刷新。其中，远洋地产下属子公司以 40.8 亿元竞得大望京 1 号地，楼面价达 2.75 万元/平方米。同日下午，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下属的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17.6 亿元的总价竞得海淀区东升乡地块，楼面价接近 2.9 万元/平方米。与 2009 年末相比，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以上的这两个价格，仅在一个季度之内就又上涨了约 45%。

那么，如何看待这几个特大中心城市高房价的快速上涨呢？这里，首先可以看一下需要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的情况。据北京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透露，2007 年，北京市总人口数量已经突破 1 700 万人，其中需要政府提供保障房的家庭，按全国平均水平 10% 计算，约为 170 万人，合 56 万个家庭。如果需要政府提供保障房的家庭每户按 60 平方米计算，需求量为： $60 \text{ 平方米} \times 56 \text{ 万} \approx 0.33 \text{ 亿平方米}$ 。

另外再看有关增量人口的住房需求。有媒体称，2009 年末，北京常住人口为 1 755 万人，比上年末的 1 695 万增加了 60 万人，合 20 万个家庭，并且，这种情况已经连续了三年。照此计算，近年来北京市增量人口的住房需求量为： $60 \text{ 平方米} \times 20 \text{ 万} = 0.12 \text{ 亿平方米}$ 。

其次是关于由于家庭小型化所带来的住房需求。2008 年，我国 6 亿城市人口的新增家庭约为 1 100 多万户，约合 3 300 万人，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5.7%。北京市总人口按 1 700 万人计算，约为全国城市总人口的 2.8% ($1\,700 \text{ 万} \div 6 \text{ 亿} \approx 0.028$)，按比例推算，北京市新增家庭约为： $3300 \times 0.028 \div 3 \approx 31 \text{ 万个}$ ，住房需求量约为： $60 \text{ 平方米} \times 31 \text{ 万} \approx 0.19 \text{ 亿平方米}$ 。

最后计算由于收入增加所带来的消费升级的需求。此类家庭的数量应为北京常住人口减去 10% 需要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以后的大部分，即约为：510 万 ($1\,700 \text{ 万} \times 0.9 \div 3 \approx 510 \text{ 万}$)。如果按保守的估计，即以全国城市每人每年增加 2 平方米，年均增长率为 7.6% 计算，2008 年北京市住房消费升级需求约为： $2 \text{ 平方米} \times 3 \times 510 \text{ 万} \approx 0.3 \text{ 亿平方米}$ 。

再看一下有关住房供给的情况。按《北京住房建设规划（2006 年 - 2010 年）》，“十一五”期间，北京市新建商品住房建设规模约 9 250 万平方米，约为 90 万套，合每套 102 平方米。至 2010 年，北京市居住用地总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面积约 410 平方公里，住房总建筑面积达到约 4.2 亿平方米，新增住房建筑面积约 1.23 亿平方米，年均约 2 500 万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规模约 1 500 万平方米，约 21 万套，商品房与经济适用房两项之和为 4 000 万平方米。

另据 2010 年“两会”期间媒体的报道，2009 年 5 月，北京市决定，通过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公租房四类政策性住房构成的全方位住房保障体系，在 3 年内可以基本解决 28 万户居民的住房困难。这样，北京市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每年能解决 9 万户居民的住房困难，折合建筑面积为 0.05 亿平方米。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列出以下表格，见表 2-3。

表 2-3 近年来北京市住房的供需构成与对比

北京住房需求 (2008 年)	保障房家庭	进城农民家庭	新增家庭	消费升级	总计
人口现量 (万人)	170			1530	
家庭现量 (万户)	56			510	
家庭增量 (万户)		20	31		
年需求面积 (亿平方米)	0.33	0.12	0.19	0.3	0.94
年均增长率			5.7%	7.6%	
未来 3 年需求总面积 (亿平方米)	1	0.36	0.63	1.03	3.02
需求类型	保障房	保障房/ 商品房	保障房/ 商品房	商品房	
住房供给 (2008 年)					
年供给面积 (亿平方米)	0.05		0.4		0.45
年均增长率					
未来 3 年供给总面积 (亿平方米)	0.15		1.2		1.35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从表 2-3 可以看出，2008 年北京住房需求与供给比高于全国，为 2.08:1 ($0.94 \div 0.45 \approx 2.08$)。但是，到 2011 年，由于需求的增长大于供给的增长，该比例将迅速拉大，约为 2.24:1 ($3.02 \div 1.35 \approx 2.24$)。这其中，导致房价快速上涨的原因主要是消费升级、家庭小型化趋势，以及投机性购房。按保守的估计，类似于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投资或投机性购房的比例可能在 30% 左右。这其中的道理也不难解释，因为地理位置和社会资源本身就是价格。举例来说，2008 年 8 月，北京至天津的高铁通车，乘坐高铁两市的之间的距离在 30 分钟就可到达。这样一些专家认为，如此方便快捷的交通，天津的房价又低于北京，所以，高铁的建成可能会促使一部分北京人去天津购房。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高铁的建成不但没能缓解北京住房的压力，反而导致一部分天津人到北京来购房。

2009 年 1 月，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 2008 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数据，北京市人均 GDP 已经突破 9 000 美元，比 2007 年增长了 9%。而早在 2006 年，我国的人均 GDP 只有 1 700 美元时，根据建设部公布的“2005 年城镇房屋概况统计公报”显示，2005 年我国城镇住房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就已经升至 26.11 平方米。如果按全国人均的住房面积计算，我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了日本。那时，日本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 34 000 美元，居民住房面积是人均 15.8 平方米。当然，日本的居住条件普遍要好于我国的一般城镇。正如有的专家所说，这里还有一个住房的消费观念和人口密度的问题，不能指望政府能够满足所有居民都能在城镇买得起房。全国平均的情况尚且如此，何况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呢？

面对 2004 年以后全国房价的持续上涨，以及 2009 年下半年以来的大幅度的上涨，国内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泡沫。但是，也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结论究竟如何，最好的方法只能是用证据和数据说话。实际上，有关测算房地产泡沫的方法和具体指标有许

多，其中包括边际生产力理论、房价收入比、租售比、房地产投资占 GDP 比、替代品价格比、空置率和投资性购房比等等。

边际生产力理论采用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房产价格的市盈率，判断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其计算公式为：房产价格的市盈率 = 边际产品的价格 ÷ 年度边际收益。如前文所述，国际上认为，当 GDP 在 800 ~ 4 000 美元时，住房需求人均居住面积约为 30 ~ 35 平方米，房地产将进入高速发展期。2009 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8 年我国人均 GDP 为 3 266.8 美元，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为 28 平方米。按照 IMF 的预测，到 2009 年，我国人均 GDP 在 3 600 ~ 3 800 美元左右，到 2010 年底，人均 GDP 将达到接近 4 000 美元。

如果全国住房保障性住房以 60 平方米为标准，大城市的商品房以 90 平方米为标准，房价分别以 2009 年末全国平均价 4 695 元/平方米和北京市四环内的 20 515 元/平方米为标准，房租分别以 1 000 元/月和 4 000 元/月为标准，则全国保障性住房的市盈率为： $(4\,695 \text{ 元/平方米} \times 60 \text{ 平方米}) \div (1\,000 \text{ 元/平方米} \times 12) = 23.5 \text{ 倍}$ ；北京市商品房的市盈率为： $(20\,515 \text{ 元/平方米} \times 90 \text{ 平方米}) \div (4\,000 \text{ 元/平方米} \times 12) = 38.5 \text{ 倍}$ 。这其中并没有将利率的因素考虑在内。

2010 年 3 月，国土资源部在其发布的《中国城市地价状况 2009》的报告中，使用了“租售比”的概念，并以不动产的投资收益作为衡量和判断我国不动产市场健康程度的指标。该报告指出，我国热点城市的住宅市场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泡沫。其计算方法是，租售比 = 年出租价格/房价（不含装修与税费）。判断标准是，租售比低于 4.5%，则说明该地区的房价存在泡沫，如果该比值高于 5.5%，则该住房尚存在升值空间。

实际上，国土资源部的这个“租售比”与边际生产力理论上的住房市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盈率是一回事，因为两者在数值上是互为倒数的，即租售比 = $1/\text{住房市盈率}$ 。也就是说，按照国土资源部的标准，合理的住房市盈率应当在 18.2 ~ 22.2 倍之间（ $1/0.0055 \approx 18.2$ ； $1/0.0045 \approx 22.2$ ）。很显然，其“租售比”的标准同样没有将利率的因素考虑在内。

前文已经有所论述，2008 年 12 月 23 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2.25 的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理论上投资收益的合理的市盈率应为 $1/0.0225 = 44.4$ 倍。这里，换成更为通俗的解释就是，如果在银行存入 100 元，年利息收入为 2.25 元，而投资不动产 100 元，年收益为 4.5 元 ~ 5.5 元，那么人们为什么不选择后者呢？所以，判断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也需要考虑到利率。

国土部所提供的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显示：从 2005 年到 2009 年，北京居住物业租价比分别为 6.42%、6.11%、4.83%、4.59%、3.81%，另外 5 个典型城市，包括上海、深圳、天津、杭州、青岛的租价比的走势也大体相同。照此估算，从投资的角度看，如果利率水平继续维持不变，并且还以北京为例，其房价的上涨空间仍然存在。

说到利率与测算泡沫的关系，另有一种方法是，用银行按揭贷款利息与租金回报率的差来估算泡沫。按照此种方法，两者之间的差超过 3%，则视为存在泡沫。国内有专家指出，根据中原地产公司提供的数据，2010 年第一季度，北京的住房租金回报率为 2.9%，上海为 2.3%，而银行二套房的按揭贷款利率为 6.5%，两者之间的差分别为 3.6% 和 4.2%，均超过了 3%，所以，其结论是北京和上海的房地产市场都有泡沫，泡沫程度分别为 20% 和 40%。

不过，这里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国际上，无论是按边际生产力理论，还是按租售比或其他方法来计算房地产的泡沫，一般其所处的环境条件是：供求基本平衡、较低的 GDP 和适度的利率。而我国的现实情况与之

完全相反，是供求严重不平衡、高 GDP 和负利率。如果将以上三个条件作为参数，也纳入计算公式，理论上其结果会更科学。但是，由于这其中的一些数值的模糊度比较高，所以要完成计算，还需要有大量统计数据的支持才可行。

通过上述计算，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按边际生产力理论，截止到 2009 年中期，我国的房产价格虽然有些过热，但基本符合市场规律。2009 年下半年以后，我国房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主要集中于部分地区。例如，2009 年三季度以后，北京连续出现了开发商高价拿地的现象，致使部分城区的房产价格在一个季度之内就上涨约 45%。这其中的原因是：①有国企借政府的救市资金低成本拿地；②有社会投机资金的介入；③有被压制的巨大刚性需求做为基础。说到此，这里或许有必要引入的一个急待思索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一些专家与投机资本比较，到底谁更聪明？

另外，涉及用所谓三项指标，即房价收入比、第二种租售比、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房产价格泡沫的方法。这其中：

(1) 有关房价收入比前文已经有所论述，这种测算方法要与我国的人均 GDP 水平相对照，不能简单地向国际水平看齐。

(2) 租售比，即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之间的比值。国际上用于衡量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良好的租售比一般界定为 1:200 ~ 1:300 之间。按照这个标准计算，同样，全国住房以保障性住房以 60 平方米为标准，大城市的商品房以 90 平方米为标准，房价分别以 2009 年末全国平均价 4 695 元/平方米和北京市四环内的 20 515 元/平方米为标准，房租分别以 1 000 元/月和 4 000 元/月为标准，那么全国平均房价的租售比为： $4\,695 \text{ 元/平方米} \div (1\,000 \text{ 元/平方米} \div 60 \text{ 平方米}) = 281.6$ ；北京市平均房价的租售比为： $20\,515 \text{ 元/平方米} \div$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4\,000\text{元/平方米} \div 90\text{平方米}) = 461.5$ 。两项指标一个接近于国际水平的上限，一个已经高于国际水平很多。不过，这里同样存在一个国情的

问题。

(3) 有关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一个来自上海市的实证研究认为，其合理的范围应在 10% ~ 14% 之内。不过，这一项指标是单纯地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待产业投资规模对于泡沫的影响，同样没有将供需的平衡状况考虑在内。

除上述的一些方法之外，还有用与替代品价格做比较，即用商业地产价格与住宅房地产价格做比较，来估计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此种方法是从市场学的角度出发。按市场学的一般理论，商品定价有四种方法：①成本定价，此种方法的适用条件是，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市场进入门槛低，供应商只能靠低成本参与竞争；②竞争定价，适用条件是市场处于垄断竞争状态，供给相对偏紧或供不应求，市场进入门槛较高，供应商依据价格策略参与竞争；③利润定价，适用条件是市场处于寡头垄断或完全垄断状态，寡头企业占有市场，市场进入门槛高，供应商的利润获取与市场竞争无关；④替代品定价，适用条件是市场商品具有相对性，存在替代关系，供应商给商品定价当然会参考替代品的价格。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近似于边际生产力理论的计算方法。

虽然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不能用上述四种方法死套，但是，这其中有两点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住宅房地产市场的确存在严重的供不应求；另一方面，从市场学替代竞争的角度看，商业地产的价格一定会对住宅房地产的价格有影响。据中国房协统计，2009 年上半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全国 31 个主要城市有约一半城市的商业地产销售下降，部分城市的商业地产销售面积甚至下降了 30%。北京市商业地产空置率达到 23%，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CBD 租金同比下降了 13.3%，上海浦东的写字楼租金下降了 11%，广州写字楼的租金跌到了 2005 年的水平。

2009 年 12 月，在第十一届《中国城市与商业地产发展论坛》会上，有专家指出，“供大于求”已经成为我国商业地产普遍存在的现象，迪拜危机的警示作用不可低估，商业地产不能再盲目地加大投资。不过，也有专家认为，目前出现的“住商倒挂”只是短暂现象，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恢复，必将导致商业地产价格的再次上升。

原因是，一方面，由于商业地产的使用年限为 50 年，低于住宅地产，拿地价格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商业地产的租售价格又高于住宅地产，例如在北京地区，住宅与商业的租售价格比为 1:3，所以，尽管商业地产没有像住宅地产那样能享受许多优惠政策，但是，其利润一般要比住宅地产高得多。再如，在 2009 年的下半年，北京处于商业中心地段的商业楼的平均价格一般都达到 2~3 万元/平米以上，三里屯 SOHO 的均价已达到 4.2 万元/平米，CBD 一带的价格上升到 8 万元/平米，有的地方甚至更高，并且其他一些大城市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况。

实际上，如果用投资回报来衡量，中国房地产公司的利润率并不高。通过查看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上市公司中房地产公司的财务报表，可以看出，这些企业的年净资产收益率多数在 2%~5% 之间，少数能达到 10% 左右，只有极个别的能超过 15%。换句话说，即使将大城市中心地段的社会资源的价值考虑在内，房地产公司也不可能用高投资回报来抵消高房价。因为商业地产的高房价是建立在供需基本平衡，甚至是供大于求的基础之上的。相比之下，如果大城市商业地产的高房价基本合理，那么其临近住宅房的价格又怎么可能低呢？

此外，具有比对效应的还有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私人汽车车位的价格。目前，在这些城市的中心地带，一个约 10 平方米车位的价格已经由十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几年前的8万元，上涨到30万元，有些甚至相当于香港的车位价格，高达70万元。如此，即便以10平方米的车位售价30万元计算，其单位价格也达到3万元/平方米。根据了解，与商品房的投机规模做比较，参与炒车位的还只是少数人。因此，这些城市车位的價格基本上反映出市場的供需关系，并且，随着地皮的紧缺，大城市车位的價格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在有些新建的楼盘，车位甚至是只出租，不销售。相比之下，一个空荡荡的车位都可以卖出如此的高价，一个设备齐全的房子又怎么能指望其大幅度降价呢？

其他用来测算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方法还有，以空置率或投资性购房比作为衡量指标的。有报道称，中国房地产空置率居高不下，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例如在上海，约有1/6的高档住宅空置；在北京，这一数字达到了1/4；在深圳，这一数字更高达1/3。并且，未来几年，中国房地产的空置率还将大幅增加。大量的住房在销售以后没有人去住，主要与炒房有关，但是，要想使数据更为精确，调研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有关投资性购房的占比和空置率的问题，前文已经有所论述，所以不再重复。总之，这两个数据属于间接指标，因此只能作为参考。

前面提到了用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方法，通过计算房产价格的市盈率，来判断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大小，其结论是，2009年全国保障性住房的市盈率为23.5倍。然后，又计算过近年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比例约为1.95:1。如果将这两种方法综合，或许能得到一种更为接近实际的估值判断方法。具体的做法是，在测算真实市盈率时，将需求供给比1.95:1，看成在4 695元/平方米的房价中有95%是应当予以去除的缺口增量，因此，2009年全国保障性住房实际市盈率的计算结果应为： $(4\,695\text{元/平方米} \div 1.95 \times 60\text{平方米}) \div (1\,000\text{元/平方米} \times 12) \approx 12\text{倍}$ 。而对于这种计算结果的文字解释，正如某专家所说的，由于存在巨大的刚性需求，所以泡沫完全有可能“化虚为实”。

四、人口、资源与环境

如前文所述，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要使约3~5亿左右的农业人口逐步进入城镇。如果按时间、地区、进程和规划，比较准确地测算出由此所导致的人口流向和流量，这不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并且完全必要。形象地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人口大迁移，出发地是农村，目标地是中国的665个城市。

2007年12月，法制日报在其推出的“中国流动人口调查”报道中指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0万人，增加到1.4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每年还以600~80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人员主要由年龄集中在16~40岁的农民工构成。农民工在城镇的工作主要以从事建筑装修和制造业为主，主要流向是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统计监测的调查，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增加值有800万左右。

再看一下几个房价高涨的特大中心城市的人口状况：按照北京“十一五”发展规划和经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的长远规划，2010年北京的常住人口的控制目标为1625万人，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然而，根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所掌握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就已经达到了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40%，比原规划提前了10年，并且超过了规划目标的10%。如果再将驻京部队、在社会上散居未登记的和短期来京探亲、旅游、就医的流动人口估算在内，北京的实际流动人口总量已超过1000万人。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近年来，由于北京已经连续 11 年干旱少雨，已成为严重缺水的城市，再加上人口过快增长，目前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10。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不但进一步增加了人口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给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带来压力，而且也使流动人口密集聚居区的环境恶劣、安全隐患和各类非法活动增加，成为城市生活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据上海市公安局透露，2009 年上海户籍人员 1 396 万余人，外来人口 682 万，其中境外人员 26 万余人，其总人口已经超过 2 000 万人。

据广州市统计局发布人口普查公报，2008 年全市总人口为 994.3 万人，流动人口已达 635.2 万人，其总人口已经超过 1 600 万人。

据报道 2009 年深圳人口总数超过 1 200 多万人，其中无户籍的常住人口有 1 100 多万，密度接近香港和东京。

如果将现有全国流动人口的总量，全部看成是城市化的一种结果，那么，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3 ~ 5 亿人口的城市化相对于目前的 2.2 亿流动人口还有 36% ~ 127% 的上升空间。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加强管理和控制，即便在常住人口不变的情况下，在 4 年之内，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几个特大中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和总人口仍然会有大幅度增加：

北京将会增加流动人口 694 ~ 1158 万，总人口将能达到 1 884 ~ 2 348 万；

上海将会增加流动人口 928 ~ 1548 万，总人口将能达到 2 324 ~ 2 893 万；

广州将会增加流动人口 863 ~ 1441 万，总人口将能达到 1 223 ~ 1 800 万；

深圳将会增加流动人口 1 496 ~ 2 497 万，总人口将能达到 1 596 ~ 2 597 万。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因此，问题是，即便不将住房、交通、邮电、购物、就医、上学、健身和娱乐等因素考虑在内，这样的一个人口数量，这些城市的自然资源和環境可以承受吗？人类生存的条件和大环境与水资源和耕地面积有关，小环境与住宅的容积率和绿地率有关。而以上4项指标又都与人口及其所占用的建筑面积相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目前，我国可供利用的淡水资源总量约为2.8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总量的6%，位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之后，居世界第4位。扣除难以利用的水资源后，实际可供利用的淡水资源仅为1.1万亿立方米。如按人均计算，2009年，我国人均淡水资源为2160立方米，扣除不能利用的淡水资源，可供利用的人均淡水资源仅为900立方米，是世界上严重缺水国家之一。全国每年缺水约400亿立方米，其中全国城市年缺水量为60亿立方米。

具体来说，在全国655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其中110个城市严重缺水。并且，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人口的增加，城市缺水的问题也将越来越趋于严重。全国有16个省、市的人均水资源量属于严重缺水，其中，部分地区的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立方米，为极度缺水。

另外，由于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北方地区河流的用水量已远超出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更严重的是，由于地下水的超采，河流断流、湖泊萎缩、湿地退化、地面下沉和海水入侵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还在进一步加剧。2007年4月，中国国土资源部公布了《2006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报告》。报告显示，截止2006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18.27亿亩，比上年度末减少460.2万亩，已经逼近了18亿亩的警戒线。

至于住宅建筑的容积率和绿地率问题，一般认为容积率不小于2.5，绿地率不低于30%是比较合适的标准。以北京市为例，以上4项指标的具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体情况如下：

(1) 水资源。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不足 300 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水资源危机线，是全国平均值的 1/8，世界的 1/30。

(2) 耕地面积。从国土资源部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提供的“北京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图”上看，北京的耕地面积越来越少。改革开放 30 年来，北京市耕地面积已经从 643.9 万亩减少到 348.3 万亩（合 23.2 亿平方米），下降了 45.9%，人均不足 0.5 亩。而世界粮油组织规定的警戒线为人均耕地面积 0.79 亩。

(3) 住宅建筑的容积率。如果按全国平均的容积率标准计算，到 2010 年底人均 GDP 为 4 000 美元，住房需求人均 35 平方米，人口约 2 000 万，容积率不小于 2.5，那么北京市所需住宅建筑面积最保守的数据是 17.5 亿平方米，更何况到 2010 年底，北京市的人均 GDP 已经突破了 1 万美元，因而其所需的住宅建筑面积会更大。

北京市总面积为 16 807.8 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有 10 417.5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62%，剩余面积为 6 386.9 平方公里，合 63.87 亿平方米。北京市市区面积为 735 平方公里（合 7.35 亿平方米），到 2010 年计划迁出人口 25 万，将市区人口控制在 650 万以内。因此，对于城市的发展而言，从剩余面积 63.87 亿平方米中，减去现存耕地面积 23.2 亿平方米和市区面积 7.35 亿平方米，尚可使用的土地仅有 33.32 亿平方米。

另据资料显示，北京市的工业和道路用地约为 8 067 万平方米和 6 272 万平方米，这两项也要剔除，因此最终剩余的可使用的土地仅有 31.89 亿平方米。当然，实际上这两项数据要比 8 067 万平方米和 6 272 万平方米少，因为其中的一部分是在现城区以内的。也就是说，如果仅从容积率和比较保守的人均 35 平方米的住房需求考虑，最极端的情况是，北京还有不到一倍的扩展空间（ $31.89 \text{ 亿平方米} \div 17.5 \text{ 亿平方米} \approx 1.82$ ），最多容纳

约4 000 万人居住。

(4) 绿地率。据悉，2008 年北京市城区绿地率已增加到 43%。另外，按北京市政府的规定，住宅小区的绿地率不应低于 30%，集中绿化不得小于 10%。按这样的要求计算，在北京剩余可用面积中还应当再减去 10%，为 28.7 亿平方米。这一数据与 2 000 万人口所需的住宅建筑面积 17.5 亿平方米相比较，看上去还有约 40% 的空间。但是，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计算结果。如果人口的增加超过 2 000 万，实际住房人均标准超过 35 平方米，容积率超过 2.5，再加上新增道路用地，并减去河流、湿地等占地，那么，北京市的人口承载能力将不会再有更多的余地。所以，说到底，更突出的矛盾还是水资源、居住环境、住宅配套设施和公共设施，而并非只是住宅本身。

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认为，凡事有利必有弊，做事需要注重均衡，不能顾此失彼。因此，如果用高房价与人口、资源和环境做比较，也许人口合理和均匀地分布，适度地利用资源，以及更好地保护好环境更重要。

五、少数派的观点

正态分布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中的一个概念，不过对于百姓而言，也许用所谓“二八”现象来比喻会更容易理解。“二八”现象所具有的一种社会学含义是，在比较简单的问题上，大多数人的观点，即所谓“八”正确的可能性大；而在比较复杂的问题上，少数人的观点，即所谓“二”正确的可能性大。例如，对于中国的股市来说，能赚到钱的人是少数，赔钱的总是多数，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对于一个成熟的市场，情况就应当是相反的才合理。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很复杂，问题也很多。近年来，政府不断地出台各种政策，希望能抑制住房价的快速上涨，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原因在哪里呢？其中之一就是一部分能影响政策的专家和经济学家观点不符合实际。进一步说就是，中国存在学术危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了 32 年，这其中我们的专家和主流经济学家当然是有贡献的。然而，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成绩属于过去，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的是新的思维、新的知识结构，甚至是新的权威。对比 20 世纪，一方面，人类已经从工业化社会快速地步入了信息化社会的时代；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许多传统的理论正在面临重大的变革。

当前，面对不断上涨的高房价，从定性的角度看问题，我国的专家和经济学家分成了两派。其中，多数的专家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泡沫，其表面原因是非理性的预期和投机性的炒作，内在原因与地方财政和开发商的利益纠葛有关。有的专家甚至明确地指出，如果国家不进行干预，泡沫破裂的时间是 2012 年。其根据是，首先，由于通胀是全球性的，当经济回稳之后，美联储将把利率提高到 5% 以上，这将使热钱流出中国；其次，为了对抗通胀并防止资本流出，中国的利率水平将会高于美国，而到了 2012 年，当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给充足、生产能力过剩，我国经济通货膨胀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届时，通胀将会终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因此，政府需要大力增加供给和遏止投机性的炒作。

国内有的经济学家还指出，必须要防止像美国和日本那样的房地产泡沫在我国出现。不过，该权威人士忽略掉的是：①美国和日本并没有中国连续 30 多年 GDP 9% 的快速增长；②美国和日本早已完成了城市化，并没有每年约 2 000 多万的农民要进城；③在美国购房不需要担保，首付款最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低的只有 3%，而在中国购房需要担保，首付款最低的也在 20% 以上；④次贷危机以后，美国购房贷款的违约率已经达到 41%，而中国在连续加息后以及政府对房地产的强力打压之下，购房贷款违约率也只在约 2% 以下。

少数专家的观点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房地产有泡沫的论点缺乏证据。长期被束缚的巨大刚性需求所导致的供不应求，是推动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最基本的原因。抑制性政策只能在短期内缓解房价的上涨，在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房价不断上涨是长期的必然趋势。这其中的动因包括：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家庭收入的不断增加和中产阶层的不断壮大，所产生消费升级的住房需求将非常可观；②在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大量的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可供建设用地资源有限；③近年来利率水平过低，并且人民币的币值也是被低估的，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巨大合力，将会不可避免地持续推高房价。

另外，少数派的观点还认为，从金融和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与美国或日本比较，我国银行系统开展住房抵押贷款业务量并不大，银行资本只有不到 20% 进入房地产市场，而 2007 年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就占了其 GDP 的 80%，这些都能使中国在今后几年的时间内不会出现房地产泡沫。换句话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是结构性的，主要存在于个别区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由于我国房地产及其关联产业所占比重最大，占到了综合经济增长率的 60% 以上，所以，房地产经济对于整体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替代，不能过分地打压。

表面上看，上述两种观点既针锋相对，又似乎各有道理，然而如果从市场学的角度看，两种观点存在的共同问题是缺乏完整的数据和深入的定量分析。通过前文所列举的数据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长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期价格将仍然会上涨，巨大的刚性需求是推高房价的基本因素，其中消费升级对房价的拉动作用最大；以民间资本为主的过度投机所造成的短期市场泡沫是结构性的，主要存在于特大的中心城市，但是近期也出现了向二、三线城市转移的迹象。

再转回有关学术的话题。当今时代，我国存在着一种不良的学术风气，这就是，一些专家对于复杂的经济问题，只从定性的分析中寻找答案，不愿做深入细致的市场研究，人云亦云，有的甚至仅凭经验、感觉、历史业绩和学术地位发表观点，如此的治学态度不纠正，后患无穷。因此，面对这样的学术氛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能忽略少数派的观点，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七、政策与市场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前的 1944 年，西方国家重新确认了战前 1934 年由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设定的布雷特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与黄金挂钩，35 美元可兑换 1 盎司黄金。1971 年 8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世界上黄金的价格一路走高。到 2008 年，黄金的历史最高价格达到了 1 032.4 美元，2010 年下半年更超过了 1 400 美元，而国际原油价格也从 1945 年的 1.05 美元/桶，上涨到了历史最高价格 147.25 美元/桶。这期间，黄金的价格上涨了约 40 倍，年平均上涨幅度接近 5%；原油的价格上涨了 140 倍，年平均上涨幅度超过 8%。

如果用我国房价的上涨幅度与以上黄金和原油价格的上涨幅度相比较，从 1997 年至 2010 年，13 年来，我国房价的上涨幅度超过了国际黄金的上涨，与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相当。2008 年，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与供

给之间的比例是 1.95:1，即需求大于供给约 1 倍，并且直到 2018 年，住房需求的年平均增长还将超过 7%。在此期间，即便住房供给仍能以年 11.3% 的速度增长，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比例也仅能达到约 1.54:1，这就是市场。

再看政策。自 1986 年至 2002 年，政府先后出台过《土地管理法》、《通知》、《23 号文》和《11 号令》等有关房地产的政策。2003 年到 2010 年，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居民住房的价格上涨逐渐加快，为抑制房价，于是政府又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调控政策。

2011 年 1 月 26 日，国务院再度推出八条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简称“新国八条”，将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家庭的首付款比例提高到 60%，贷款利率提高到基准利率的 1.1 倍。对此，有评论认为，政府实施的提高购房成本、限购和房产税三管齐下的新政基本封杀了楼市的投机，如果出现恐慌性抛售，房价要出现 30% 的下跌。当然，政府继续出台政策遏止楼市的投机无疑是正确的，不过，这其中有一点是不能被忽略的：供需之间严重失衡的矛盾短期内不可能被改变。因此，房价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下跌。

2011 年一季度，全国各地方政府为执行国务院的“问责制”，相继公布了对于各大城市房价的控制目标。其中，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武汉等城市将房价控制目标直接与 GDP 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挂钩，而北京提出了“新建普通住房价格与 2010 年相比稳中有降”，是“限购令”中最为严厉的城市。北京“京 15 条”的细则是，对已拥有 2 套以上住房的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以及对无法提供北京市有效暂住证和连续 5 年以上在北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的拥有 1 套以上住房的非北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北京市向其售房。统计数据显示，在这种局面下，一季度全国 120 个城市平均楼面地价环比下降了 15%，同比下降了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14%，为每平方米1 225元。同时，在多重政策的合力下，全国多个一线城市的土地拍卖价出现了下降，房价出现了松动。由此可见，出台“限购令”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对于政府如此频繁和密集地出台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国内有专家将其称为“政策楼市”，并且认为，每一次调控政策出台，房价总会出现短暂的下跌，但是，接下来的便是报复性的反弹，房价上涨的长期趋势不可能改变。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在国家严厉调控房价的政策下，最先倒下的可能是地方政府，而不是开发商先倒下，也不是银行。实际上，在“十五”、“十一五”期间，全国已经有约72%的土地供应给了保障房的建设方面，商品房开发只占不到30%。使用行政手段调控房价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关键在于是否能确保保障房的分配对象，而不变成一种全社会的分配。否则，估计两年后保障房政策所隐含的所有问题都会暴露出来。因为无论是国家总体经济的发展，还是个人收入与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都是相当快的。

另外，也有专家认为房地产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金融、地产是我国新的支柱产业。我国经济的整体形势将由股市、楼市的泡沫化繁荣，转变为城市化推动的基本面繁荣，但是在此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代价是高房价和高物价的出现。这种观点的内在含义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房价和高物价有其内在的原因，没有必要过分地为此而担忧。

近年来，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基本思路看，增加供给，限制非理性的投机性购房、开发商的暴利以及房地产市场上的利益输送，是其主要目标。2010年以后，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有所强化，转为在继续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型住房消费的同时，坚决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稳定市场预期，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

不过，这其中必须注意到的现状是：①随GDP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改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善型的消费升级是推高部分地区房价的最基本的因素，投机资金所起的作用是推波助澜；②由于土地资源紧缺、建设成本上升，以及大中城市中商业地产价格对住宅地产价格具有对比效应，因此，供给成本难以降低；③政府在住房配套设施上的建筑支出远高于住房本身的投资。以北京为例，根据 2009 年北京市财政局公布的数据，当年住宅配套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建设等的政府支出是廉租住房建设的约 8.27 倍，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财政来源也必须得到保证。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分析，以上有关各种相关因素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可用图 2-4 来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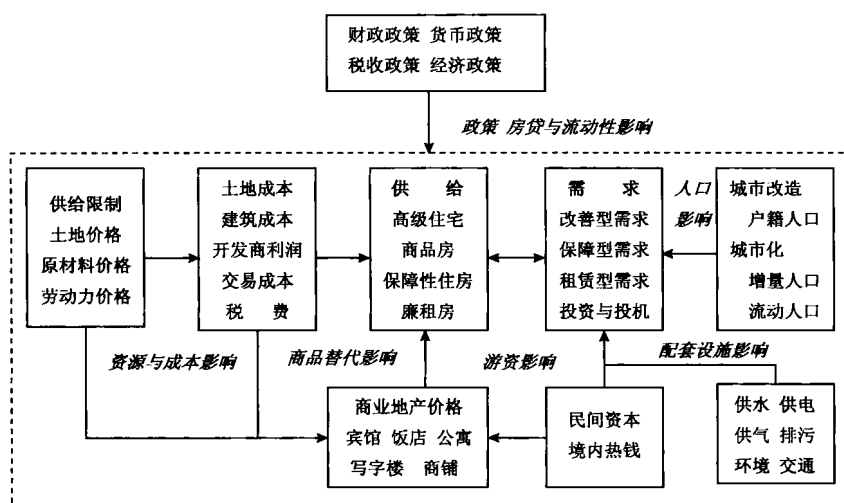


图 2-4 影响我国住房价格的综合因素

在 2010 年 3 月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重庆市住房分配体系正在实行的“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要约束”的多轨制政策，并且说：“这个社会，总会有 30% 甚至 40% 的人群，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买不起商品房，但他们

第二章 楼市中的市场博弈

又需要房子住，因此需要政府提供保障。”

对于政府如何管理商品房，黄奇帆市长认为有四个措施今后需要加强：

①确保充分的供求平衡，每年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应保持 25% 左右；②控制城市最终住房面积，按照人均不超过 30 平方米；③控制商品房价，住房所在地价应该在商品房市价的 1/3 左右；④通过征收例如“特别房产消费税”，来控制高端住房。同时，黄奇帆市长还定义了高端住房的三个特征，即：①拥有多套房；②为大户型，且很豪华；③房价比一般商品房均价高了 5~10 倍。对于黄奇帆市长的这个多轨制政策，有专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政府制定管理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就应当如此深入、细致、对症下药、分别对待，因为不了解真实的市场，就不可能有切实可行的政策。

有关政策与市场，表面上看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涉及到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论，但是，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这类问题完全可以转化为复杂与简单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过，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政策是一个具有主观性的概念，市场是一个具有客观性的概念；另一方面，这些概念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政策或者计划并不代表复杂，市场也并不代表简单。相反，政策或者计划有可能将某些问题复杂化，但也有可能将某些问题简单化；而市场本身也同样既具有复杂性，又具有简单性。

举例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完全属于一个供方的市场，许多居民的生活用品和工业品的生产和供应，都需要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居民吃粮、吃肉，要有粮票、肉票；企业买汽车和电动机等，也需要有分配指标。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放开了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将一个原先属于供方的市场，转变为基本属于需方的市场。这个整个的过程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由复杂的政策控制，转向简单的市场调节的过程。不过，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在短期内不可能是彻底的，其主要表现是，政策理念中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目前仍然

存在。再如，在资本市场上，我国是世界上惟一个一只股票有5种价格的国家，包括A股、B股、H股、法人股和限售股。在房地产市场住房的供应上，同样也有5种类型，即除了商品房以外，我国还构建了由廉租房、经适房、两限房、公租房所构成的分层次的住房保障管理体系。

与此不同的是，国内已经有专家提出参照国外的做法，除去商品房和廉租房以外，政府没有必要再向社会提供其他类型的住房。理由是，一方面，分层次住房保障管理体系中难免存在弄虚作假和行贿舞弊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各种相关因素变化很快，所以判定居民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的标准难以把握。从以上的两个现象可以看出，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和居民住房政策相比，这其中所折射出的政策理念，就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例子。

至于市场，问题则更容易理解。市场所具有的自我调节机制和竞争机制本身就体现了简单；而当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失灵，或者政策需要对市场的运行进行干预或调节时，深入地分析市场的运行规律，并对其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和预测，这必然就是一个繁琐和复杂的过程。比如，对于政府所属某些研究机构而言，由于没有参与市场竞争，所以研究方法落后，研究报告的整体学术水平低，研究结论偏离实际。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这实际上就可以被看成是将本来复杂的问题只做了简单化处理的一种结果。由此可见，把握“复杂”与“简单”之间的平衡，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而这种政策与市场、简单与复杂之间的关系，或许就可以被称为是“管理哲学”吧。

第三章 有关综合国力论

一、一篇前后矛盾的报告——中国发展了，排名却靠后了

2009 年 12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国际形势黄皮书》——2010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入选的 11 国中，排名第七位。11 国综合国力的排名次序是：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法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印度、意大利和巴西。其中，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为西方发达国家，即 G7；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为所谓“金砖”4 国，即 BRIC。

不过，在中国社科院对外公布的 2006 年《世界经济黄皮书》和《国际形势黄皮书》中，中国在前 10 个国家中的综合国力排名是处于第六，次序是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中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和印度。

两次排名变化之大，十分明显。其中，最为突出的部分是，在上一次排名中，具有一定战略核武装力量的联合国 5 个常任理事国名列前茅，而这一次排名则更注重了经济实力。具体的变化是：英国从原来的第二，下降到了第八；俄罗斯从原来的第三，下降到了第六；日本从原来的第七，

上升为了第二；加拿大从原来的第八，上升为了第四。中国的情况是，虽然第二次排名仍在德国和法国之后，但是日本和加拿大却跳跃到了中国的前面。结果是，中国发展了，排名却靠后了。

2009年的报告出台后，社会上对于社科院将上述11国列为标的国，将领土与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军事、科技列为5个直接要素指标，以及将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安全与国内政治、国际贡献4个方面列为影响要素指标，并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对于这11国综合国力的总排名和分项排名，却有不少人提出了质疑。

对综合国力有过关注的人可能知道，有关综合国力的概念，最早是由一些西方研究机构的学者在冷战时期提出的。当时，在美苏全面对抗的背景下，开展对综合国力方面研究的目的，是要用综合国力的水平来判断和评估国家的强弱，并服务于制定国家战略的需要。这其中，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克莱茵（Ray S Cline）在《80年代世界权利趋势及美国外交政策》一文中提出的“国力方程”的数学表达式： $P = (C + E + M) \times (S + W)$ 最具有代表性。

在该方程中，C（Critical Mass）表示为人口和国土面积，E（Economy）为经济实力、M（Military）为军事实力、S（Strategy）为战略目标、W（Willingness）为全民意志。在克莱茵的方程式中，S + W 被称为是“软实力”。有关“软实力”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十几年前提出的。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软实力是通过劝说和魅力，而非通过威胁或军事力量来影响别国的能力”。克莱茵对于“软实力”的理解与约瑟夫·奈不同。前者强调了“软实力”在国家内部，对于国家权力机构的执行效率所起的作用；后者强调了在国家外部，外交所具有的影响力。如果将两者结合起来应当更为全面。此外，克莱茵教授还从结构上对上述5要素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并设定了相应的权重。

第三章 有关综合国力论

将克莱茵“国力方程”的5项指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9项指标做一下对比，可以看出，虽然两者之间存在一些相同之处，但是不同之处是多方面的。那么，到底哪一个更科学呢？应当说各有侧重。

克莱茵“国力方程”的优点是：在“国力方程”的数学表达式中，“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不是并列关系，所以没有相加，而是相乘。这表明，“软实力”是一种效率因素，发挥得好，“软实力”可以使“硬实力”能变得更强，发挥得不好，就会使“硬实力”变弱。其不足之处在于：

(1) 该方程过于强调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抗，忽略了经济合作和外交影响力的作用。

(2) C项中，除去人口和国土面积以外，也应当包括自然资源与能源。

(3) 5项指标中缺少了科技T (Technology) 和外交D (Diplomacy)，如果“国力方程”用 $P = (C + E + M + T + D) \times (S + W)$ 来表示，可能更合理。如此，变动后的方程既能适用于和平发展时期，也能适用于国家间的战略对抗。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中，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即便作为一种真正的信仰，也是对内的；而强权为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的对抗，仍然是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物的基本准则。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和平发展与战略安全，两者必须均衡考虑和兼顾。

中国社会科学院9项指标的特点主要在于：突出了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其不足在于：

(1) 既然是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由战略对抗所可能导致的潜在的威胁就不能被弱化。

(2) 从战略安全考虑，如果能将社会发展和可持续性两项指标列为经济E所属的二级指标，将国际贡献归纳为外交D中的一部分，将国内政治

列入战略 S，可能更为简洁和合理。

(3) 对于各项指标的评级方法不够严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军事一项，将中国的军事力量列为第二，显然过于主观。

实际上，克莱茵“国力方程”的 5 项指标也好，社科院的 9 项指标也好，每个大项之下均可列出多个子项，甚至每个大项本身也能由一个二级方程构成。比如，在军事项中，子项又可以分为：

(1) 战略情报、通信与指挥：包括所谓“制太空权”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如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欧洲的伽利略计划、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和中国的北斗计划，以及所谓“制电子权”的信息网络的攻防能力等。

(2) 战略攻防装备与投送能力：包括远程战略核导弹、战略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即所谓“三位一体”的战略核打击力量，由远程、中程和近程的先进导弹和雷达所共同组成所谓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兵力和武器装备的远程战略运输与投送等。

(3) 国家在地缘政治与战略态势中所处的位置。

(4) 战术攻防装备与能力：包括预警机、小形化的战术核武器、中子弹、集束炸弹、电磁脉冲弹、钻地炸弹、激光武器、中程导弹、空中加油机、第 3、4、5 代战机、航空母舰、现代化的大型战列舰等。

(5) 常规攻防的装备与能力。

(6) 军事工业、科研与院校。

在军事项中，由于许多武器装备的数量、质量和技术性能，国防工业和科研的能力，以及战略部署都属于国家的核心机密，不便于公开，所以，对此不可能有十分准确的评估。即使如此，从战略的层面上说，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不可能列第二位。很明显，中国不但在现有的武器装备上存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而且在许多尖端的军事装备上也都有不少缺项。

第三章 有关综合国力论

以战略导弹核潜艇为例，央视特约军事评论员宋晓军指出：目前，世界上有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国家是联合国的 5 个常任理事国，美国和俄罗斯的是第四代的，法国的是第三代的，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明显落后很多。战斗机的情况也类似，美国和俄罗斯目前正在研制或者已经列装的战斗机是第四代和第五代的，而中国已经列装的战斗机的只是第三代的。其次，军事工业的基础差，部队长达 30 多年没有打仗，以及军事演习的次数少、规模小、强度低等也能反映中国军事力量的明显不足。

另外，我国著名军事专家、《盛世狼烟》一书的作者、空军上校戴旭也指出：我国目前所有主力战斗机的发动机全是人家的，歼-10 用的是俄罗斯的发动机，飞豹是英国的发动机，预警机 EL76 是人家的原机，我们很多大型军舰用的也是人家的发动机……

2011 年 1 月 11 日，我国第四代隐形战机歼-20 首次试飞成功，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我国的军事航空工业实现了一项巨大的飞跃。然而，应该看到的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武器装备方面双方的差距还相当大。国内有专家甚至将其称为是“代沟”性的差距。

涉及国家的战略核威慑力，可以看一下外国相关媒体有关的报道。据韩联社称，冷战结束之后，尽管各国努力裁减核武器，但当时各国拥有的核弹头总量仍达到 2.3 万枚。核弹头拥有量最多的是俄罗斯，有 1.3 万枚，其次是美国，有 9 400 枚，俄美两国的拥有量占了世界各国拥有总量的 95% 以上。其他拥有核弹头的国家，法国 300 枚、中国 240 枚、英国 185 枚、以色列 80 枚、巴基斯坦 70 ~ 90 枚、印度 60 ~ 80 枚、朝鲜约 10 枚。2008 年，在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公布的世界军力排名中，中国被排在第四位，与此同时，大部分美国媒体则把中国军力排在第三位。在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安全报告之后，俄罗斯军方认为，无论是就军事理论，还是就

武器装备而言，中国大陆和世界军事强国都有全面的差距，解放军进不了世界前五强。到了2011年，随着我国军力和军事透明度的不断提高，俄罗斯军方的看法才有所转变，但仍然认为中国的军力还是要排在俄罗斯之后。

再具体分析一下俄罗斯的军事力量。2010年5月9日，俄罗斯举行了庆祝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的红场大阅兵。在此次大阅兵上，俄罗斯展示出的两件最新武器引起了军事专家的注意。一个是俄罗斯白杨-M战略导弹，另一个是被称为“铠甲-S1”的防空系统。白杨-M战略导弹是由三级固体燃料火箭推动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达1万公里。这种导弹飞行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具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是对付导弹防御系统的有力武器。“铠甲-S1”的防空系统配备有12枚导弹和2门火炮。在战时情况下，该防空系统除了能攻击空中目标外，还可用于打击地面和水中的轻装甲目标，是应对高精度武器的有效防御系统。

另外，俄罗斯除了已经列装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图-95、图-22M和图-160以外，正在研制并即将列装的新式先进武器还包括，主要用于拦截中远距离目标的S-500防空系统。相比之下，目前我国现已列装的只是S-300防空系统。S-500防空系统能同时攻击多达10个超音速目标，攻击半径可达600公里，并能拦截以5000米/秒速度飞行、射程达3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其次，2010年1月29日，俄罗斯首飞成功了被称为“T-50”的第五代战机。该战机具备起降距离短、机动能力强、隐身性能好、超音速巡航、精确制导、全天候作战，以及良好的全向信息搜集能力。

在战略核打击力量方面，近期的情况是，2009年12月5日，由于俄美双方于1991年签署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到期，2010年3月28日，俄美两国在布拉格进行了新的核裁军谈判，双方达成共识，

同意削减约 1/3 核弹头。根据新协议规定，俄美各自部署的核弹头数量上限不能超过 1 550 枚。与其他有核国家相比，即便是这个数量，俄美两国的战略核打击力量也远远超过我国和其他的有核国家。

通过以上各种对比，可以看出，无论是就进行现代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经验、已经列装的先进武器、正在研究开发的新式武器系统，还是就核打击力量来说，目前，中国的军事武装力量都不可能超过俄罗斯，也不可能占据世界第二的位置。涉及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盛世狼烟》一书引用了美国人的评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恢复了苏联 70% 的经济实力和 80% 的军事实力。”

综上所述，既然探讨的问题是战略安全，就应当从全面的战略平衡和战略攻防的态势出发，来评估各国的军事实力，而不仅仅是罗列部分装备的数量。当然，核战争存在的可能性并不等于具有现实性。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就必须追求全面和深入，并将最极端的情况考虑在内，这也正是对于中国人所说的有备无患和“以武止武”的理解。

二、战略博弈

1992 年 9 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黄硕风大校所著的《综合国力论》。在该著作中，作者从系统动力学的观念出发，将“综合国力”看成是一个多层级的耗散结构。在这个系统的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并且系统与外部环境也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

作者的具体做法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论中的系统论、协同论、耗散结构和定量分析等方法，在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世界主要国家有关“综合国力”学说的基本概念、发展过程、指标体系，及其整体理论的基础之上，

从生存、协同、发展三个方面，给出了有关“综合国力”的逻辑框架、体系结构、动态方程，以及人口、军事、经济和科研的几项子方程。

简单地说，黄硕风大校的《综合国力论》有三个特点：①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和相关性；②注重应用技术手段，做定量分析；③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不过问题是，一方面，由于综合国力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并且具有高模糊度的系统，所以学术研究需要依赖研究人员所具有的综合性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团队整体的配合；另一方面，由于当前的学术研究水平尚低，起步之后尚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如果从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上考虑，首先需要做的是，从建立简化的系统模型入手，如此可能更有效。

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作为一项大的“软课题”研究项目，“综合国力”论本身就必然带有以下特征：博弈性、整体性、层次性、相关性、持续性。其中，博弈性至关重要。在西方冷战思维和价值观输出的强权意识的主导下，只有当西方大国和非西方大国之间在战略博弈上达到平衡，世界才有可能和平发展。当然，外交的作用也不能忽略。但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毕竟是“本”，所谓弱国无外交，正是西方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下的产物。因此，在这个由西方意志所主导的国际生态环境中，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等于无本之源。

说到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国际社会学派的著名学者、英国的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将国家的等级按实力分为四种类型：次要国家、大国、支配大国、世界大国。次要国家是缺乏军事实力的国家；大国是有能力对另一个大国开战的国家；支配大国是有能力对他国联盟开战的国家；世界大国是在全世界拥有广泛利益，并且有能力对其所拥有的这些利益提供有效保护的国家，这当然是指像当今美国这样的国家。马丁·怀特划分国家等级的标准是一种定性的标准，其主要依据就是国家的军事力量。

第三章 有关综合国力论

马丁·怀特认为，由大国支配的近代世界格局可以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1815年开始的工业革命时期；1914年开始的“一战”时期；1939年开始的“二战”时期；以及“二战”以后。他认为，这些国家中，英国、法国、俄国属于传统的欧洲大国，美国、中国是欧洲以外的后起之秀。

在《权利政治》一书中，马丁·怀特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国家体系、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同时，他也高度重视文化传统、价值观、政治理念和历史经历所具有的影响力。他认为，国家体系是由共同文化传统维系的，而国际关系则是由共同利益、价值观和历史经历之间所构成的互动形成的。此外，他更注重国家的军事实力以及国家之间的战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大国地位因暴力而丧失，正如他靠暴力而赢得一样。”

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待马丁·怀特的观点，很明显，从1914年开始的“一战”，1939年开始的“二战”，1945年开始的冷战，1991年结束的冷战，再到当今的2010年，人类社会在从近代、现代到当代的96年中，有77年都没有能脱离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和威胁。如此看来，国家之间政治与军事的战略博弈与均衡，无疑是“综合国力”之中的重中之重。要改变它，除非这个由西方强权意识所主导的世界能产生一次革命，或者“强权意识”被放弃，或者被抑制，否则就是奢谈和平。

在改革的大潮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持续了30多年。面对这样的一种趋势，西方有些人不再忍耐了，于是，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不断地被抛出。对此，中国学术界的反应是“韬光养晦”的呼声渐起。按照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的确，保持“韬光养晦”的心态，能体现出一种和平崛起的姿态。然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即便中国人这样做了，西方人真的会领情吗？

回顾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虽然西方人并不懂得什么叫“韬光养晦”，

也不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顾及其他，但是他们确信要成功，就必须有实力、有信心、有决心，甚至是有野心，并且他们做到了。西方人相信的是强权为利益，以及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这就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心态，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由此，对于发展的战略而言，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的，应当不只是科学与技术、民主与法制，也必须包括变换心态与换位的思考；中国不但需要有“韬光养晦”的策略，更需要牢记“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有着超强的军事实力。近年来，美国的国防预算已经高达4 000多亿美元，超出世界上15个大国军费开支总和。美国人会因为担心在世界上失去敌对的目标而感到恐惧，认为不知道谁是自己的敌人的人是愚蠢的，因此，只有主动地、不断地抑制敌人、打击敌人才是明智的。这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性恶论”的道德观念。在越南战争以后的十几年内，美国连续进行了海湾战争、波黑塞族战争、空袭伊拉克的战争、科索沃战争、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以及2011年对于利比亚展开的空中打击。美国所进行的所有这些战争都是主动出击，在美国人看来，对敌人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是完全必要的，并且，只有在自己处于绝对优势的时候，才会觉得安全；否则，就不安全。

三、为何要使用模糊推理

在《综合国力论》中，黄硕风先生对不同的要素指标采用了不同的量化方法。“硬”变量使用指数法，例如人口指数、土地面积指数和GNP指数等，当确定了某一个国家的数值后，便可得到其他国家的相对数值；“软”变量使用专家评测法，即所谓德尔菲（Delphi）法；“协同”变量使用模糊数学和灰色理论的方法。

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看，在“综合国力”的各项要素指标之间，甚至是不同层级的要素指标之间，必然存在各种不同的协同机制，即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此处“协同力”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国家对“综合国力”的调控能力，其二是指不同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如果将黄硕风先生的“协同力”与克莱茵方程中的S做一个比较，结论是两者似乎很接近。

在《综合国力论》中，作者对于诸多难以量化的“软”变量的处理步骤是，首先运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对模糊因素给出加权指标，建立模糊模型，然后再求解模糊矩阵。在综合国力方程中，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某些子系统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对此，《综合国力论》的作者认为，需要把已知与时间有关的数据链、事项集合、关系集合和决策集合，按一定的规律进行组合，构成动态的所谓“灰色模块”，然后再按照某种变换，运用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对其求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白色理论”、“灰色理论”和“黑色理论”，是模糊数学中对于求解具有不确定性的系统所采用的理论方法的称谓。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引述一些有关模糊判断的概念呢？因为“综合国力”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带有诸多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复杂的系统，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数据列表和算术求和而获得具有科学性的结论。所以，运用模糊推理的方法求解答案是其必然的选择。

这里，“白色理论”是指应用于系统内部的各种参数完全确定的理论方法；“黑色理论”是指应用于系统内部的各种参数属于完全未知的理论方法；而“灰色理论”是指应用于系统内部的各种参数属于部分确定、部分未知的理论方法。

《综合国力论》的作者认为，在综合国力方程的量化过程中，其中一些子系统属于“灰色理论”范畴，因而，解决问题需要引入灰色参数、灰

色代数方程、灰色微分方程和灰色矩阵等模糊数学的理论和方法。为说明问题，作者以预测某种自然矿产资源的产量为例做了解释：某种矿产有产量，就是可以确定的已知；产量的增加或减少具体有多少事先不能确定，就是未知。

作者应用“灰色理论”解决综合国力系统的思路是，从整体和边界的角度出发对系统进行综合分析：将已知的与时间相关的数据项、事件集合、关系集合、决策集合等，按某种规律加以组合，构成动态的组合物，或称为“白色模块”，然后再依照某种数学变换和解法，通过已知的“白色模块”求解未知的“灰色模块”，逐次逼近，一步一步地将“灰色模块”提高为“白色模块”。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看出，《综合国力论》确实不失为是一种尝试用技术方法论的手段来分析复杂经济问题的范例，尽管没有能创建起将问题简化的分析模型，并且过于追求使用数学的技术性手段，然而，如果与国际上许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做比较，此文作者的努力方向是无可置疑。再看一下我国的大牌经济学家，有几个人能具有这样的素质呢？在此，不妨重温一下保罗·A·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第一编第一章绪论中的一段话：“政治学、心理学和人类学都是和经济学有一定共同内容的社会科学。……在许多其他与经济学有关的学科中，统计学是特别重要的。……在经济学领域中，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也有许多极其重要的用途。然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仅仅需要逻辑推理。”试问，在我们的大牌经济学家中，对于萨缪尔森提及的统计学、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面的知识能有深入了解的，又有多少人呢？我国的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了30多年，但是并没有出现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这正是原因所在。

四、没有永远的权威

1992 年，邓小平在珠海亚洲仿真公司视察时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硬实力”中，科技力是唯一具有直接推动力的要素。一方面，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已经成为支撑其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也将首先应用于其军事领域。因此，在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战略中，必须优先考虑促进科技力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

2007 年 6 月 21 日，科技部发布了《我国国际科技竞争力情况分析》的报告。该报告引述了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于 5 月 10 日发布的世界竞争力评价结果：2007 年，在 55 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由上一年度的第 17 位上升至第 15 位。在“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四个竞争力评价体系共计 20 个子要素中，我国科学基础设施和技术基础设施的排名分别达到了第 15 位和第 27 位，总体看来处于世界中等水平（参考表 3-1 和表 3-2）。

表 3-1 2007 年我国科学基础设施竞争力评价

优势指标		中等指标		劣势指标	
指标名称	中国排名	指标名称	中国排名	指标名称	中国排名
R&D 人员全时当量	1	企业 R&D 经费与 GDP 之比	22	每十万居民有效专利数量	42
R&D 经费总额	6	专利产出率（每千名企业 R&D 人员国内专利授权量）	23		

续表

优势指标		中等指标		劣势指标	
指标名称	中国排名	指标名称	中国排名	指标名称	中国排名
企业 R&D 经费总额	6	科学研究是否有立法支持	23		
科技论文发表量	6	每百万人口诺贝尔获奖数	23		
本国专利授权量 (2003-2005 年均)	6	R&D 经费与 GDP 之比	24		
青年人对科学的兴趣是否强烈	7	本国居民拥有国外专利量	25		
学校是否充分重视自然科学教育	8	知识产权是否得到充分保护	31		
诺贝尔奖获奖数 (1950 年后, 物理、化学、生理、医学、经济)	16	每千人 R&D 人员全时当量	40		
基础研究是否增强长期经济发展	17				

表 3-2 2007 年我国技术基础设施竞争力评价

优势指标		中等指标		劣势指标	
指标名称	中国排名	指标名称	中国排名	指标名称	中国排名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	2	技术的发展和应 是否有法律环境支持	29	技术开发的资助是 否容易获得	42

续表

优势指标		中等指标		劣势指标	
指标名称	中国排名	指标名称	中国排名	指标名称	中国排名
计算机数量	3	技术标准是否支持 企业发展与创新	29	固定电话国际通信 费用	50
电信投资占 GDP 的 比重	6	公共和私营部门的 风险投资是否支持 了技术发展	30	信息技术技能是否 容易获取	51
移动电话本地通信 费用	6	通信技术满足企业 需要的程度	31	每千人计算机拥 有量	51
高技术产品出口占 制造业出口的比重	9	每千居民宽带用 户数	35	每千人因特网用 户数	52
因特网使用费用	14	计算机安全是否得 到企业的充分重视	36	每千居民移动电话 用户数	52
		企业之间的技术合 作是否取得进步	37		
		每千居民固定电话 总线数	37		

一个国家的科技力的强与弱，依赖于科研水平的高低。然而，科研水平的高低，不但与科技体制的构成、科技人员的素质以及国家在科学研究上的投入有关，也取决于学术观念与学术方法是否能“与时俱进”。

那么，回顾一下近 8 年来的改革，我国的知识阶层和学术团体是否实现了在学术观念与学术方法上的“与时俱进”呢？

看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有关全球形势的年度报告，该报告的连续发布已经有十年之久。有观点认为，近期的这个报告视角广阔、人文色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彩强烈，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与取向。然而，在《国际形势黄皮书》中，阐述“综合国力”，毕竟不同于阐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两个主题的关注点并不一样。对于前者来说，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客观、准确地评价出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家实力，才是问题的关键。

科研水平的提高与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有关，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的提高与教育水平有关，而教育水平最终体现的是专家、教授和学术权威们的知识水平与创新能力。问题是，目前我国是否存在这样一种能保证“育人之人”不断“与时俱进”的完善机制呢？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一、美元霸权和美国的“三座大山”

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下，表面看上去，像 1949 年前的中国一样，美国身上也背负着“三座大山”——每年巨额的军费开支、越来越高的财政赤字和不断增加的贸易赤字。然而，实际上美国并不会真正地为此担忧。恰恰相反，作为一种金融战略，这其实正是美国整体国家战略中的一部分。受传统功利主义价值哲学的驱使，美国有着非常明确的国家战略目标，那就是：除了使用战争和军事威胁的手段以外，通过在金融领域内建立起美元霸权的经济手段，同样可以实现其对于全球的能源、资源、粮食，以及各国核心资产的占有或者控制，并且继续将其世界的霸权维持下去。这正如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所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人；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全世界。”应当看到，基辛格所表达的绝不仅是一种个人理念，而完全是一种国家意志和战略。

那么，为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美国能采用何种具体的措施呢？一位诚实的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在其用 30 年完成的科研成果——《超级帝国主义》一文中给出了他的结论：

(1) 二战以后，在长期的地缘战略和金融外交的运作下，美国建立起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金融清算体系，使美元成为全球唯一的一种“超主权”货币，从而控制全球的国际贸易。

(2) 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诱导，积极地倡导和推动世界各国的资产，尤其是国家核心资产的私有化运动，为美国及国际垄断资本的侵入和控制创造条件。

(3) 借助在金融和信息技术上的优势，大力推动资产的证券化和金融化，以实现通过对于虚拟经济的操作，完成对于他国实体经济的侵占和控制。

(4) 一方面，放任国际垄断资本的金融投机；另一方面，在由于过度金融投机造成金融危机之后，又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中介，实施对于目标国家核心资产的侵占和控制。

(5) 大力宣扬自由市场经济和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诱使各国中央银行放松金融监管的力度。

(6) 借助于在金融和外交上的实力，通过对于利率和汇率的控制，以及双重的债务标准，确保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

在《超级帝国主义》一文中，迈克尔·赫德森揭示了这样的现实：美国之所以能实行这样一种扩张性的战略，其物质基础在于美国拥有超强的综合国力，包括强大的军事、科技、金融实力、丰富的资源和粮食。而所有这些实力均可以转换为一种金融资本，包括现量和存量的货币资本。因此，可以说，虽然美国出现过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但是美国政府并不会破产。

通过迈克尔·赫德森的结论，人们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是：在预测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时，不能像某些专家所采用的视角那样，仅以其债务占 GDP 的比例，以及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为标准，来评估美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国的经济前景，而且美国所拥有的综合国力，美国所建立起的美元霸权，以及美国所拥有的所有资源和全部存量资产必须也被考虑在内。

2010年2月，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在向国会递交的2011财政年度预算案中，总预算额为3.83万亿美元，政府预算赤字为1.56万亿美元，国防预算为708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虽然面对巨额债务，但是美国决不会通过出卖黄金、能源、矿产、高技术和国家核心资产来平衡负债。原因是，美国拥有超强的综合国力和美元霸权，这就是他们可以用来平衡负债的资本。有专家估计，即便沿着这种扩张性金融政策一直走下去，美国至少还能再维持几十年。

不过，面对同样的一个现象，也有观点出于不同的视角。美国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最畅销的作家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就对美国政府的金融政策表示过担忧，他写道：“我们因此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不得不从欧洲借钱来防范欧洲，不得不从中国和日本借钱来防范中国和日本染指海湾的石油，不得不从阿拉伯、苏丹那里借钱来保证伊拉克能安享民主……我们从防范着的那些国家借钱，以便我们能够继续防范他们……”

涉及美国政府的金融政策，在上述两个人的观点中，一个将其看成是国家战略，另一个却使用了“不得不”的字眼，那么，到底哪一个更有道理呢？其实，如果再能深入地比较一下，便可做出判断。显然，帕特里克·布坎南忽略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美国价值哲学的核心就是只顾眼前利益的实用主义；另一个是，美国有超强的综合国力，这就是其采取扩张性金融政策的资本。

当今的世界金融已经完全被美国所操控。在美元霸权战略的主导下，美国一方面通过进口外国的廉价财富，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债务美元，维持其高额的军费开支和泡沫消费；另一方面通过迫使外国政府购买其国债，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回收美元，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在这样一种国际贸易的循环之中，繁荣属于美国，危机由全世界共同承担。因而，实际上美国已经彻底地绑架了世界经济。正如迈克尔·赫德森在书中所说：“美元霸权导致当前全球金融处于一种恐怖平衡状态，任何实质性的变革都可能招致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彻底崩溃……”

如何来证明美国成功地实施了这样一种货币帝国主义的国家战略呢？日本、俄罗斯、欧元区、亚洲的一些新兴国家、南美洲的阿根廷等国家所遭遇到的经济衰退，就是很好的例证。1985 年末期，在美英日德法五国财长签署“广场协议”的几个月之后，日元对美元的兑换率被迫从 250 日元兑换 1 美元，上升到 149 日元兑换 1 美元，升值幅度为 67.8%。由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日本的制造业和对外出口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却引发了日本股市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上扬。到 1990 年初，日本的金融泡沫终于破裂，股市暴跌 70%，房地产市场 14 年持续走低。

20 世纪 70 ~ 80 年代，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逐渐流行，并在西方思想理论界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同时也对于欧洲的非西方国家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观点认为，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向全球扩张的一种结果。

也许有人会有疑惑，金融危机过后，在美国国内，那些倒闭的公司不是也包括美国为垄断资本服务的金融机构吗？其实，这也只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最高垄断阶段之中，各类大、小垄断资本之间的博弈。依赖上述的资本链条，像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一样，通过精美的业务模式的包装，以及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和流程，公司可以倒闭，雇员可以失业，最终的赢家只能是终极垄断资本和国际金融炒家。从马克思（Karl Marx）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资本越来越趋于高度的垄断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终极垄断资本和国际金融炒家当然明白这样的道理：财富是相对的和动态的——当全球的经济步入了衰退，财富开始大幅度地缩水，消费从未来回归到了现在，虽然看上去自己的钱袋瘪了，但这却是趁火打劫，用超低的价格聚敛财富的绝佳时机。因此，结果是无论经济周期如何波动，垄断资本的财富只会不断地增加，因为，不是哪一个政府，而是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这就是西方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的价值哲学！

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体系下，每一次危机爆发的时间和地点可能带有偶然性，但是其中的必然性是市场垄断总是在向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2008年，发生在华尔街的这场金融危机，使两房（房地美、房利美）和AIG集团被政府接管；五大投资银行中，雷曼破产，美林和贝尔斯登被收购，只有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尚可自保。而此后，收购了美林证券的美国银行和收购了贝尔斯登的摩根大通等必将在华尔街获得更大的主导权。

二、美元的本质

在这场由美国房地产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近年来出版的许多中外经济著作中，以下的观点颇为常见：在击垮了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30多年之后，美国通过印发更多的美元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它已完全颠覆并彻底绑架了世界经济。这正如《金融战争》一书所说：“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最重要的是，美国实质上已以垃圾债券和其他结构性金融产品建立并经营一种新型金融部门，而十年后，其他贸易伙伴对此才有所理解。借助美元霸权，美国步入金融资本主义，而其他贸易伙伴落入工业资本主义。”“……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是全球惟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一的超级大国，债权国反而越来越多地失去其制定国内政策、央行金融政策和保留公共资源的自主权。”

此外，也有许多专家著书立传，批评美国政府金融监管的不利，并详细地论述了华尔街业务模式的问题所在，然而，此次金融风暴反映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美国国内，其自身在社会结构、国家体制、经济理论上和管理机制上，已经完全具有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属性，而事实上，美国国家机器的最终服务对象就是这种金融垄断资本。超级富人们大量地占有社会财富，他们手中有大量的金钱，但是他们的社会行为模式是继续追逐高额利润、聚敛财富，而不可能成为推动创新、发展生产、拉动消费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动力。因为与其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投入相比，超级富人们的消费规模已经完全达到了饱和状态。

在国际上，美国政府的金融战略是：

第一步，一方面，用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支持其每年巨额的政府和军费开支，维持其全球的军事霸权；另一方面，用不断增加的贸易赤字，进口大量廉价的能源、资源和商品，而仅向其国际贸易伙伴支付没有任何实物支撑的美元。

第二步，用财政部发行的政府国债，平衡其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并迫使其贸易伙伴用美元大量地购买，借以鼓励他们继续向美国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以实现向债权国征税，而与此同时，其任何的核心资产和高技术的出口则被严格禁止。

第三步，将政府国债抵押给由私人垄断资本控制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再由美联储大量地印刷美元纸币，然后转入流通。

第四步，通过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利率等货币政策，以及流通领域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信誉评估机构和保险公司等，制造出在信贷泡沫、消费泡沫和房地产泡沫下的低通胀、高就业的表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象繁荣，最终将风险转嫁给国外的投资者和国内的大众消费者。

通过打造这样的一条资本链条，美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在牺牲了国际贸易伙伴和国内大众消费者的利益的同时，只为国内的私人垄断资本和国际金融炒家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由此可以看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的金融垄断阶段，民主普选其实只是一种形式，政府的权利已经完全被私人垄断资本所控制。美国政府金融战略的实质是，对于一切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原则的美国而言，国家和政府的信誉并不重要，只有私人垄断资本和国际金融炒家的利益是永恒的。

那么，美国实施这样一种战略的技术条件和环境有哪些呢？迈克尔·赫德森指出：其一，是世界经济金融化（或称证券化），不但包括银行、保险、投资公司、证券等金融机构，也包括房地产、能源、资源和垄断性公共设施；其二，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框架下，主导了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其三，是世界资产的私有化。在国际贸易中，美国已经为全世界制定了一个双重标准，通过由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和所谓华盛顿共识，美国可以胁迫其债务国向其出售核心资产；而相反，作为美国的债权国，任何试图收购美国核心资产的行为都会被看成是一种敌对行为。对于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和经济理论家们，美国政府一方面打着新自由主义旗帜，大力宣扬自由化和私有化，另一方面却秘密地通过对于全球信贷的控制，从全球贸易中获取利益。美国所玩弄的这套金融骗局的理论基础，就是基于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

对于应如何看待美国经济政策的本质，2008年初德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F William Engdahl）写了一本《石油战争》，分析了在西方“强权为利益”的政治理念之下，由石油、金融和权力所演绎出的世界近代史与现代史，并且将其称为“石油地缘政治”。首先，威廉·恩道尔描述了近代的英国在追逐世界霸权上的原则。他写道：“英国外交政策追求的是一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个玩世不恭的信条，即英国决不与其他国家建立感情或道德的关系，不把它们当作相互尊重主权的伙伴，而只强调自己的利益。”“进入21世纪初期的现实与1919年的现实没有两样，仍然是地缘政治的现实。只要控制了黄金和石油，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会臣服于大英帝国的权杖之下。”他还引用了另一位德国银行家的话，“英国的政策总是以对抗欧洲大陆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强国而定。”由此，人们能够联想到的是，既然过去的英国是这样做的，当代的美国当然也会这样做。

威廉·恩道尔认为，美国所谓的自由、民主与和平完全建立在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霸权之上，而支撑其霸权的两根支柱是超强的军事力量和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因此，他的结论是：华尔街宁愿牺牲美国的经济繁荣，也不会容许他人染指其金融霸权。对于世界经济情况当然也一样，以20世纪70年代当时在亨利·基辛格主持下的美国经济政策为例，威廉·恩道尔写道：“美国政策的重点是控制世界经济，而不是为了发展世界经济。”

接下来，威廉·恩道尔又评价了现代的美国在追逐世界霸权上的所作所为。该书似乎在揭示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国家战略实际上一直在步英国政治哲学的后尘。他写道：“美国人，或者说东海岸利益集团中主张向外扩张的人士认识到，要想成为战后的世界统治者，美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英国的合作及其统治世界的知识。”

作者在书中的第十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的引言中分别写道：“英美精心设计的美元体系，席卷了世界各地的财富。围绕着控制与反控制，欧洲共同体、不结盟运动以及其他国家与英美金融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血腥而不见硝烟的战争。”“为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四面出击，压制和瓦解各种可能出现的新生力量，日本、亚洲四虎、俄罗斯、巴尔干各国，一切新崛起的潜在力量都是她的敌人。”“布什新政府与石油的深厚渊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源，决定了美国经济与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石油。”

对于美国的霸权行径，威廉·恩道尔指出：“华盛顿的外交政策完全背离了美国开国先哲们的政治理想，在伊斯兰世界引起极大公愤。”“当今国际事务的大多数国际观察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冷战并没有因为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而结束，也没有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结束。事实上，直到今天，冷战从来也没有结束。”不过，对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前景，威廉·恩道尔并不悲观，他写道：“美国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泥潭，很像当年的越南战争，整个世界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华盛顿的政策越来越好战，正使自己孤立起来。”“2008年年初的几周里，不仅美国利用巨大军事作为外交政策工具遭到失败；更为根本的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力量由于房地产‘次贷危机’正在蒸发。”

美籍学者廖子光在《金融战争》一书中也有对于当今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评价：在美国国内，1%的最富裕人口占有40%的国家财富和90%的商业财富；在全球范围内，“世界银行估计，在过去的二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全世界新增了高达2亿的贫困人口，使世界贫困人口总数超过15亿，占世界62亿人口的四分之一。”“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全球贸易都已成为剥削弱者以强化强者的工具。”“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将国家债务平均分配给全国民众，而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把所有财富分配给富人。”文明的悖论是：人民的财富和世界的资源被无情地掠夺，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仍然还在热情地追随着那些特殊利益集团所高度宣扬的“民主和自由”。因此，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后，或许文明又走到了需要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的时候了。不过，还是有必要再重温一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那句话：“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为距离马克思所处的那个年代，世界毕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权力与利益的“三角形”——政府·美联储·华尔街

分析和判断由美国所引发的这场空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元将来的走势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应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层面的和学术性很强的问题。进一步说，对于挖掘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历史与社会根源，不仅要认真分析华尔街的业务模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国政府的金融监管，更应当深入地分析美国社会的本质、美国的国家战略，揭示垄断资本主义最终所维护的财富分配机制。相对而言，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或国际金融理论揭示的只是现象，而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才是本质。

一位曾在美联储有9年工作经历的美国人伊森·哈里斯（Ethan S Harris）写了一本书——《伯南克的美联储》。书中，哈里斯对美联储的机构及其属性做了简单描述：1913年，美联储根据《联邦储备法案》建立。成员由7名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和12名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组成。7名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由总统任命，再经国会批准，任期14年。美联储主席每4年由总统重新任命。对美联储理事的弹劾案必须经过参议院2/3的赞成票同意。在美国，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只有中央银行不受政治势力干预，才能确保低的通货膨胀率，因此中央银行必须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不过，从美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看来，作为独立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并没有起到其预期的作用。1929~1933年由美国资本市场起发的经济危机无疑是最为严重的一次，其结果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部门的严重衰退，生产下降了30%以上，贸易总额缩减了70%，3000多万工人失业。有专家指出，一方面，由于美国20年代经济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繁荣的基础不稳固，分期付款和银行信贷刺激了超前消费和市场的虚假繁荣，并使股票投机活动猖獗；另一方面，由于少数垄断集团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造成国民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巨大，5%的最富有者占有国民收入的1/3，造成社会实际消费受到制约，这两个原因是导致此次经济危机的根源。

此外，《伯南克的美联储》一书的作者也列举了少数几个指责美联储的政策总是偏向金融机构和有钱人的例子，并将这些人称为民粹主义者，如民主党国会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和亨利·岗萨雷斯（Herry Gonzalez）。不过，正如哈里斯所说，美国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美联储有阴谋控制全球经济的倾向，而指责美联储的政策偏向有钱人的，也只是极少数的民粹主义者。因此，虽然作者在其书中引用了“美联储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小标题，但是，从通篇文章看，其实哈里斯仍属于技术派，他的头脑中并没有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意识。因为很简单，从效果论出发，现实是美国贫富的差距在加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在下降。

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政府也好，美联储也好，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双重角色的机构。对内，他们是四种势力平衡的产物——垄断金融资本、军事复合体、新兴产业与高科技企业，以及资源与传统制造业厂商；对外，他们维护的是美元霸权和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

谈及美国相关的历史，《货币战争》一书追述道：“‘金钱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与美国民选政府在南北战争前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双方在美国私有中央银行的建立这一金融制高点上进行了反复的殊死搏斗，前后共有七位美国总统因此被行刺，多位国会议员丧命。”“他们不会忠于任何国家和政府，相反他们控制国家和政府，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内利用美元和美国的力量，但是，当他们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可以随时攻击美元，从而制造世界范围内1929年级别的经济危机，以严重的危机促使和胁迫各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国政府放弃更多的主权，施行区域货币和区域政府制度。”

《货币战争》的作者指出：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法案》获得通过，“美国选民政府终于被金钱权利所颠覆。”“他们策划战争，他们挑动战争，他们资助战争，国际银行家们华丽的大厦，从来就是建立在死亡枕籍的废墟之上。国际银行家的另一个赚大钱的手段就是制造经济衰退。”“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凭金钱玩弄的道具。”

对于当今的这个世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会承认是由西方主导的。西方的历史学家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由于世界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促使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后，在经历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前期的启蒙运动，直至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生了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工业革命，西方开始步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有关西方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一书中写道：“中世纪后期，向强大的民族君主政体发展的政治趋势，使上面提到的宗教好战精神、思想骚动、经济活力和技术进步这四股力量结合成一体，并指向外部世界，从而大大地促进了西欧的扩张。”“最后，通过扩张，西欧财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强；到19世纪时，已能渗入并控制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

那么，历史从现代发展到当代，在美国的社会里，政府、富人、穷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现实是，作为执掌美国国家经济和金融命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完全为私人所拥有，美国政府的全部权力机构，包括总统、国会、最高法院都无权改变其决策，而那些为美联储的大股东们效劳的正是华尔街的各种对冲基金。这里引用一句被称为国际金融之父、欧洲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的犹太银行家梅耶·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曾经说过的话，可能更耐人寻味，他说：“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有数据表明，这些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的总规模已经超过了1.4万亿美元，占到了2009年美国GDP14.33万亿美元的1/10。很明显，有技术分析功底的人都能明白，依赖于这样的机制和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国际金融资本操纵美国的货币，当然是绰绰有余。

同样，对于世界其他的经济体而言，美国政府所一贯代表的也是这一小部分超级富人的利益。自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批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除美国以外，美国政府长期采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一步一步地彻底绑架了世界经济。通过实施这样一种长期的金融战略，美国实际上已经将全世界的财富，当然也包括美国民众的财富，逐步地转入了超级富人的手中。

像任何国家的体制一样，美国的国家机器所体现的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行政结构，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结构，而是一种政治经济的复合结构。很自然，任何问题均有两面，美国政府的策略并非对其自身完全没有伤害。在实用主义哲学、霸权政治和超级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下，一方面，在美国国内，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国家的纳税，政府最终主要依赖的只能是美国民众；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当掌握有美元总量2/3的外国人充分认识到美元的危害，对其失去信任，并大量抛售美元和美国国债的时候，美国政府又如何能确保其政权稳固、执政有效，以及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呢？

一部由中央电视台历经2年创作的大型电视记录片及其同名图书《华尔街》，让人们对于这个由西方的价值观所主导的世界金融中心有了一些了解：1664年，在战胜了荷兰人之后，英国人占领了纽约的曼哈顿。荷兰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人从阿姆斯特丹带给那里的是股份制公司、股票交易所和货币汇兑银行，英国人带去的是国债、跨国银行和中央银行。

1789年4月30日，美国取得了对英国的独立战争的胜利，其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宣誓就职。“而这个崭新的国家，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已经破产了。”《华尔街》一书写道。危难之际，作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提出了政府用新债代替旧债，留住国家信用的所谓“旋转门”计划。然而，这个“旋转门”计划遭到了反对，因为它挑战了以《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第三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为首的开国元勋们建国时的共识。那就是，制约中央政府的权利，建立一个小的中央政府，而给予个人更多的权利和自由。由此，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分歧也导致了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产生。1790年6月，杰斐逊终于被说服，“旋转门”计划得以通过。“此后，华尔街和华盛顿沿着不同的方向各自成长，开始了政府权利和金融势力之间的扶持和较量。”1913年9月，在华尔街与华盛顿经历了又一番的斗争和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国会批准了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即美国中央银行的设立……

不可否认的是，电视记录片《华尔街》为人们了解世界金融的发展史，以及金融业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不过，其中的不足之处在于，该片基本忽略了对于华尔街与美联储关系的揭示。因为现代的美国是一个由美国政府、美联储和华尔街为主体的社会体系，如果不从这三方的关系中看待美国，那便不可能深入地了解美国，同时也不可能真正地了解华尔街。好在另一部同名的美国大片《华尔街——金钱永不眠》为此做了补充。表面上看，该片虽然是一部颂扬道德和理性，抨击人性贪婪的故事片，但是从另一个侧面看，该片很像是一部能反映当今美国权力社会缩影的科教片。通过电影台词中的只言片语和其中的一些细节，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美国政府、美联储和华尔街三者之间存在着紧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密的联系，美国社会就是由这个权力与利益所构成的“三角形”所控制的。

论及华尔街和美联储的关系，《货币战争》一书中，作者引述了约翰·穆迪（John·Moody）在1911年所说的一段话：“华尔街的七个人现在控制了大部分基础工业和资源。其中，J. P. 摩根、詹姆斯·希尔、乔治·贝克（纽约第一国家银行的总裁），属于所谓摩根集团；其余四人，约翰·洛克菲勒、威廉·洛克菲勒、詹姆斯·斯蒂尔曼（国家城市银行总裁）、雅各布·希夫（库恩雷波公司），属于标准石油城市银行集团。他们所构成的资本的核心枢纽控制着美国。”对于约翰·穆迪的话，作者的注解是：“华尔街的七位大腕是建立美联储的真正幕后推动者。他们之间及其与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协调，最终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在美国的翻版。”

一部作品在内容上的取舍是具有主观性的，此处《华尔街》与《货币战争》的不同反映出来的是看问题视角的不同，一个是基于经济学的，一个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样都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简单说来，资本主义源于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皇权压迫的反抗，社会主义源于劳动者对于资本压榨与剥削的反抗。随着人类历史长河的延续，两者的国家结构都在发生着变化。也许，准确地预测这种变化是困难的，但是，可以作出的不困难的预测是，谁的社会结构合理，谁将成为最终的强者。

2011年8月，受美国出现债务违约危机和遭到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的影响，世界经济又面临新一轮衰退的风险。对此，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前景表示了担忧，有的甚至还试图为美国政府提建议、想对策。然而，专家们忽略的现实是，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虽然面临巨额债务和主权信用危机，但是只要美国的印钞机还开得动，军费还在增加，高技术

产品还限制出口，那么，就表明了美国仍然有能力继续绑架世界经济，因为这反映出的是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对此，正像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说的那样，美国完全不存在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因为美国只需启动印钞机，即可偿还一切债务。

四、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对于如何评价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的金融形势，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结论是使用动态分析的方法得出的，即用美国的总债务与年 GDP 的增量资本做比较，因此，其结论自然相当令人震惊。不过，毕竟还有少数专家看到了美国的“泡沫消费”实际上是建立在两个杠杆之上的：一个是美国年 GDP 的生产性增量资本；另一个是美国的存量资产总额（或称财富总额）及其所属的“金融性增量资本”。如果说，以前者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是属于“动态”的，那么以后者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就或许可以被称为“静态”。而这个所谓的“金融性增量资本”，也完全是由于美元霸权的特殊国际地位所造成的。

看一下一些相关的经济数据。据报道：2006 年底，美国 GDP 规模约为 13 万亿美元，而美国的总债务，包括联邦国债、州与地方政府债务、国际债务、私人债务已经高达 48 万亿美元。美国的资产抵押市场总规模达到约 3 万亿美元，而资产的证券化创新，将其以 5 ~ 15 倍的杠杆放大了约 50 万亿美元。同时，全世界金融衍生品的名义价值总额达到了 376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 GDP 的 8 倍。在国际银行家废除黄金货币仅 30 多年之后，与 2007 年全世界 GDP 的 54 万亿美元相比较，即便 48 万亿美元的总债务没有再增加，美国也已经透支了世界 70% 的储蓄。因此，从表面上看，结论是全球金融形势相当严峻。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不过，以上的报道反映出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债务与 GDP 的比例关系，另一个是金融衍生品的杠杆对于资产抵押的放大效应有多大。涉及金融衍生品所使用的杠杆比例，这一问题理解起来相对简单，如果将资产抵押产品看成是股票，那么金融衍生品的杠杆就是市盈率。按照前文所说，这个杠杆的市盈率的大小同样与利率和成长性，在此也就是与 GDP 有关。在美国，这个杠杆的市盈率是 5 ~ 15 倍；在国际上，这个杠杆的市盈率是 8 倍。

根据资料显示，在世界各国的货币储备中，美元占据了 65% 的份额。一方面，自 1990 年以来，美联储的一年期基准利率最高为 8%，最低为 1%，近年来的金融危机之后，更是在 1% 以下，而 20 倍市盈率对应下合理的利率水平应该在 5% 左右，所以，理论上，对于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而言，5 ~ 15 倍的杠杆并不算大；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的 GDP 以流通的美元为基础（based on current dollars），最高为 6.2%，最低为 3.3%，平均值为 4.7%；以限定的 2 000 美元为基础（based on chained 2 000 dollars），最高为 4.5%，最低为 -0.2%，平均值为 2.1%，两项都为正值。因此，理论上杠杆还有可以放大的空间。如此看来，金融衍生品的严重性并没有感觉上的那样大。

再看一下有关国家债务占 GDP 比例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标准为 20%。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规定，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水平分别不得超过 GDP 的 3% 和 60%，而欧盟（European Union）近期所做的预测结果是，2010 年欧元区国家的预算赤字占 GDP 的 7.5%，负债占 GDP 的比重为 78.2%，到 2011 年，负债占 GDP 的比重将上升至 88.2%。

美国的情况是，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底，美国国债首次突破了 14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负债 4.53 万美元。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和

预测，到 2015 年，美国国债的规模还有可能进一步攀升至 19.6 万亿美元，届时美国的国债将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02%。对此，有研究机构警告说，如果国债达到 GDP 的 150%，美国就会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

2006 年 6 月，《财经时报》报道了加拿大债券分析师余华莘的《美国巨额赤字没有那么可怕》的文章。通过分析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文章指出：美国的资产总额约为 65 万亿美元，其中包括 26 万亿美元的有形资产、15 万亿美元的股票投资、9 万亿美元的其他类企业金融资产以及 15 万亿美元的其他类资产，如国有基础设施等。在资产负债方面，美国的负债总额约为 12 万亿美元，75% 约为住房按揭借款。其中，企业以及政府的资产和债务须排除在外，因为企业的净资产等于美国居民的股东投资权益，而美国政府的总债务则等于国内外投资者所持有的政府资产总额。

由此，作者所给出的数据是，美国个人和私营部门所持有的总资产约 53 万亿美元（65 万亿美元 - 12 万亿美元 = 53 万亿美元），而不是 12 万亿美元。因而，美国每年 8 000 亿美元的赤字应为其净资产的 1.5%（8 000 亿美元 ÷ 53 万亿美元 = 1.5%），而不是其国内年 GDP 总值的 7%。

那么，作者为什么不使用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总额的 12 万亿美元，而使用资产总额的 53 万亿美元与国内年 GDP 总值做比较呢？原因正像有些专家所指出的：美国是有一个特殊金融体制的国家。美联储虽然是联邦政府的中央银行，但是其属性却是私人银行。所以，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中，美国财政部的资产属于 12 万亿美元的负债部分；而美国全民的财富，即美国个人和私营部门的钱才属于总资产。由于美国年 GDP 总值计算的是全民的财富，因此其国内年 GDP 总值要与总资产做比较。由此还可以做进一步推论，既然私人银行可以是国家的中央银行，那么认清美国社会本质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的问题不就不再简单不过了吗？

另外，在作者看来，这笔 53 万亿美元的资产并不是一个静态数值。因为自 1955 年以来，无论以何种方式计算，美国的财富总值都在以年平均 5% ~ 6% 的速度在不断增长。这相当于美国的净财富每年增加 3 万亿美元，而其每年对外借款仅 8 000 亿美元。因此，作者的结论是，即使以目前的负债速度继续下去，几十年后，美国也不至于坐吃山空。这或许就是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说的美国还有能力再印发 8 万亿美元的根据。

2009 年 5 月，“21 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次贷危机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一文。在分析了美联储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拯救措施，从而导致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之后，文章评论道：“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美联储筹集、运用资金的图景，即财政部将增发国债筹集到的资金存入美联储，美联储用各种创新工具投放到市场，金融机构则将得到的流动性通过超额储备的方式存回美联储，从而使流动性留在了银行体系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急剧膨胀，‘流通中的现金’却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因此，美国目前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现钞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泛滥，美联储守住了货币的底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还算温和。2009 年 2 月的 M_1 、 M_2 同比增量仅为 13.66% 和 9.78%，这在危机时期并不算高，说明货币乘数低，商业银行信心尚未完全恢复，不愿意放款。”

2009 年 2 月，国内一家专业提供财经资讯服务的企业“世华财讯”，报道了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对于美国金融形式的一个表态，即在美联储约 2 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中，95% 是极为安全的短期资产抵押负债，即使其余的 5% 出现问题，美联储也不会亏损。

另外，在《财经网》一篇题名为《伯南克可能采取更多“非传统”

手段来刺激经济》的文章中，作者给出了如下评论：“如果把美联储看作一个国家，把其资产规模看作其经济规模，那么，它将是世界第九大经济体。《联邦储备法案》的第 13 条第 3 款规定：在‘非同寻常的紧急情况下’，只要联邦储备委员会七名成员中有五位以上投赞成票，就能授权任何一家联储银行，为任何个人、合伙企业或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资金。”“而只要美联储的印钞机还转得动，实现这一点没有问题。无怪乎有人说，美国权力最大的不是总统，不是国会，而是美联储。”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金融危机带给美国的，与其说是一场经济危机，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危机，国家的信用危机。

五、计算美元泡沫

在由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所引发的此次金融危机之后，许多经济学家都曾指出美元存在泡沫，美元贬值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并且这些经济学家也对产生美元泡沫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然而，对于美元泡沫究竟有多大？应当如何计算美元泡沫？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有哪一个经济学家给出过十分明确的结论。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是，如果经济学家的作用只是局限于做些程式化的定性的分析，那么这又与普通的学者有何区别呢？

众所周知，二战以后的 1944 年，世界上由 45 个国家共同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由于美国的经济总量占了全球 GDP 的一半，所以美元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该体系实际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金价挂钩。这个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美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对金本位承诺之上的一个信用体系。同时建立起来的机构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作用是向体系中出现流动性问题的国家提供援助。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持下的国家战略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欧洲和日本的重建及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通过石油减产的方式迫使价格大幅上涨，使得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了冲击。1971 年，出于多方面的考虑，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宣布取消美元与黄金挂钩，此后黄金价格一路上扬，从一盎司黄金价格 35 美元上涨到了 2011 年的 1 900 美元以上。

在此期间，1973 年和 1978 年，由于石油价格的冲击和美国国内一贯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美元曾出现两次大幅度的贬值，并最终导致 20 世纪 80 年代的通货膨胀。对于治理通货膨胀，从里根政府执政时期的 1981 年和 1984 年开始，美国惯用的措施是增加政府预算赤字。至 2010 年底，美国国家总债务已经超过 14 万亿美元。

有专家在分析美国的经济模式时指出：决定一种货币国际地位的因素有四个方面，包括国家的综合实力、该货币的国际持有量、该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交易量，以及市场对于对该货币未来走势的预期。

由于美元在国际上具备上述的优势地位，因此美国才有条件建立起其独特的借贷消费模式。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借贷消费模式的流程是，世界上各个国家通过贸易、石油得到美元，并将其放在由美国控制的金融市场里，然后美国就可以通过较低的持有成本，从金融市场上借到钱，使其回流到自己的手中。这之后，有了钱，美国一方面可以在国内培育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再用借来的美元去世界各地投资，赚取利润，发展本国的尖端高科技产业。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本位时期，世界的财富总量通过黄金的总储备量来反映，而世界的货币总量又受黄金的总储备量来制约。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作为一种实质上的国际货币，由于美国是唯一由其自己掌握美元发行和相关货币政策的国家，所以通过美元的发行量、利率和国债，美国不但调节其自身的经济，同时还可以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势，在世界各地

制造泡沫，转嫁危机。

因此，做简单定性分析的结论是：对内，美国也许需要在两党，以及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之间保持一种均衡，然而对外，其国家利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以超出其财富总量的货币发行来使美元不断地贬值，并通过美元的贬值来掠夺世界的财富。而美元的发行方式既可以是透明的 QE 形式，也完全可以是有隐秘的。这正如某些专家所指出的，美国从来不会为美元的不断贬值而担心。由于美元储备的 $\frac{2}{3}$ 在外国人手中，美国又借有巨额的外债，所以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只会对美国有利，他们甚至早已经为美元的崩溃做好了准备。那么，既然如此，对于其他手中掌握有大量美元的国家而言，为了防范风险，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又该如何先将美元的泡沫计算出来呢？

如前文所述，2006 年，美国已经宣布不再公布其货币发行量。对此，需要引起人们警觉的是，美国所采取的这一措施是在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怎样的信号呢？其实，无论作为金融战略的一种需要也好，或是为了掩盖问题也好，美国此举最终的目的只能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虽然与计算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相比，尤其在美国不再公布其货币发行量之后，计算美元泡沫将更为困难，但是，完成这种尝试并非完全不可能。

当论及货币政策如何对市场产生影响时，保罗·A·萨缪尔森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中，列举了从利率变化传导到价格和产量的因果链条，如图 4-1 中的虚框所示。图 4-1 中，M、i、I、AD、GDP、P 和 G 分别代表货币、利率、投资、总需求、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物价和金价。此处需要说明的是，1993 年，世界银行已经将萨缪尔森在原图中使用的 GNP 统一更改为 GDP，并将有关国际收支 BP (Balance of Payment) 的部分单独列项。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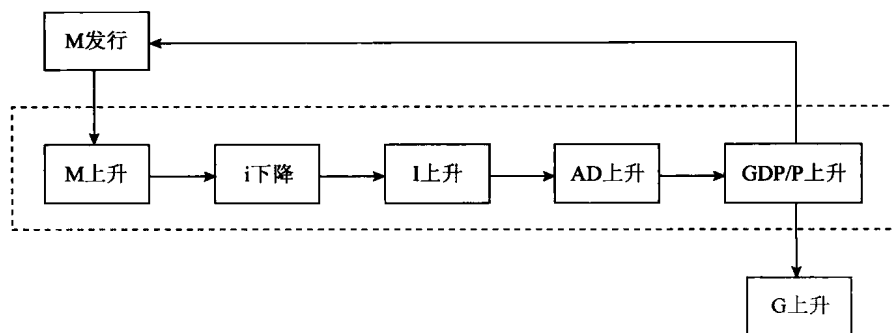


图 4-1 萨缪尔森的利率传导链条

涉及萨缪尔森的这个因果链条，有必要提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于货币理论的贡献。在萨缪尔森因果链条中，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是随利率变化的。该理论的基础来源于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而弗里德曼则认为，由于存在所谓“乘数效应”，即 GDP 和 P 对 i 有负反馈作用，所以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相反，物价水平应当是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传统经济学看来，通货膨胀率一般是由需求、成本或贸易推动的，而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弗里德曼的理论已经将产生通货膨胀的因素，量化到更细微的环节之上。

需要提及的是，在学术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被认为是传统货币数量论与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的综合。按照货币——经济增长原理，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使利率下降，从而达到刺激出口、促进投资和拉动消费。不过，根据凯恩斯的货币理论，货币需求由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组成。当利率降低到某个相当低的水平时，市场就会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货币需求弹性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货币发行量增加多少，都会被人们用于储存，而不愿进行投资和消费。此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将失效。这就是凯恩斯所谓流动

性陷阱的概念。

由于萨缪尔森的经济链条最终总要传导到国际黄金的价格上，所以，如果在这个链条的基础之上，再加上弗里德曼所强调的货币发行量以及国际黄金价格的增长率，（即加入图 4-1 中虚框以外的部分，）便可列出一个模糊的数学表达式：

国际黄金价格的增长率 $\approx$ 世界通货膨胀率 + 美元泡沫 $\div$ 65% - 世界的 GDP

对于该数学表达式来说，需要说明的有以下几点：

（1）建立模糊表达式的目的只是一种尝试，由于数据来源于多个渠道，且并不一致，再加上有些数据只能通过推算获得，因而其结论也仅供参考。

（2）在严格的意义上，该表达式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计量经济方程，即对于世界货币的加权利率而言，世界的通货膨胀率能产生一个负反馈的效应；而对于世界货币的发行量而言，它同时也具有一个“乘数作用”，并且乘数系数的确定，需要通过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获得。

（3）由于作为一种最主要的货币，美元占了世界货币总储备量的约 65%，因而美元泡沫对于国际黄金价格的影响以其占比 65% 计算。

（4）世界黄金供应量的增加，能起到弱化其价格上涨的作用，但近年来，黄金供应量的波动率平均在 1% ~ 3% 之间，对于计算结果影响不大，因此，为方便起见，未在考虑范围之内。

（5）2009 年，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对于计算结果的影响很大，因此，即便将此时间段忽略掉，按保守的方法计算，即世界的 GDP 仅以 3.6% 和 2.6% 的平均值 3.1% 计算，美元泡沫也在 18% 的美国近年来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以上。

根据多方所获得的数据，2004 ~ 2006 年，国际黄金的平均价格约为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400 美元/盎司、450 美元/盎司、473.80 美元/盎司；2007 ~ 2009 年，平均价格约为 645 美元/盎司、856.45 美元/盎司、1 014.08 美元/盎司，三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36.1%、32.8%、18.4%，三年的平均涨幅为 29.1%。2007 ~ 2009 年，世界 GDP 分别为 3.6%、2.6%、-21.5%，三年的平均涨幅为 -5.1%；2007 ~ 2009 年，世界通货膨胀率分别为 4.0%、4.8%、0.8%，三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约为 3.2%；将以上数据填入，并计算上面的数学表达式，其结果是：

$29.1\% \approx 3.2\% + \text{美元泡沫} \div 65\% - 5.1\%$ ；2007 ~ 2009 年，美元泡沫 $\approx 20.1\%$ ，年均增长幅度约为 6.7%（该数据或许与前文提到的美国财富总值每年都能以平均 5% ~ 6% 的速度在不断增长具有相关性）。

国内也有业内人士将黄金价格的上涨归结于全球货币发行量的增长，其理由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2 年以后，全球货币增长率持续在 10% ~ 25%，而全球 GDP 的增长率一般在 2% ~ 5%，由此，粗略地计算，两者之间的差就是黄金上涨的幅度。

再看美国的 GDP 的增长率和名义通货膨胀率。2001 ~ 2010 年，美国的 GDP 从 10.3 万亿美元上升到 14.8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不到 4.1%。2001 ~ 2010 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 1.55%、2.38%、1.88%、3.26%、3.42%、2.54%、4.08%、0.1%、1.1%、1.8%，平均约为 2.0%。美国经济运行的数据表明，受美元超量发行所产生美元泡沫影响最大的不是美国经济自身，而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黄金的价格。

以上的计算结果是以黄金的价格走势为参照物，从美元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得出的，这其中当然可能包含黄金价格自身的泡沫成分。这也就是为什么索罗斯（George Soros）和巴菲特（Warren Buffett）会选择在 2010 年 5 月抛售黄金的原因。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美元是美国政府超发的纸货币，其泡沫不可逆转，而黄金是一种矿产资源，其泡沫最终将会被化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解。虽然黄金的价格从2006年的约400美元/盎司，上涨到2011年初的约1500美元/盎司，5年间，涨幅达到了3.75倍。2011年8月，受美国出现债务违约危机和遭到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的影响，世界黄金的价格又上涨到了1900美元/盎司以上。据报道，10年之后，全球的黄金矿产资源将消耗殆尽。那么，到时候黄金的价格又将如何计算才算合理呢？所以，看问题不能只看流量，也必须考虑到存量。

那么，为什么计算货币的泡沫要将其相对于黄金的贬值考虑在内呢？原因很简单，从长期看，作为一种终极的信用货币，黄金既是一种政治金属，也是一种终将枯竭的矿产资源；既是一种避险工具，也是一种度量工具；既是一种输出，也是一种输入。

如果从美国国内的投资回报来看美元泡沫，其现实的情况正如美国学者廖子光2008年所说：“我们的美元资产投资回报率只有3%，而美国现在真实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8%，这相当于我们在美国的投资每年亏本15%左右。”对比一下20.1%的美元泡沫与18%的真实通货膨胀率，可以看出，这两个数据还是相当匹配的。美元泡沫对世界的影响更大于其国内，这一情况也与美元在国际上的流通量占其总流通量70%的现实相符合（此处需要区别开来的是，65%是美元占世界货币总储备量的比例；70%是美元的流通量占世界总流通量的比例）。

廖子光先生提供的另一个数据是，1995年到2004年，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全球外汇储备价值从1.5万亿美元上升到3.9万亿美元，增加了160%，年均增长幅度约为10%，而同期全球GDP的增长幅度仅为40%，年均增长幅度约为3.5%。如果用10%减去3.5%，得到的年度美元泡沫约为6.5%，与通过上述计算所得美元相对泡沫的年均增长幅度6.7%比较，两个数据同样非常接近。

回顾一下近几十年美国经济的波动周期。1990年以后，当时在任的前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采用提高利率的所谓先发性反通货膨胀措施。2000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裂以后，格林斯潘将美元利率从6.5%连续下调至1%，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上存在的泡沫消费，这样表面上便使美国保持了十几年低通胀和高增长经济繁荣的假象。而实际上，在房地产市场上，美国人的信贷消费最早开始于1920年左右。因为泡沫的破裂总是需要有一个累计过程的，所以，此后直至2005年，作为能够抵御通货膨胀的一种特殊商品，黄金的价格大部分时间稳定在约400美元/盎司左右。

有资料表明，在20世纪60~70年代期间，10年内美元的供应量翻一倍，年增长率约为7%，全球的通货膨胀并没有造成黄金价格的上涨，国际黄金的价格基本保持不变，这说明那一时期美元的泡沫不大。但是，到了70~80年代的10年期间，美元的供应量翻了2倍，从6770亿美元上升到19950亿美元，年增长率约为7.5%。此期间，黄金的价格从200美元/盎司以下，上涨到最高600美元/盎司以上，涨幅达到了3倍。而近10年来美元的年平均发行量增长率又提高到约为7.5%~8%。

从表面上看，美元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从前10年的约为7%，增加到后10年的约7.5%~8%，其增长幅度仅大了0.5%~1%。然而，就是因为这一看似微小的变化，就能使美元货币的供应量，从每10年增加一倍，扩大到每10年增加两倍。由此可见，通过微量调整发行量，美元对世界经济所造成的软杀伤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而且，这种严重软杀伤的后果并不是体现在美国，而是体现在其债权国，包括中国。

2009年12月，美国国家的总债务为12.1万亿美元，到2011年初达到14万亿美元，增加1.9万亿美元。2011年5月，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0447亿美元，同比增长24.4%，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10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1%左右，人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民币对欧元升值 11% 左右，美元和欧元的贬值已使我国外汇储备出现账面亏损。新增外汇储备 7 年损失共达 2 711 亿美元，平均每年约增加 387 亿美元，这其中可能还未将我国所持有美国国债的损失计算在内。2011 年 2 月，有数据显示，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计约为 1.15 万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通过上述的数据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国的发展模式和金融战略是：用债务美元和信贷消费拉动经济，用货币供给和利率调节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信誉货币，国际黄金价格的变化，则完全成为能够反映美元泡沫的一面镜子。美国向外输出通货膨胀，侵吞全世界的财富，依赖的就是这种货币供应量微量的调节。于是，人们可以联想到的是，本来源于中国武术“四两拨千斤”的技巧，却被美国人用到了他们的金融战略之上。

由于 2006 年以后美元的发行量不再公布，所以，除了用国际黄金的价格来计算美元的泡沫以外，通过与其他比美元更“透明”的货币做比较，也能间接地计算出美元泡沫的近似值。即便“有形之手”被掩盖住了，“无形之手”的作用总是不能被掩盖的。

2008 年，美国的两位学者彼得·D·希夫（Peter D Schiff）和约翰·唐斯（John Downes）在他们合著的《美元大崩溃》一书中提到，2002 ~ 2004 年期间，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贬值了 24%。并且，到了在此之后的 2006 年上半年，美元又继续贬值了 12%。这或许就是美国会选择在 2006 年宣布不再公布货币发行量的真正原因。对此，该书的作者写道：“由于美国从不公布货币供应量，全世界将无法知道有多少美元通过套利流出美国，也不知道还有多少资源和人民的血汗要流进美国，更不知道美国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新货币制度让全世界再为它付出 70 年……”

另外，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的最新数据也显示，次贷风波以来，按 6 种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主要货币加权计算的结果，从2007年7月2日至2008年3月21日，美元指数下跌了10.7%。剔除通胀因素以后，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也下跌了5.8%。而以52个国家的货币，通过贸易加权计算所得到的美元名义有效汇率，2008年7月是80.03，与2000年1月的96.29比较，美元指数贬值了16.9%，其间最大贬值幅度为26.3%。2011年4月，美元指数最低跌破75.00，贬值幅度达到约22%。以上的这些数据均可作为测算美元泡沫的参考。

六、专家们的盲点

再回到议题的理论层面。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占有全球约25%的资源，以不足5%的人口创造了全球约25%的产出。2006年，美国宣布不再公布货币发行量。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贷款危机爆发，接下来是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面对世界经济的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以及在近30年内，美国所一直采取的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们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观点，其中，在已出版的书籍中，仅中文版的就有几十种。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只是单纯地运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或国际金融理论，分析由于短期利率和汇率的变化给国际贸易带来的风险，及其对于各国经济所造成的冲击。或者，至多像某些经济学家所做的，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定性地审视这一现象背后的缘由。那么，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说，学者们的论证缺少了什么呢？缺少的是，由准确的数据所支持的、严谨的定量分析和完整的论证。

2008年，《超级帝国主义》一文的作者迈克尔·赫德森在书中说：“美国政府控制全球信贷流动的策略是高度机密的，……美元的货币霸权

已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经济世界”。面对已经出现的金融危机，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曾经说过，美联储可以多印发 8 万亿美元，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对此，我们的专家和学者们又有谁知道格林斯潘的根据到底在哪里呢？美国究竟在依据哪些经济数据和计量模型制定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美国隐秘的金融战略之下，究竟谁又是最终的受益者？

众所周知，最早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由马克思所创建的。涉及对于马克思（Karl Marx）的评价，正如奥地利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 Joseph Alois）所指出的那样：一般的经济学家感兴趣的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机制，而马克思和他本人感兴趣的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发展趋势。另外，值得重视的还有，由现代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威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开创的宏观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包括国际经济活动、财富分配、民族国家自治、国际组织的政治、霸权稳定理论，以及对全球经济的治理等。吉尔平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从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综合角度出发，研究经济学问题。因此，他的理论也被称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对于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学术研究，也许需要的就是这类能深刻揭示其本质的理论。

美国是一个数学、科技、经济和金融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政府发国债、印钞票、制定利率和汇率、平衡就业和通货膨胀，当然会有准确的数据和完整的理论模型。但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能全面地深入到技术的层面，从美国政府制定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基础，以及控制全球信贷流动的策略入手，揭示所发生的一切。或许，要彻底揭示这一切，除了宏观政治经济学、数理经济学以外，还需要用到所谓“黑箱”理论的研究方法。

在控制论中，有一种被称为“黑箱”的研究理论。其方法是，用所谓“不打开黑箱”的办法研究系统。这对于那些内部结构过于复杂的系统，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或者在分解系统的过程中，系统自身结构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目前的各种分析方法又难以奏效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可能。“黑箱”理论的方法是，只根据“输入”和“输出”建立数据或框图模型，然后进行分析、判断和预测，化繁为简。其注重的是，对于系统的整体性能和功能的研究；忽略掉的是，对于结构、状态和过程的分析。

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具有高度机密性质的金融战略手段，“黑箱”理论或许能成为揭示其内幕的一种选择。换句话说，虽然真正的过程被掩盖了，但是现实的结果是：正是因为制造了这样一种被称为是“隐性的通货膨胀”，美国完全可以将所有的风险、问题和麻烦，转嫁给国际上的贸易伙伴和国内的大众消费者。而借助于这样的机制，美国的私人垄断资本和国际金融炒家却完全有机会将巨额的利益纳入自己的腰包。人们能看到的现象是，全世界的财富垄断已经越来越严重，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越来越大。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样的工作只能主要由数理经济学家来完成。

涉及到美国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包括宏观经济的基础理论和金融调控理论，在宏观经济的基础理论方面，西方经历了从早期的古典货币理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理性预期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过程，而相对货币需求理论而言，货币供给理论的产生要晚一些。

这其中，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作用，主张通过利用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税收等手段调控市场、保证就业、发展经济。货币主义主张应当减少政府的投资，通过对总需求的市场化引导来调节总供给。货币主义的突出代表是弗里德曼的现代数量论。供应学派强调通过减少税收来减少政府投资，从而实现对总供给的调节。理性预期主义认为应当降低总供给的不确定性，用总供给的理性预期来适应总需求的

变化。新自由主义是伴随国际经济一体化大趋势的产物，主要以宣扬国际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宗旨，并蕴涵了对于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否定。其实质是，将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模式化；其集中代表是西方国家达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

联系到当代世界范围的这场大规模金融危机，上述各种理论中最需要关注的是能深刻影响美国政府货币政策走势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理论的发展。在凯恩斯之后，鲍莫尔和托宾发展了流动偏好理论，提出了鲍莫尔-托宾模型（Baumol-Tobin Model）。其结论是：在交易需求层面，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交易需求与利率水平呈负相关现象。该模型的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持有货币存在机会成本。人们在日常交易中，只要利息收入大于交易成本，就可能频繁地置换货币和债券。当利率上升时，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必然增大，人们会选择持有货币，反之，人们会选择持有债券。当然，这样的道理是十分浅显的，而鲍莫尔-托宾方差模型的贡献只不过在于将其定量化了。

1956年，弗里德曼在《货币数量论——一个重新表述》一文中发展了货币需求理论。弗里德曼将货币看作是资产的一种形式，从消费者的收入、商品及其替代品价格，以及消费偏好入手，分析货币的需求。弗里德曼认为：物价水平以及名义收入水平，即国民总产值或国民收入，是货币供应和货币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论分析和统计资料均证明货币需求函数极为稳定，并且货币需求与恒久收入和各种非货币性资产的预期回报率等因素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而货币供应量的不规则变动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通货膨胀就是货币供应过多的结果。对于美国而言，如要控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就必须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并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每年4%~5%的固定增长率的范围之内，使货币增长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率同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而如前文所述，早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期间，美元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就已经达到约 7%，70 年代以后则达到 7.5% ~ 8%，超出弗里德曼的数据 2.5 ~ 4 个百分点。那么，如果弗里德曼的计算是正确的，谁又在为其超出的部分埋单呢？当然是那些大量持有美国国债的债权国了）。

1976 年，在经过简化和大量的实证分析之后，弗里德曼将其货币需求函数，变换成一个幂函数的回归方程。然后，又用对数的方法，把非线性方程转化成为一个线性的二元回归方程。由于弗雷德曼在货币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根据美国 1892 ~ 1960 年的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对于这个线性二元回归方程按计量经济学的最小二乘法求解回归参数，弗里德曼最终将该回归方程表达为如下形式：

$$\ln \frac{M}{P} = 3.003 + 1.394 \ln Y_r - 0.155 \ln i$$

表达式中，M 为广义货币 M_2 ，P 为物价， Y_r 为实际恒久收入，i 为 4 ~ 6 个月商业票据利率。

有关弗里德曼对货币需求理论的贡献，学术界认为有以下几点：

（1）他将货币看成是一种资产，从而把货币理论纳入了资产组合理论的框架，摒弃了古典学派将货币视为纯交易工具的狭隘理念。

（2）在资产组合理论中，强调了货币供应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纠正了凯恩斯学派忽视货币量的做法。

（3）在货币需求函数中，设置了预期物价变动率的变量，强调了预期因素在货币理论中的作用。

（4）将名义数量和实际数量加以区分。

（5）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纠正了以往学术界单纯地依赖于演绎推

导的习惯，使货币理论具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

另外，能对外来资本谋求投资收益率展开进一步细化分析的理论，还有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IS－LM－BP模型是该模型的基本依托。依据该分析模型，可以说明一个国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与国民收入和消费模式有紧密的相关性。此外，有关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还有一些其他的数学模型。当然，这些理论大都是以分析国家的利率与汇率政策为基点，并不直接涉及货币的发行量是否合理。

对于货币供给的确定，是以利率还是以供给量为基点，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利率——供给量——利率的转换过程。原因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下，各种金融创新、金融服务和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出现，全球各种货币的流通量越来越大，流通速度越来越快，这使得对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和货币供给量的确定越来越困难。因此，面对当前全球动荡的金融形势，现在也许到了需要全面地重新审视西方核心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时候了。不过，这并非是一件易事。也许有效的经济理论同样需要从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和理性预期主义重新回到凯恩斯那里，或者正像保罗·萨缪尔森所做的那样，将它们完全综合。

席卷华尔街的金融风暴使人们对号称是世界上最完善的美国金融资本体系发生了质疑。这场风暴起源于美国金融机构的坏账，但是对于美国和世界经济而言，由其所造成的影响却是一场全面的信用危机。这正应了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所说过的话：“金融就是信用。”对于如何使用信用，在《次贷危机》一书中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杠杆是华尔街的灵魂，那么衍生就是华尔街的魔法。”

由于新自由主义成为经济思想的主导，多年来，在美国政府扩张性金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融政策的驱动下，随着金融服务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得以大量面世，众多的金融机构普遍介入了高收益的消费信贷，尤其是不计客户还款能力的次级按揭贷款业务，尽管他们拥有所谓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和方法。在长期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过度地使用金融杠杆，过度证券化和透支消费未来以后，面对此次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又不得不积极地展开救市活动。美国政府的此举向世人展示了什么呢？最终的结果是各种理论均被抛到了脑后，实用主义哲学又一次占了上风。或许还能让美国人感到欣慰的是：没有新理论，总比坚持错误的旧理论强！

2006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卸任，接替他的是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经济教授伯南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伯南克以激进的方式进行风险管理，史无前例地实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涉及伯南克与其前任格林斯潘的比较，美国经济学家伊森·哈里斯在其所著《伯南克的美联储》一书中给予这样的评价：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主要使用三种分析方法，包括依赖于统计技术的多均衡计量模型、复杂的单一部门模型和数据趋势分析法。格林斯潘习惯于使用数据趋势分析法，而伯南克则是个善于构建经济模型的学者。

那么，此二人的不同能带给中国的启示又是什么呢？在美国，诸多的技术经济手段是用于实战的，而在中国，可能更多的则是用于研究和教学的。虽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完全有理由可以不认可美国人的那些模型和方法，但是，绝没有理由对此没有深入的了解。否则，孙子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经济上又有何意义呢？

面对此次金融危机，许多经济学家和学者都在试图对美国的国家战略做深入客观的评价。但是，人们注意到的仅是一些由常规性变量所引起的变化，如美国的财政赤字与GDP的比例严重失调、贸易赤字巨大、国债发

行与货币供给无节制等等。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资本问题，分析了美国的资产负债表，但是，几乎没有人将美国所拥有的全部存量财富、资源和技术都考虑在内，并对此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

对于宏观经济的总体分析，保罗·萨缪尔森提出一个完整的模型，依照该模型可以看出某个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与其他经济因素有十分复杂的相关性（如图4-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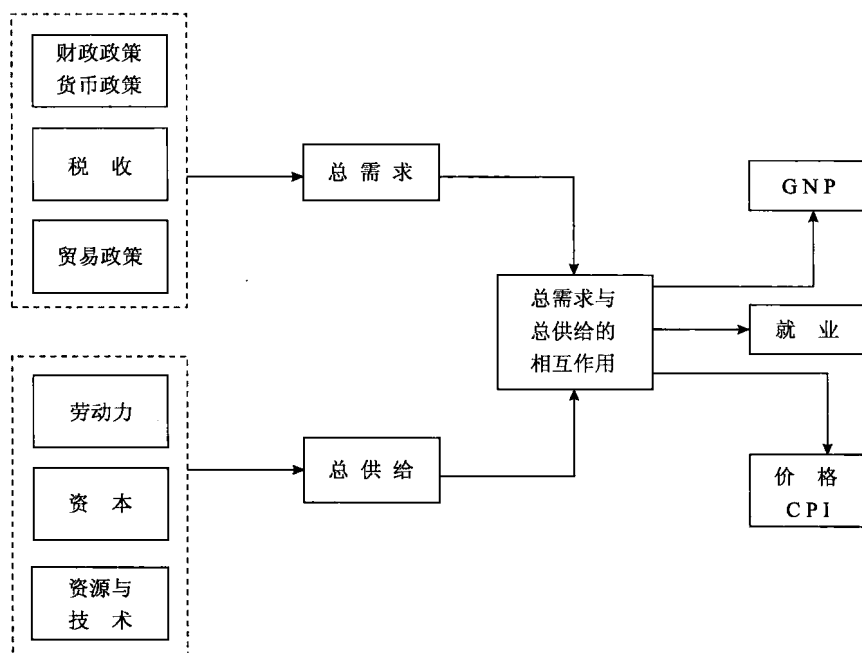


图4-2 萨缪尔森的宏观经济运行模型

对于上述与一个国家货币政策相关的理论、模型和数学表达式，有谁能说清楚：美国究竟做了如何的选择？哪些实际上已经被他们采用了？哪些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采用？他们根据什么来选择？他们制定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是否保密？或者还是仅凭某人，如格林斯潘的经验来决策呢？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美国的确遭遇到了自 1929 年以来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然而他们会动用他们的战略储备、黄金、石油、核心资产或用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来解救这场空前的危机吗？如果没有，那又说明了什么呢？

前文提到，美国的财富总值每年都在以平均 5% ~ 6% 的速度在不断地增长，相当于美国的净财富每年增加 3 万亿美元，那么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或许，这能从美元的贬值中找出部分答案。原因是美元的贬值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样不仅能使美国可以赖掉大量的债务；另一方面，也能通过战略储备资源的增值，使其存量财富的总值得到大幅度的增加。这其中，还未将由于美元贬值，通过贸易给美国带来的利益包括在内。因为美国不但是美元发行的操纵国，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富有，并拥有战略储备资源最多的国家。

接下来，分析一下美元贬值带给美国存量战略储备资源的增值。截至 2003 年，根据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的资料，美国的国家黄金战略储备为 8 135.4 吨，约占全世界各国官方黄金战略储备 32 700 吨的 24.8%。2007 ~ 2009 年，世界黄金的价格从 645 美元/盎司，上涨到 1 014.08 美元/盎司，三年的平均涨幅为 29.1%（包括 2007 年对 2006 年的增长幅度）。

2010 年 12 月，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目前全球地上黄金存量约为 16.6 万吨，总市值 7 万亿美元左右（合 4 216.8 万美元/吨），其中首饰用金仍占最大比重，达到 8.37 万吨，约占 50%；黄金个人投资量达到 2.96 万吨，约占 18%；各国黄金官方储备总量达 2.93 万吨，约占 18%；工业和其他用金量达到 1.98 万吨，占 12%。如果以 2010 年底国际黄金的价格约 4 216.8 万美元/吨计算，该年度美国黄金储备的总价值约为 3 430.5 亿美元，与 2009 年按 3 432.8 万美元/吨，总价值约为 2 792.7 亿美元比较，其年增加值约为 637.8 亿美元。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在小布什（Bush）任期内，美国国家的石油战略储备已经提高到7亿桶，约占当前世界各国石油战略储备库存总量40亿桶的17.5%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当期储量的50%。资料显示，2002~2004年，国际原油的价格从约25美元/桶，上涨到约43美元/桶，2005年达到约50美元/桶，2006年达到约60美元/桶，2007年达到约70美元/桶，2008年中期，国际原油的价格最高接近150美元/桶，年末最低下跌到40美元/桶，到2009年底又恢复到了约80美元/桶，2011年二季度，世界石油的价格就已经突破了每桶120美元。近年来，基本上等同于每年每桶石油至少增加10美元。如此，便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大约能使美国原油储备的年增加值达到约70亿美元。这其中还并未将美国私有石油商在世界各地所占的巨额股权增值计算在内。

由于能源占了粮食成本的60%以上，所以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也必将导致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有资料显示：总体上，美国控制了全球约1/3的粮食供给，因为美国的大豆产量已经占全世界的42.7%，玉米产量占34.4%，棉花产量占21.2%，小麦产量占11.6%。2011年2月，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全球粮食价格总体指数同比增长29%。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不仅会使美国的粮食供应商从中获利，更重要的是，在五角大楼看来，美国的全球粮食战略，也完全可以成为其“全方位优势”战略中的一部分。因为粮食和石油一样，这些都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重要战略资源。

以上的一些数据只是以美元贬值对美国黄金和原油储备的增加值做了粗略的计算，并没有将美国其他的存量财富，如全部的能源、自然矿产资源、农业和林业资源，以及高科技产品等资源计算在内，更详细的数据当然美国自己更清楚。通过引述以上国内外一些专家的观点可以发现，美国人看问题，从来都是既考虑到增量，也考虑到存量；而在我国部分经济学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家的眼中，却只看增量，不看存量；只有经济，没有政治。

中国银行的高级研究员谭雅玲女士在一篇题为《国际金融新动向与国内金融新问题》的文章中写道：“由于美国次贷问题的出现，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和前提开始进入新的发展和调整阶段，其突出的特点乃至特色在于美国金融全面的引领与掌控，可以说国际金融当前的新特点集中反映了美国金融的战略远见和政策周密以及策略效果。因此，未来美国金融的地位将以战略收益得到全面的巩固和提升，美元霸权并非削弱，而是进一步得到强化……因此，预计未来经济金融全球化的竞争将突出战略应对的效果，美国或许将成为金融战略的赢家，美元未来不是缩减，而是更大规模的回收和增持，进而将会形成美元霸权的全面控制或垄断，有可能展现美元货币体系的独家主导。”她预计未来3~5年美国的经济主导力和影响力依然存在，未来5~15年后美国的经济实力才会逐渐削弱。

总而言之，一方面，要全面地评价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不但涉及美国金融决策的机制和战略，也涉及其制定金融政策的模型、方法及其所依据的数据，包括美国国内的资产总量（存量财富）、外来的货币供给量、国民收入（增量财富）和消费等相关数据。忽略掉这些，片面地判断美国的高财政赤字、高贸易赤字以及大量地发行债务美元是否合理不具有科学性。在这个问题上，接替格林斯潘现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注意到美国原有宏观经济模型的不足，因此他主张引入更多的变量来决定国家的货币政策。当然，即便这是真实的，其目的也是为美国自身利益考虑的。

七、G2时代与汇率之战

二战之后，美国的GDP占到了全球的1/3，成为世界第一强国。1945

年12月27日，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两大金融机构成立，从此建立了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1975年7月，在此基础上，为研究经济形势以及协调政策，西方七个工业化大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又确立了G7的首脑会议制度。1998年，由于俄罗斯的加入，G7集团改为G8集团。1999年9月25日，由八国集团、欧盟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一个新兴工业国组成的非正式对话机制G20形成。这是一个由20个参加国所举办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0年中国的GDP增长将能达到5.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2010年二季度，IMF的这一预测提前得以实现。而在此之前的2009年，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就提出了所谓中美“G2”的构想。意思是，如果美国要鼓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就应该和中国分享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把中国作为管理世界经济的首要搭档，让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合法建设者和维护者。

在2006年12月，中美举行了第一次战略经济对话之后，2009年6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前财政部助理部长伯格斯滕（Bergsten）在第四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也提出了G2的概念。他认为，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济总量的不断提高，G8的时代已经过去，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将把中美两国的合作推向了世界经济的前台。此后，2008年12月，中美又举行了第五次的战略经济对话。在此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都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讲话，强调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与合作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不过，对于所谓“G2”的设想，中国国内反应平淡。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建立所谓中美“G2”模式不切实际。理由是：①合作与遏制一直是美国几届政府对华战略的基调，让中国分享其对于世界经济的霸权几乎没有可能，并且中国从来也没有追逐霸权的意图；②除中美两国之外，欧盟、日本和“金砖四国”也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由中美构建“G2”并不能取代“G8”；③中美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美国的真实意图最有可能的是，希望通过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来帮其渡过金融危机。

中国的学者普遍地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危机之下，美国“一超独霸”的割据仍然没有改变，中国也仍旧属于发展中国家。作为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美两国，加强战略性合作，协调立场和政策，无疑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然而，对于中国自身而言，最重要的仍然是首先要做好本国的事，只有自身发展了，才有可能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涉及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在《金融战争》一书中，作者将中国称为美国的一个经济殖民地。作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通过大量出口发展经济的模式具有根本性的缺陷。许多中国的出口企业都有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并由美国人控制，为美国公司赚取高额利润。作者指出，中国每年4 000亿美元的出口直接导致每年8 000亿美元的GDP损失。中国付出的是廉价的劳动、环境污染、能源和资源的大量消耗。很明显，治理环境污染需要花成本，而随着近年来美元的迅速贬值，国际能源和资源的价格也在大幅提高。因此，通过对外贸易出口，中国赚取的是当前的蝇头小利，损失掉的是巨额战略储备资源。

为了说明问题，作者用2005年中国的GDP算了一笔账。该年度中国的人均GDP为1 231美元，人均外贸额也达到了1 000美元，减去外贸部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分，中国的人均 GDP 仅为 231 美元，合一天只有 63 美分，远低于全球的贫困线——一天 2 美元。对于中美之间，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内存在的战略博弈，作者提醒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以其本币标价其外债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没有真正的外债，因为它所有的债务都是它能够以任意发行的货币清偿的主权债务。”

有关中美之间展开全球大博弈的话题，香港凤凰台政经论坛节目嘉宾主持人石齐平的评论是：美国采取的是攻势，中国为守势。守中有攻，攻中有守。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战略退却：逐步从伊拉克及阿富汗撤军；②战略统战：努力化解所有与美国存在矛盾的国家与对象，包括俄、伊朗、委内瑞拉、穆斯林世界等；③战略进攻：主要对象就是中国。军事上，美国一直在强化“第一岛链”对中国形成的“C”封锁；政治上，从日、朝的东北亚开始，到中国台湾、东南亚、南亚及中亚，美国正在构建一个对中国的“U”型的包围。对于如何解释美国制定其全球战略深层次的考虑，石齐平先生指出，一方面，这与美国的军工部门在其产业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关。逻辑上，美国不能没有敌人，就算没有，也要“制造”一个敌人出来。这也是二战以来，除卡特之外，没有一个总统不发动战争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尊崇的“政治资本主义”信奉的是优胜劣汰、成王败寇的竞争哲学，再加上基督教福音教派“替天行道”的信仰，使得美国发动的每一次不义战争，一开始总能获得普遍的民意支持。

2010 年 4 月 18 日至 21 日，国家主席胡锦涛率团访问美国，同美国领导人一道为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共谋新篇。经过深入交流和磋商，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发表了中美建交以来的第三份联合声明，确认了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框架。在中国代表团的访问期间，两国签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持下的国家战略

署了一系列经贸、能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文件，宣布了诸多新的合作项目。美方承诺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合作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推进出口管制改革。胡锦涛主席此次对美国的访问充分体现了中美各领域的合作将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

2011年5月9日至10日，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此次经济对话的主题为“建设全面互利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双方讨论的议题是：①促进贸易与投资合作，包括推进新兴产业领域的贸易与投资合作等；②完善金融系统和加强金融监管，主要包括金融业改革、跨境金融监管合作；③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④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其中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与挑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东北非形势对地区和世界经济影响、日本特大自然灾害等议题。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由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4月共同倡导建立的。第一轮和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曾先后在华盛顿和北京举行。几次对话中，双方多次重申，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中美保持和扩大合作，对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发展中美两国的战略与经济合作，当然对于双方有利。不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面对西方“强权为利益”的意识形态，在合作的背后，中国对于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也必须有全面的考虑。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当然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挑战其全球的霸主地位。对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在合作之外，美国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对于中国的遏制、制裁和围堵的策略。因为无论是从历史、文化、民族、种族、宗教，还是从价值观、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体制上看，中美两国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人应当认识到的是：正像中国人“以和为贵”的观念延续了两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千多年一样，西方人“强权为利益”的观念同样也已经延续了几百年，这种历史文化的差异不可能在几代人的时间内有所转变。对于美国人释放出的善意，最好还是牢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那句名言：美国的友善比它的敌意更加危险。因此，“以斗争求合作”应当成为我国对美国的一项长期外交策略。

中美之间的经济战略博弈，实际上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政府决策、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总体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市场。表面上看，中美之间的经济利益之争，主要发生在市场流通的层面，包括商品贸易、汇率、利率、技术进出口和投资等，这些方面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发生在市场流通领域内的谈判、讨价和还价，只是短期的利益之争，并不是战略博弈。对于长期的战略博弈而言，双方的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以及总体经济实力，包括经济总量、货币总量、资源、能源、技术实力和劳动力等，也必须在政策的考虑范围之内。正如打仗一样，前方消耗的是炮弹、钢铁和士兵，后方需要的是粮食、运输和生产。所以，双方所博弈的不仅是现量资产，也必然包括存量资产。至于彼此的博弈策略，以及其他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毋庸置疑，还是要相信我们的古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涉及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最突出的无疑是有关人民币的汇率问题。2005年，两位美国参议员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议案，提出如果人民币不能升值27.5%，那么美国就需要向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同样比率的关税。理由是，由于中国政府人为地将人民币汇率与美元直接挂钩，使得中国的出口商品在价格上取得了15%~40%，即平均27.5%的优势，所以美国需要也用这样的办法来应对。此后，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机制开始启动，到2008年，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已经升值了21%，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16%。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另外，如前文所述，根据《美元大崩溃》一书中所提到的数据，2002 ~ 2004 年期间，美元对世界其他的主要货币已经贬值了 24%。并且，到了 2006 年上半年，美元又继续贬值 12%。如果按国际清算银行提供的最新数据分析，从 2000 年 1 月到 2008 年 7 月，以 52 个国家的货币，通过贸易加权计算所得出的结果，美元指数也已经贬值 16.9%。

2009 年 1 月 22 日，即将上任的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在回复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询问的信件中表示：“奥巴马总统基于许多经济学者支持的结论，认为中国正在操纵其本币汇率。”这一事件表明，中美之间的有关人民币汇率的经济摩擦又有所升级。

2010 年 6 月，为了防止人民币汇率问题在 G20 峰会上被西方国家强行政治化，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重启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但是升值的方式不会像 2005 年那样采用一次性完成的方式，而是要实行在管理下的小幅浮动。

2010 年 9 月，在美国国会就国际经济和货币汇率政策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再次表示，美国国会与其他国家需要联手向中国施压，并暗示本轮人民币升值幅度至少应达到 20%。

从以上情况，以及综合其他方面的情况看来，改革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使人民币继续升值，已经在中美两国之间达成一些妥协。数据显示：至 2011 年 4 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经突破了 1 美元兑 6.5 元人民币。若以 2005 年的汇改为基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超过 26%，每年平均升值约 5%。

2010 年 6 月，关于人民币升值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引起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和克鲁格曼的争论。克鲁格曼在其专栏文章中说，美国因为人民币估值偏低失去了约 140 ~ 150 万个工作岗位，如果中国取消管制人民币汇率，全球经济增长将比现在能提高

1.5个百分点。蒙代尔的观点是，人民币升值并非是解决两国贸易顺差的灵丹妙药，大幅升值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从而也会危害到人民币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作用。

2011年5月，美国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龚方雄预测，10年内人民币对美元至少还将再升值一倍，即，每年平均升值约8%。不过，由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涉及到的是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所以，近年来一直成为国内外许多专家所关注的焦点。其中，有专家主张缓慢升值，也有专家主张一次到位，而对于如何确定需要升值的空间分歧则更大。

据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彼得森（Peterson）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人民币最多已经被低估了40%。2009年3月，通过使用宏观平衡方法做估算，IMF认为虽然人民币已经有了一定幅度的升值，但是其实际有效汇率仍被低估了21%。其根据是中国基本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比标准水平高6.4%，而他们认为标准水平的占比应当是GDP的4%。而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则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合理水平应为6.856元。这意味着人民币不仅没有被低估，反而被高估了0.4%。在国内的经济界，对于人民币汇率是否需要大幅度升值，甚至是一次到位，主流的观点一般持反对意见。这里，可以引为例证的是2006年1月4日发表在国际金融报上的一篇文章——《回顾人民币汇改六个特点 展望2006年汇率走势》。

该文章指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特点是：①重在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非人民币汇率水平在数量上的增减；②人民币汇率从原来实际盯住美元，更改为参考一揽子货币来调节，这是一种实质性的改革，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制定与调整已越来越国际化；③对人民币币值进行了重估，并形成了新的中心汇率，市场汇率将能在新的中心汇率的基础上波动；④扩大了汇率的波动范围，特别是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为汇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持下的国家战略

率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创造了条件；⑤根据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可能带来的风险，我国相应引入了一些新的避险工具，例如远期结售汇率制度、掉期交易等；⑥与某些西方国家所要求的人民币在短期内大幅升值不同，此次改革是在我国政府的监管下，人民币实现有序、稳步升值的过程，是我国主动改革的结果。

对于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因素，文章从两个方面给予了论述，其中的经济因素包括国际收支、物价水平、利率差异、经济增长水平、财政状况以及外汇储备水平等；非经济因素包括个人偏好、信息、心理预期、市场投机行为、政府的调控行为等。

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分析国内外围绕人民币汇率所引发出各种观点和争论，这其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其一，无论是在国内的范围内，还是在国际上，观点的不同所反映出的不仅是利益出发点的不同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更包括了判断事物的标准的不同。进一步说，虽然现在国际上有关汇率的金融理论已经有了很多，包括“国际借贷说”、“购买力平价说”、“利率平价说”、“汇兑心理说”、“国际收支说”和“资产市场说”等，但是，所有的这些理论目前尚不完善。相对而言，由于在分析方法上采取了以整体分析取代局部分析，以存量分析取代流量分析，以动态分析取代静态分析，并且具有能将长期分析和短期分析相结合的特点，因而，这其中属于“资产市场说”的资产组合分析法，目前更能被学术界认同。不过，认同这种分析方法是一回事，应用它却是另一回事。

其二，如果将涉及汇率理论的资产组合分析法，与前面所提到的保罗·萨缪尔森的由利率变化传导到价格和产量的因果链条相联系，便可看出，两者存在一定相关性。因为从控制论的角度看，保罗·萨缪尔森的因果链条所描述的是一个单一经济体的“封闭系统”，而资产组合分析法试

图要解决的，是一个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环境下所形成的“开放系统”。这个将多个“封闭系统”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开放系统”的核心变量，就是货币的汇率。其他相关的重要变量还包括系统中主要国家的存量资产、内外债务，以及增量资产 GDP、相对利率、相对通货膨胀率，甚至还有随政府调控和市场心理预期的影响所产生的预期汇率的变化率等等。

如此来看，资产组合分析法所考虑到的范围似乎已经非常全面了，然而，如果进一步分析，其实这一方法仍然是不完善的。对于其不足之处，正如上述国内专家所指出的：①完整的汇率方程十分复杂，并且某些统计数据难以获得；②该方法只是对于传统的汇率理论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把握住汇率变动的内在原因；③该理论是以金融市场高度发达，资本的国际流动性良好为条件的，而这并不完全符合当前世界经济的格局和形势。

另外，如果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其含义是，一国的货币供给、利率、汇率，不但与本国的存量资产、内外债务和 GDP 相关，而且也与国际上其他主要国家的货币供给、利率和汇率相关。因此，无论是为此创建数学模型，还是求解答案，实际上都将非常困难。

其三，在当今世界上主要的三种汇率体制中，即自由浮动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所普遍采用的是自由浮动汇率制。自 1994 年外汇改革以来，我国一直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直至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才被迫改为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5 年，迫于升值的国际压力，人民币汇率改革机制开始启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是以银行间外汇市场为基础形成的，中央银行按前一营业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加权平均汇率，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港币、日元等国际货币的基准汇率。其特点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第四章 四种力量支撑下的国家战略

国内有市场分析人士曾对人民币汇率政策提出过五种设想：

(1) 采用行政手段，一次性调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然后继续保持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制。

(2) 完全放开人民币汇率，停止所有的政策干预，采用自由浮动汇率，使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完全由市场因素来决定。

(3) 继续保持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并逐渐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增加汇率形成过程中的市场因素。

(4) 继续采用盯住汇率的方法，但转而盯住一揽子的世界主要货币。

(5) 继续保持当前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和汇率水平，不公开宣布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动，但引入某些技术性的措施减少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然而，同学术界的其他观点一样，这些设想全都属于经验主义的试验性的做法，并没有涉及任何理论根据和数量分析模型。由此可见，人民币的汇率之战，也反映出东西方学术思维方法上的不同。西方人习惯于严格的理论推导和定量分析，即使对于某些目前尚不具备这样做的范畴也如此。而中国人则是更善于从全面和辩证的角度看待问题，习惯于采用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法解决问题。因此，只有善于向对方学习、取长补短、变换思维方式，才能取得主动。

事实说明，由于汇率理论是当前顶级的经济学家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所以美国给人民币升值限定数值是缺乏理论根据的。并且，对于前车之鉴，中国当然不能视而不见：1985年美元对日元汇率的波动范围在250左右，到了1987年，却一度达到了1美元兑换120日元。由于日元的快速升值，大量国际资金流入日本，造成日本的股市和地价的增长远远超过其同期GDP的增长，资本泡沫越堆越大。到了1989年，当日本政府认识到不得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时，一切都为时已晚。随即日本的泡沫经济开始崩盘，股价和地价暴跌，银行形成大量的坏账，由此也导致日本经济进入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十几年的经济衰退期。

日本在金融上的失败给世界带来的警示是：当今时代，不但军事上的落后会导致挨打，金融战略和金融理论上的落后，同样会导致吃大亏！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金融经济，应当看到的是，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制度性的，起因源于其政府的实质是为垄断资本服务的；而中国政府面临的决策困难是技术性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有限。

第五章 创新的含义

一、方法比结论更重要

表面看来，传统的市场研究一般侧重于商品市场，包括消费类和生产资料类的商品市场，并不涉及资本市场或服务市场，特别是金融服务市场。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但科学知识分化与综合的程度在不断地提高，研究方法分化与综合的程度同样也在不断地提高。因此，对于经济领域内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市场的学术研究，传统商品市场研究的方法也同样具有借鉴价值。

当前，在股市、楼市、综合国力和美元这四个社会热点话题中，绝大多数专家和学者们论述问题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注重经验，仍以定性的逻辑分析与推理为主；另一类是注重理论，一切论点基于其学术研究的成果。至于在他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对于市场研究有所了解，难以得知。一般说来，学术研究属于理论和技术的层面，市场研究属于应用的层面，而要解决实际问题，其实两者均不可少。

以中国房地产市场为例，如果是一份普通的市场分析报告，其内容应当包括：

(1) 市场主体，包括开发商、中介、最终消费者、投资者或投机者的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类型与行为特征；

(2) 市场的类型、规模、结构、定位、细分与发展阶段（初始、发展、成熟、衰退）；

(3) 市场的运行机制、驱动力与阻力；

(4) 市场的产业特点、行业集中度、直接竞争与替代竞争；

(5) 市场的商业模式与产业价值链；

(6) 市场的供给曲线、需求曲线与价格弹性；

(7) 市场与市场细分的发展预测；

(8) 主要的影响因素与环境，包括政策、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等；

(9) 市场的机会与风险等。

当然，一方面，对于不同的用户和读者对象，市场调研报告的内容应当是模块化的、可裁减的，或者是特定的；另一方面，要保证市场调研报告的质量，市场调研人员的业务素质及其研究方法也必须具有高水准。也许我们的经济学专家和学者们对于像《市场学》和《市场营销学》这类属于应用层面的知识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如果缺少对于市场的了解，又如何能做好学术研究呢？

实际上，一份高水平的市场研究报告并不亚于一个国家级的“软课题”项目，其应用的理论与技术已经包括运筹学、博弈论、线性规划、管理学、行为决策理论、心理测量学，计算机技术、专家系统以及神经网络技术等，并且其使用的模型和方法也涉及到购买者行为模型、品牌忠诚度的概率模型、客户服务的排队论模型、客户满意度模型、管理决策支持模型、市场竞争模型、品牌分析、相关性分析、协方差结构分析、定性与定量的聚合分析、客户定位分析、价格需求分析、客户行为分析与客户价值评估等。

美国有一本《市场研究》杂志，于1964年创刊，至今已有46年的历

史。该杂志由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编辑出版，其内容体现了有关市场营销最新的学术成果和应用方法，是全球最具有权威性和实效性的有关市场研究方法的学术期刊之一。该杂志的读者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司中的市场营销人员和市场咨询公司的研究人员，另一类是大学教授和对市场研究方法感兴趣的专业学术研究人员。

在美国，早期的市场研究方法就已经具有学术研究的性质。例如，在1964年《市场研究》杂志创刊前，美国就已经出版一些这类书籍。其中有《市场营销中的数学模型和方法》（Mathematical Models and Methods in Marketing）、《市场分析中的数量方法》（Quantitative Techniques in Marketing Analysis）、《市场营销和计算机》（Marketing and the Computer）、《市场营销的规划和问题解决》（Planning and Problem Solving in Marketing）等。从这些书籍的内容可以看出，在市场研究的领域内，数学模型、统计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等，早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市场研究》杂志又将许多新学科和新方法，例如运筹学、管理学、心理测量学（Psycho - Metric）、多变量统计方法、微观经济学方法等，引入市场研究的领域。另外，借助于计算机的信息处理技术、多维标度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和聚合分析（Cluster Analysis）等方法，都被用于分析消费者对于商品或服务的认知、评价和选择。此外，采用计算机模拟技术和联合分析（Conjoint Analysis），研究人员还可以建立优化模型，演示系统的动态变化，以及对于系统演变的多种可能性做预测。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决策支持模型（DSM）、离散选择模型（Discrete Choice Modeling）和分级贝叶斯分析（Hierarchical Bayesian Analysis）等方法，也被用在市场研究之中。近年来，甚至还出现了将人类学、社会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学、传播学等人文科学引入市场研究之中的趋势。当然，这其中可以引出的另一个课题是，并不是说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越复杂越好。研究人员应当做的是，需要在简单的方法和复杂的方法之间，在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如果研究方法过于简单，显然很难具有科学性，而如果研究方法过于复杂，其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又难以确保。换句话说，有些问题是现在可以解决的，而有些问题只能在以后才有可能得以解决。

从美国《市场学》和《市场营销学》的研究进展可以看出，世界上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具有整体性和多边界性，新理论和新方法在不断地被引入各行各业的研究范围。因此，沿袭老的研究手段、不思创新，就不可能保持与时俱进。

200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颇具社会影响力的书——《细节决定成败》。此书是作者以其本人多年做管理和咨询工作的实践，并借鉴国外企业管理的经验写成的一本关于细节管理的专著。书中，作者对于什么是细节、细节的实质、细节的功用、细节与效率、细节与创新，以及如何做好细节等议题做了论述，并以大量的案例说明了“细节”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该书发行以后，许多读者在网上发表读后感，对于作者的观点表示赞同。其中，有读者还将这本书与社会上流行的那句话“态度决定一切、细节决定成败”联系在一起。不过，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分析，或许用“方法决定结论，细节决定成败”来替代，可能会使对于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因为很明显，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时，追求细节其实就是一种方法。而方法论就是关于科学认识活动的方式、方法和体系的学说，是关于方法的理论。

古代的中国人说：“学贵有方”。法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曾经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其原文是 “The most valuable knowledge is the knowledge of methods”。查汝强先生是一位中国从事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的先驱者，他也说过：“在科学史上，科学的发展与科学方法的发展是一致的，科学的重大突破总是与科学方法上的创新紧密相关的。”

人们可以看到，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当代不断扩大的科学知识一方面高度分化，另一方面又高度综合，那些传统的单向科学已经不能完美地用于揭示当今的世界。越来越多的边缘科学、多边缘科学，甚至是交叉于自然、社会、思维和数学等大门类学科之间的大边缘科学，以及贯穿于理论层、技术层、应用层之间的系统科学、综合科学和横断科学，在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完善。

就方法与理论的相关性而言，方法是指由概念、判断和推理，按一定的逻辑次序所构成的思维运动的各种组合；而理论是指由这种思维运动所揭示出的概念与概念在内容上的联系。因此，方法与理论是一对相互依存的范畴。科学一方面是理论，另一方面是方法。理论与方法既具有相对性，又具有统一性，人类的思维就是理论与方法的统一。在科学和技术方法论的领域，20 世纪 40 年代至 70 年代，西方学者前后创建了“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以及所谓“分形、混沌和超循环”等理论，使系统科学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将科学和技术方法论上升到科技文化的层面，可以看出，其核心还在于数学、细化与量化是全部分析与研究的基础。所谓细化分析，是由于经济和社会问题具有质和量的多方面的规定性所决定的，因此对于这类具有高模糊度概念做量化分析，简单的方法是从细化分析开始。

二、量化流动性与价值评估

2010年5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10）》。涉及与政府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的流动性问题，《报告》只是对金融市场的债券部分进行了分析，并且仅用了两页纸的篇幅。《报告》指出：衡量流动性的标准和方法并不统一，通常有价格法、交易法、量价结合法和时间法。《报告》同时还预测，“2010年的CPI将处于2.5%~3%的温和增长态势，不必过于担心。”然而，到了2011年，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月份的CPI最高达到6.5%。由此可见，如果预测的周期过短，其实效性则只能大打折扣。

涉及国家的货币政策，按传统的理论，其传导机制基本上可用图5-1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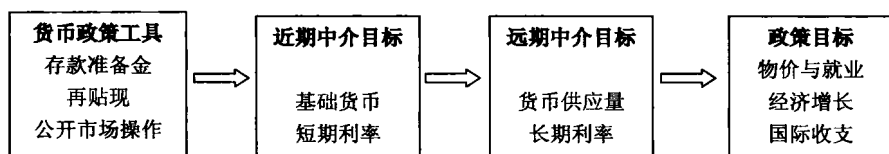


图 5-1 传统理论下货币政策的目标与实施

这其中，既然认为货币流动性与物价和通货膨胀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于是，国内有专家提出通过分析由数学模型所得出的量化指标，来判断流动性的方法，这些指标包括由CPI、GDP和 M_1 或 M_2 等变量所构成的货币速度指标和货币流动性指标。货币速度指标是指用费雪（Fisher Equation）方程式，即 $MV = PQ$ 来测算货币的流通速度，其中M表示货币数量，V表示货币的流通速度，P表示价格水平与CPI相关，Q表示商品或劳务

第五章 创新的含义

数量与 GDP 相关；货币流动性指标指 M_1 与 M_2 的比值。

另一种测算货币流动性的方法是将 M_2 看成是 GDP 与 CPI 的和，即 $M_2 = \text{GDP} + \text{CPI}$ 。对此，经济学家吴晓灵建议通过对 M_2 增速进行积极的调整来应对通胀压力。具体就是，在“十二五”期间，如果 GDP 增速定为 7% ~ 8% 的水平，可容忍的通货膨胀率为 4%，再为商品市场化留 1% ~ 2% 的空间，则未来的 M_2 应保持在 13% ~ 14% 左右，即：8% + 4% + 2% + = 14%。为了能够消化近两年货币的超发，则 M_2 的增速还应逐步收窄。此外，经济学上也用 M_2 与 GDP 的比值来反映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能力，但是，由于各国金融化程度不同， M_2/GDP 测度标准也不一致。

2011 年 1 月，在国家统计局一篇题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价格水平的影响”的文章中，作者指出超量美元的四个流向：流向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流向国际市场。这其中，当超量货币流入实体经济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 GDP 平减指数（又称缩减指数，指没有剔除物价变动前的 GDP）等一般价格水平就会上升，产生通货膨胀；当流入金融市场和资产市场时，就会出现金融产品和资产价格的膨胀；当进入金融体系内部时，主要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存放；当流向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时，石油、贵金属和农产品的价格等就会暴涨；而当流向新兴市场国家时，就会给这些国家带来通胀，或者资产价格泡沫。根据作者提供的数据，2010 年 7 ~ 10 月，仅在这 4 个月的时间内，国际市场上能源、农产品、原材料、金属和矿产品价格环比就已经累计上涨 7.6%、17.6%、11.4% 和 21.1%。

2011 年 2 月，在央视的财经节目中，有分析师提到与流动性相关的货币流向问题。该分析师指出，债券、期货、房地产等市场是能大量吸纳流动性的地方，可以通过分析这些市场的规模来估计流动性的状况。数据显示，2010 年我国债券市场的托管总额为 16.3 万亿元；期货市场的月成交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额在 10 ~ 40 万亿元左右，年成交额已经达到 200 万亿元以上，成为全球最大的期货市场；楼市的年贷款余额为 6.4 万亿元，存量资金达 15.3 万亿元；此外，民间的借贷资金存量还有 2.4 万亿元。可以想象，面对如此重要的数据和庞大的能吸纳流动性的几个市场，如果不做深入细致的市场调研和细分，就不可能弄清推动物价上涨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因素，因而，仅凭简单的货币政策和过于传统的调控手段来抑制泡沫和预防通货膨胀，也不可能有针对性。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考虑问题片面，掌握数据不完整，以及分析方法过于简单，是目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因此，沿袭过于简单和粗放的管理模式总是不可取的。

2009 年有报告称，我国有 36.4 万人的资产超过 100 万美元。中国富人的总资产合计超过 1 万亿美元，总额相当于 6.8 万亿元。另外，通过多个研究机构所获得的数据表明，2008 年前滞留在我国的热钱共有 5 000 ~ 8 000 亿美元，2009 年流入的热钱约为 1 670 亿美元，2010 年约为 1 593 亿美元。据此计算，目前我国热钱的总额约为 8 000 亿美元至 1.2 万亿美元，相当于 5.3 ~ 8 万亿元。两项相加，国内的游资和来自国际的热钱共计约为 12.1 ~ 18.8 万亿元。相比之下，2010 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全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新增贷款为 7.95 万亿元，仅约为各类游资总和的一半左右。换言之，我国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只有 50%。

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2010 年 11 月 24 日，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的专访时重申了其“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的观点。他说道：“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财政作为一个稳定的机制，而不要搞财政扩张。现在搞财政扩张没有任何意义。但货币一定是要松的，就是要根据所谓经济增长率再乘以通胀率，再考虑

第五章 创新的含义

到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所需要的货币化率要求，取得一个适当的 M_2 的增长率。”

涉及输入性的通胀以及治理物价，王建说：“全球货币狂潮一波又一波冲击着商品市场，输入型通胀也是一波又一波越来越严重。谁能让美联储不搞 QE2、QE3 甚至 QEN 吗？谁能挡得住？价格输入型通胀仅用货币政策就对付不了。食品价格方面，用加息也对付不了，因为人口还要增长，加息能加出土地来还是能减少人口？再加上现在要调整分配关系和收入比例，以及增加个人收入，这也是大势所趋，这些都不是货币政策所能改变的。”“政府现在治理物价的着眼点，一个是给中低收入者补贴，搞好财政的转移支付；再一个是严厉执法，严厉打击那些不顾民生，炒作商品、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而采用直接限价的办法则不是好办法，因为这就把市场机制给破坏了。”

至于如何正确地判断是否存在通货膨胀，国际上一般认为 CPI 有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为严重通货膨胀，而对于恶性通货膨胀的定位则更高。与之比较，我国专家给出的标准要保守许多，认为 CPI 在 0 以下为通货紧缩，1 以下为偏冷，3% ~ 5% 为温和，6% 以上为过热，8% 以上为恶性通货膨胀。此外，还可以通过 CPI 与 PPI 的不同组合来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即如果 PPI 与 CPI 共同上涨，则反映经济已经过热；PPI 上行，CPI 下行，为企业盈利能力增强；PPI 下行，CPI 上行，为经济增速减缓，有陷入滞涨的风险；PPI 下行，CPI 下行，表明经济已经走向衰退。

论及通货膨胀的成因，有必要提及美国经济学家，200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费尔普斯认为，通胀不仅取决于失业状况，还与通胀的预期，即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并且，长期失业率并不受通胀影响，仅仅取决于劳动力市场。费尔普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是，他修正了有关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

在稳定负相关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将基于理性预期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引入就业决定与工资—价格的动态均衡理论，并提出了资本累积的黄金定律。

费尔普斯的理论模型实际上是一个由“工资—通货膨胀—就业”所构成的关联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所能带给人们的启示是：既然存在各不相同的福利标准、就业标准、工资标准和赋税水平，那么就不可能有相同的通货膨胀标准。而实际上更为复杂的情况是，除此之外，通货膨胀还与GDP、分配制度和国际贸易相关。所以，那种依赖于传统的经济理论和简单的货币政策，并且仅用单一的指标度量通货膨胀的方式已经失去了科学性。因为一方面，物价的上涨是相对工资和社会福利上涨的；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游戏的规则也早已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再回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10）》，如果说其中涉及流动性的部分写得过于简单，那么其中涉及CPI的部分还算比较详尽。在报告的“2010年中国CPI上行中并无通货膨胀”的专题分析中，作者指出：（在低GDP的增长条件下）西方国家一般以CPI连续上行6个月且超过3%为判别通货膨胀的尺度。作者将我国CPI的上涨分为五种情况：①价格向价值回归中的物价上涨；②资源货币化中形成的物价上涨；③商品供不应求造成的物价上涨；④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引起的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⑤货币发行量过多引起的物价上涨。作者认为对于上述5种情况，只有第5种情况与通货膨胀相关。

作者的结论是：在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资源类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将资源类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简单地定义为通货膨胀。与美国比较，其资源类和农产品的价格不包括在CPI之内，而我国的这部分产品不但包括在内，而且还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货

币政策是总量需求政策，不可能解决由某些产品价格上行所导致的 CPI 上涨。不可将物价变动的复杂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由流动性所导致的通货膨胀。

此外，根据社科院 2011 年《经济蓝皮书》引述中商流通中心和海关的统计数据，截止到 2010 年 8 月，我国全国 9 种大宗商品的消费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10% 以上；12 种重要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超过了 40%。这一数据与美元对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累计贬值幅度已高达 40% 以上基本相符。所以，可以认定那种认为“流动性过剩始终是造成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的说法过于笼统。综上所述，正如《货币博弈》的作者唐风先生所说：“通货膨胀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货币现象，更多意义上是一个由制度、结构和国与国之间汇率博弈乃至政治博弈形成的复杂经济现象。”

同样，涉及到被社会所普遍关注的资产泡沫问题，也需要做深入的分析。例如，虽然大宗期货商品的价格变化多数与季节、生产周期和短期投机资金的介入有关，但是资源类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却与之有很大的不同。具体来看，除去受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扩大了需求、美元贬值和国际投机资金的炒作以外，国际资源性商品价格上涨更基本的原因还与全球资源性商品存在供给瓶颈，以及部分资源性商品的储量趋于枯竭有关。根据 2000 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的《矿产资源与国家安全》一书所提供的数据，从未来 20 年世界矿物原料的保证程度看，在资源性商品中，有 6 种矿产资源的保证年限已经偏紧，其中锌为 24 年、锡为 21 年、铅为 21 年、金为 19 年、银为 15 年、锰为 14 年。所以，不能将这类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完全认定为纯粹的泡沫，如果这样认定，那么，古董、字画和艺术品的天价就成了泡沫，高档的奢侈品也存在泡沫。

另外，根据“日本资源研究会”于 2007 年所做更为详尽的报道，目

前全世界已被开采的黄金为 15.3 万吨，确定尚存的黄金储藏量为 9 万吨，其中可开采的黄金储藏量为 4.1 万吨。按近年来世界黄金年产量 2 500 吨计算，2011 年以后，全球可开采的年限仅剩不足 13 年。与黄金比较，白银的情况更紧迫。2007 年，世界白银确定的储藏量为 56.9 万吨，其中可开采储藏量为 27.2 万吨。按近年来世界白银年需求量 2.8 万吨计算，2011 年以后，全球可开采的年限仅剩不足 10 年。表面上看，“日本资源研究会”提供的数据要比我国《矿产资源与国家安全》的报告乐观，但是，即便如此，未来全球性的资源紧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由此可见，对于奇缺的物品、趋于枯竭的物品和有特殊属性商品的高价格，不能简单地冠以泡沫，这其中有“伪泡沫”的成分存在。“伪泡沫”概念的含义是——影响价格的既有短期因素，也有长期因素；既有流量因素，也有存量因素、增量因素，以及由供需严重失衡或行业垄断所造成价格上涨的因素，这些均不应简单地用泡沫来认定。比如，近年国际铁矿石价格的飞涨，其背后就有行业垄断的因素存在。对于抑制这类所谓的“伪泡沫”，一般的货币政策显然不可能起作用。除去按一般经济学理论所考虑到的因素以外，导致我国 CPI 指标的上涨和通货膨胀的还有其特殊的深层次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以防止通货膨胀为目标，其关注点当然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忽略掉的是制度性的因素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从协同论的角度看，这其实就是一个“输入”与“输出”的自调节问题：如果作为一种“输入”，政府过度地依赖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那么其结果必然是作为“输出”，市场就一直会频繁地在“过热”和“过冷”之间震荡。然而，如果作为“输出”，市场主要是由消费带动的，那么作为一种“输入”，政府宏观调控和防止通胀的压力自然就会减小。所以，充分发挥和利用好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降低储蓄率，促进居

民的消费升级，引导信用消费，以及做大做强资本市场，鼓励居民直接投资或许应成为国家决策的一个战略性方向。如此，也不可能有那么许多的所谓“两难”问题存在。

不过问题是，在我国，储蓄率从来也没有被列为一项必要的经济要素指标。在旧的体制之上，不断地沿袭传统货币政策的调控手段仍然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调。进一步说，一方面，在高储蓄率的情况下真正的扩大内需很难实现；另一方面，如果我国由政府行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不能改变，那么，稳定的低通货膨胀和高增长的良性经济运行状态显然也很难持续。而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根源其实就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打破旧体制，建立起新体制，当然就不能在新的经济运行状态下找到新的平衡点。

在《货币博弈》一书中，作者认为，我国的现实情况是通货膨胀压力的形成机制主要由制度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开放性因素三部分构成。制度性因素是指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由政府投资推动的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仍然在延续；结构性因素指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上的不协调性；开放性因素当然是指过高的外贸依存度。通过分析，作者的结论是：“……因此，防治通货膨胀必须跳出传统思维，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寻求新的求解之策。”国内也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制度性的通货膨胀”，说的大概也是这个道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09 年投资、消费、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资本形成为 92.3%，拉动 GDP 增长 8%；净出口为 -44.8%，拉动 GDP 增长 -3.9%；消费为 52.5%，拉动 GDP 增长 4.6%。而 2010 年第三季度的近期数据显示，上半年资产形成的贡献率为 59.1%，消费的贡献率为 35.1%，出口的贡献率为 5.8%。比较一下 2007 年和 2009 年以后的数据能够发现，从短期看，政府有钱可以增加抵御危机的能力，很快

地使经济的发展得以恢复。但是，如果从长期看，持续以政府投资为主拉动经济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导致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并存，因此，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是关键。市场有其内在的规律，越俎代庖必定是事与愿违。

2009年4月，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一篇题为《储蓄大于投资是我国经济核心问题》的文章中指出：2000年以后，我国居民储蓄率在下降，政府储蓄率在不断上升。政府储蓄率上升的源头在于，一是政府投资引发的政府储蓄倾向的上升，二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中收入分配向政府部门倾斜。因此，他建议降低储蓄要“减税增支”，将政策的基本着力点放在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上。

具体来看，我国的增值税税率为17%，换算为国外可比口径，即“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同时，我国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为33%，税率也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居民所得税的税率同样也比较高，并且起征点也比较低，这些都可以成为改革的切入点。而在减税的同时，还要增加居民的收入。李扬认为，支撑中国经济良好增长的因素包括中国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廉劳动力、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消费、垄断行业改革带来的变化、高新科技产业化带来的新经济、加入全球经济运行发挥比较优势带来的贸易顺差等。也就是说，头脑清醒，认清形势很重要。这既需要要明了优势之所在，又需要深究问题的根源。

回到方法的层面。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按惯例出版的经济蓝皮书——《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当涉及对于国内的经济形势做出分析和判断时，同国内其他相关研究机构的方式一样，其采用的经济指标都是GDP、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就业、CPI、物价与通货膨胀率、进出口贸易、政府财政与税收、货币储蓄与存贷等。与保罗·萨缪尔森在其所著《经济学》中所建立的宏观经济

第五章 创新的含义

分析模型相比较，可以看出，以上的内容其实都在其中了。但是，如果对此再做进一步的分析，便可发现：

(1) 保罗·萨缪尔森所建立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是一个完整和有机的系统。其模型中的一些参数有的是处于输入端的，有的是处于输出端的，并且，在输出与输入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反馈效应，比如被弗里德曼所关注的所谓“乘数作用”，即 GDP 和物价对于利率的负反馈作用。而在国内，在对于经济运行做评测时，这类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研究机构的注意。

(2) 在保罗·萨缪尔森的分析模型中，他所提出的从利率变化传导到价格和产量的因果链条是一个关键。在此基础之上，弗里德曼所推导出的货币需求函数，则将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货币发行的理论。与之相比，我国确定货币供给量的方法是否也具有充分理论根据呢？

(3) 既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并且多年来在拉动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贸易和消费中，进出口贸易一直占有非常大的比例，比如 2007 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约 70% 左右，那么，能否为制定国家的汇率政策提供可靠的理论根据就显得十分必要。如前文所说，从控制论的角度看，保罗·萨缪尔森的因果链条所描述的是一个单一经济体的“封闭系统”，而在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环境下所形成的是一个“开放系统”，汇率就是这个“开放系统”的核心变量。因此，无论是对经济运行做评测，还是对政府决策提建议，都需要依据可靠的模型，对于汇率进行深入的定量分析。并且，如果要求解这个核心的变量，除了需要掌握经济的增量数据以外，还必须关注到经济的存量数据，以及经济增量与经济存量之间的关系。

(4) 涉及对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提建议，在经济蓝皮书中有如此的提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从语言和思维方式上讲，这可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以说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化的特征，并且，这的确也是中国人的一种优势。问题是，阐述一种观点，实际上既需要有归纳的抽象，也需要有细化的分析；既需要有定性的结论，也需要有定量的分析。一般来说，前者是中国人的长处，而后者是中国人的短处，并且，这种短处所带来的结果，当然不仅只反映在语言和思维方式上，同时也一定会反映在研究方法上。

(5) 在国内各类研究机构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研究方法上，普遍存在一种趋同现象。这种趋同现象不仅表现在学术观点上的人云亦云，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单一和雷同。其造成的结果是，学术研究报告的水平普遍不高，所提政策建议的根据不充分。需要说明的是，趋同的概念原为生物学术语，后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被荷兰的经济学家丁伯根（Jan Tinbergen）和美国的社会学家贝金（Beghin）等人用于论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融合，是一种现代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而这里的所谓“趋同论”的提法仅仅是借用这一概念而已。

2010年5月17日，《第一财经日报》登出了一篇题为“我国经济或现多重‘两难’选择”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指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当前我国经济上所面临的“两难”是多重的，其中包含人民币是否需要加息、升值，房地产市场是否需要调控，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需要继续实行等等。文章的作者在结论中强调：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增量扩张发展经济的模式，造成了财富分配上极度的不合理，目前已经到了必须对“既得利益”进行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做出战略性的调整。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文章所提及的经济战略问题，其实，经济决策上多重“两难”选择的哲学含义是：①“两难”问题是忽视市场机制，政策

第五章 创新的含义

行为过多所导致的一种结果；②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凡事均是有利必有弊；③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相关性，因此，看问题需要全面和深入，必须摒弃片面、孤立和静止的思维方式；④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没有量的规定性，就不可能有质的规定性，因此，没有深入的定量分析，也不可能有全面的定性分析；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完全具有同一性，因此，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普遍采用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方法，在经济学的领域内同样适用。

对于宏观经济决策而言，除了量化流动性以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属于经济评估之一的风险价值评估，包括主权信用评估、金融资产价值评估、投资风险评估等。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P）、穆迪（Moody's）和惠誉国际（Fitch Ratings）普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传统的经济评估方法一般有专家评估、统计评估和综合评估等。三大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依据主要是运用统计学的方法，通过对历史资料，如违约概率的统计分析，预测被评级对象的信用状况。综合评估法是一种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评估方法，需要在选择相关的财务指标和其他指标，并为其设置权重，通过对指标进行计算后，得出评估结论。风险价值评估模型（Value at Risk），是近几年在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比较先进的，依据计量模型对金融风险进行评估的方法。目前已被全球的各主要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和金融监管机构广泛采用。这种方法属于技术性的定量分析方法，并具有趋势预测的功能。

在当今国际融资本大流通的背景之下，对金融资产和投资进行风险价值评估似乎越来越重要，但是，不能忘记，2001 年在美国发生过令世界震惊的安然事件。一个年收入高达 1 000 亿美元，在《财富》杂志上被评为“美国 500 强”中第七的安然公司，突然于 2001 年 12 月 2 日正式向法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院申请破产保护，破产清单所列资产高达 498 亿美元。另一个同类事件影响更深远，这就是发生在 2008 年，震动全球的以 CDO 产品为标的的美国次级贷款危机。这两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再好的数学模型和技术分析方法也是由人掌握的，而人需要用制度来制约。

与上述情况不同，在我国，问题的另一面是经济决策缺乏对技术性方法的重视，以及做定量分析的能力不足。我国的专家们还是习惯于定性的推理，以及使用过于传统的分析方法。以国家金融资产的保值为例，到底应以什么比例持有外币、外债、大宗商品，或进行海外投资？许多专家都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么应当放在几个“篮子”里？这些“篮子”的可靠性各自是多少？有量化的标准吗？总之，专家就应该是专家，不能只是用一些浅显的推理说明问题、提建议。

三、理论框架与发展模式

人类社会模式的演化与经济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二战以来，以美国为突出代表的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经历了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义、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理性预期主义、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等几个发展阶段。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代表的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初期，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代表的是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中期，那么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就是西方已经步入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后期。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最初由经济理论家推出，最终由政治家推动，其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

涉及我国的经济运行和管理，在财政政策方面，全球性金融危机之

第五章 创新的含义

后，我国的宏观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势头，于是，政府出台了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11月，中国政府率先推出用于“保增长、保民生”的总额达4万亿元的一揽子扩大内需的计划。专家估计，两年内，这4万亿元以公共服务消费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政府投资，能带动约45万亿元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而拉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

在货币政策方面，2009年1月，根据央行在京召开的工作会，2009年全年的货币供应总量，以高于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约3~4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作为目标，广义货币的供应量 M_2 增长幅度定在17%左右。不过，到2009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的实际增幅已经达到了27.68%，余额为60.62万亿元，增幅比上年末高出9.86%。因此，有人认为，2009年国家的货币政策已经不是适度宽松，而是完全宽松。

2011年6月14日，在国家统计局于当日上午公布CPI同比上涨5.5%，PPI上涨6.8%之后，央行立即作出反应，下午就宣布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本年度第六次上调该项指标。从2010年下半年央行开始实施所谓稳健货币政策以来，共四次加息，年利率达3.25%，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21%。至此，国家紧缩的货币政策已经使全国银行间同业隔夜拆借利率（Shibor）高达6.2%，民间借贷市场的年贷款利率更高达20%以上。2011年7月7日，央行的货币政策又转向了使用价格工具，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了0.25个百分点，使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达到了3.5%。那么，为什么要将完全宽松的货币政策说成是适度宽松，将十分紧缩的货币政策说成是稳健呢？实际上，这反映出的既是一种慎用货币政策的惯性和心态，也是一种颇带唯心主义色彩的经济理念。

在金融体制方面，2011年7月，在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发表了“最优金融结构与国家角色”的演讲。演讲中林毅夫指出：法律、政治、文化以及发展战略将影响一个国家实际的经济结构，然而，与最优经济结构背离将对实体经济以及经济发展产生不利作用。他认为，最优金融结构应根据最优工业结构的变化而变。金融结构的有效性取决于其是否能以最佳方式促使资源流向经济体中具有竞争优势的工业中的最有效率的企业。目前，由于中国的金融系统以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为主，因此其无法为多数中小型企业和个人提供有效的资金贷款。此种局面，需要变革。

在税收和政府财政收支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1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为31.2%，是GDP增速9.6%的3倍，也远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13.2%。至年底，我国全年的财政收入将能超过10万亿。历史数据表明，在近10年时间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6倍，居民收入增长却不到3倍。就此，有专家指出，以广义的宏观税负口径计算，目前我国仍然是全球宏观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政府的高税收虽然有利于弥补多年来在民生建设上的欠账，改善居民在养老、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方面需求，但是却不利于促进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过，好在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及提高劳动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已经被列入我国“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的规划。2011年9月1日，国家颁布了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修改后的个税法已经将原先的月工资、薪金所得费用的“起征点”从每月2000元提高至3500元，这将使我国的纳税人数从8400万减少至2400万，约有6000万人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最后，归结到经济发展模式方面，长期以来，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我国一直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即政府更着重于通过财政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一贯慎用货币手段；更相信政府职能

部门的作用，而不是市场。从理论上说，这种发展模式基本上归属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在理论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灵活的西方似乎又要重拾凯恩斯主义了；而稳健的中国却出现抛弃凯恩斯主义的呼声。例如，在我国已经有许多专家发表了诸如“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超越凯恩斯主义”、“中国不需要凯恩斯，更需要邓小平”的议论。一个起因，两种结果，问题好像难以理解。然而，从哲学的角度看，这其实只不过是两个方向上的“物极必反”。

有关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提出了质疑。他反对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归功于以国有经济主导以及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他指出：由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受阻，经济领域出现“国进民退”，政府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市场力量出现了倒退。吴敬琏认为，目前国有部门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处的主导地位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尽管国有经济不再是GDP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仍控制着经济的关键性领域，国有企业继续在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领域处于垄断地位；二是各级政府在配置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上，具有巨大的权力；三是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法治基础还没有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拥有自行裁量权，可以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

此处，如果将吴敬琏的质疑与前文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的观点相联系，便可以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即究竟是国有经济主导和强有力的政府管制，还是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廉劳动力、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消费、垄断行业改革带来的变化、高新科技产业化带来的新经济，以及比较优势带来的贸易顺差等推动了我国经济快速持续的发展？

以上问题涉及到的主要是有关政策、体制和发展模式的问题。如果将我国所采用的经济政策与西方整体经济理论的对比再引申一步，这其中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①沿袭计划经济的体制和惯性，除一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外，我国还有十分明确的产业政策，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②在认为必要时，我国从未放弃过使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③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基本上还是滞留在流量分析的阶段，而完全忽略了存量分析的重要性。

然而，处在 21 世纪的国际大环境之下，现有绝大部分的经济理论其实都被局限在“流量经济学”的范畴之内，并且这些理论也很难适应这种新的局面。其原因是：①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超主权”货币的美元霸权已经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②经济的发展与能源、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而，忽略对于经济存量分析的“流量经济学”也就不再是完备的理论了；③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际之间，由此，单一的部门经济学同样也失去了客观性。

涉及美元霸权前文已经有所论述，而仅就经济流量和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言，实际上，一方面，无论是从经济运行、综合国力的对比、国家的货币政策、国内的货币流量，还是从国际间的金融博弈的角度来考虑，美元的持续贬值所能产生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流量，当然也包括存量，即国家的财富总量、货币总量、储蓄总量以及资源总量等；另一方面，处在不断相互转换之中的流量与存量，也必然会对物价和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因此，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而言，忽略存量分析将是十分危险的。正如前文所述：美元的贬值具有双重意义，这样不仅能使美国可以赖掉大量的债务，而且也能通过战略储备资源的增值，使其存量财富的总值得到大幅度的增加。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存量与流量的概念在不同的经济范畴内

有不同的含义：储蓄概念中的存量是相对于 GDP 的增量而言的。而在货币理论中，货币的存量是指所有财富的总和，也包括资本市场；流量是指储蓄，也包括商品市场。

对于分析货币存量的重要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认为：宏观经济短期分析应该揭示的是流量和存量、投资和资本、储蓄和财富、以及储蓄和资产存量的特定形式之间的累积动态过程，不应以短期分析期间短，存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为借口，而忽视流量和存量之间的关系。在经济活动中，对存量和流量的另一种形式的定义可以称之为“行为”。存量行为是为未来的生产和消费服务的行为，或称之为“资产持有”行为；而流量行为是为现期的生产和消费服务的，是一种“收入周转”行为。货币兼有价值储藏功能和便利交易的功能，当它作为一种价值储藏的手段时，它具有资产的性质，可以被称之为存量性质；当它履行便利交易和融通生产的功能之时，它在收入决定和经济循环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此时的货币可以被认为具有流量性质。

再看有关经济增长方式和扩大内需的问题。2009 年 7 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我国政府消费占 GDP 支出比重比较稳定，呈逐渐上升趋势。但是，居民消费占 GDP 支出比重下降的趋势很明显。总体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值欧美国家一般占 60%~70% 左右，而我国近年来仅约占 30%。因此，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能仅仅依靠出台一些产业政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政策理念和经济理论是否能发生革命性的转变，以及居民消费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否能够有大幅度的提高。这里需要认识到的是，正像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长期固守冷战思维难以自拔一样，中国人在经济建设上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同样是根深蒂固的。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1952 年该比例为 69%，到 1978 年改革开放时期下滑到 45%，2004 年缩减至 35%；与之相反的是，政府开支占 GDP 的比重则持续上涨，从 1952 年的 16% 升至 2004 年的 30% 左右。相比之下，例如美国，其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从 1952 年的 64% 上升至 2004 年的 71%，政府开支占 GDP 的比重同期从 16% 下降至 10%。俄罗斯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在 1992 ~ 2003 年间从 35% 上升至 55%，政府开支占 GDP 的比重则维持在 22% ~ 25%。巴西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从 1950 年的 51% 上升至 2003 年的 60%，而政府开支占 GDP 的比重在这 50 年间维持在 21% 左右。

2008 年 2 月，在一篇题为《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的文章中，陈志武总结到：“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 GDP 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 GDP 的增速。从 1995 年到 2007 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 5.7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1.6 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 1.2 倍。”（据报道，2010 年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额已经超过 8 万亿元）

当谈到城市消费与农村消费的比例时陈志武认为，我国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消费水平与农村消费水平的分化严重。他指出，在居民的消费支出中，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 1952 年的 31.1% 上升到 2008 年的 74.4%；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 1952 年的 68.9% 下降到 2008 年的 25.6%。不过，这其中需要剔除的是城市化因素的影响，如果用人均数值做比较，应当更为合理。

在分析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时，陈志武教授认为，我国在制度上存在的问题是关键。这其中有对于政府职能的制约与监督以及国有企业所享受的优先待遇及其所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等方面的问题。西方国家征税权和政

府预算权受国会和媒体的制约，所以政府开支占 GDP 的比重不可能过高。而在我国，一方面，政府推出新税种或提高现行税率相对容易；另一方面，在国有制经济下，GDP 的增长使政府得到了由资产增值所带来的主要收益，但是百姓能享受到的实惠却不明显。

2007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各界人士普遍认同了依靠改进增长方式、促进内需、扩大消费，协调“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经济的观点。不过，仅对于“促进内需、扩大消费”而言，我国现实的国情是：大政府、小社会；低工资、高储蓄，再加上两级分化严重等现象一直长期存在，并且还有继续加大的趋势。因此，如果存在于我国社会上的根本问题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那么“促进内需、扩大消费”的目标就很难实现。比如，从我国国民储蓄占 GDP 的比率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一般维持在 33% ~ 34%，进入 90 年代以后曾有大幅度的上升。2006 年 3 月，央行行长周小川称“目前我国国民总储蓄率已占到 GDP 的 40% 以上，中国在这方面要小心”。但是，实际上这一数据早在 1994 年就已经达到 42.7%。1998 年前后，我国的储蓄率大约在 37.5% 左右，2002 年以后，我国的储蓄率又有较快速度的增长，到 2007 年，甚至上升到 49.9%。然而，对比一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便可看出，我国储蓄率实际上已经过高：美国长期处于在 7% 以下，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一般在 15% ~ 25% 左右。

表面看来，我国希望依靠拉动内需来发展经济的潜力很大，然而，如前文所述，2009 年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有 25.5 万亿元，全国平均每个家庭储蓄额约为 5.9 万元，并且，近年来，全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的增长率也仅在 4% ~ 6% 之间。如果分开来看，按城镇居民家庭占有 80%，乡镇居民家庭占有 20% 的储蓄份额计算，城镇居民家庭约有 1.71 亿个，平均每个家庭的人民币储蓄约为 11.9 万元；乡镇居民家庭约有 2.58 亿个，

平均每个家庭的人民币储蓄仅约为 1.97 万元。所以，如果除去少量需要用于应急的储蓄之外，我国普通城乡居民可用于其他较高档消费的钱非常有限。通过以上的数据和分析，能使人们认识到的是，一方面，调整社会的财富分配机制需要有更具体、更有效的措施；另一方面，对于与之相关的经济指标的变化，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否则调整经济战略目标就难以达到。

2009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将“扩内需、保增长”放在首要位置。会议明确了 2010 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严格限制产能过剩、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发展，以小城镇发展成为城市化重点，以及增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总的看来，会议似乎及时且方向明确。不过，从学术方法论的角度看，“扩内需、保增长”，政府唱主角的惯性思维依然没有改变，而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措施也依然不明确。具体来说，要能真正实现扩内需，一方面，适当降低全民储蓄，积极地引导信用消费，适度地花未来的钱，才是扩大内需的市场化方式；另一方面，改革分配制度，增加居民的收入，让居民能更多地与政府分享 GDP 的成果，才能真正使居民的消费能力有所提高。

这里所涉及的实际是对于“扩内需”政策效果的衡量标准，其中首要的指标应当是居民储蓄占 GDP 的比例是否能与国家总体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确，从出台产业政策入手，鼓励电器下乡、建材下乡，确实可以拉动农民的消费。不过，如果能大幅度降低城市居民储蓄水平，则拉动内需的效果就可能更为明显。资料显示，2007 ~ 2010 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资产总额分别为 50 万亿元、62.4 万亿元、78.8 万亿元、94.3 万亿元。这其中，中国政府储蓄率不仅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也高于周边许多发展中国家。2000 年之前，中国政府储蓄率一直低于 15%，2001 年突破 19%，2003 年突破 21%，2003 年以后突破 40%，呈现逐渐走高的

第五章 创新的含义

趋势。

另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 年，我国 GDP 超过 24.6 万亿元，GDP 增长 11.4%，CPI 上涨 4.8%。在 11.4% 的 GDP 增长中，消费对 GDP 的贡献 7 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消费、投资、出口分别拉动 4.4、4.3、2.7 个百分点，占比分别为 38.6%、37.8%、23.6%。该年度政府储蓄约占 41%，企业储蓄约占 41%，居民储蓄约占 18%（与央行的数据略有差距），为 17.5 万亿元，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重高达 35%（按照以上数据可以粗略地勾画出图 5-2）。2010 年我国宏观经济 GDP 增长 10.3%，其中消费拉动 GDP 增长 4.9 个百分点，呈上升趋势；投资拉动 GDP 约 4.7 个百分点，依旧很高；出口拉动 GDP 约 0.7 个百分点，出现大幅度下降，占比分别为 47.6%、45.6%、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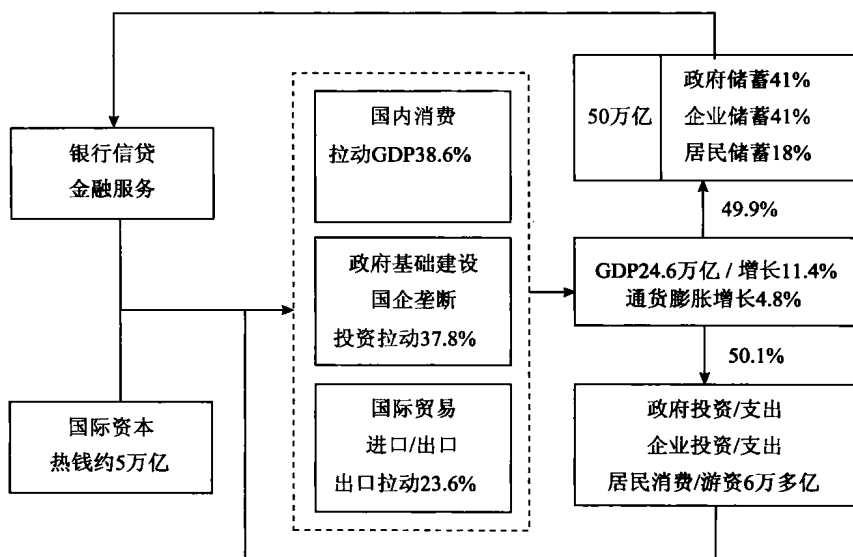


图 5-2 2007 年我国的宏观金融经济结构

依据图 5-2，可以对有关流动性以及流量与存量的关系进行一些分

析。2008~2010年，我国GDP的总量分别为31.4万亿元、33万亿元、39.7万亿元。根据央行及从其他部门所获得的数据，截止2010年末，我国狭义货币 M_1 余额为26.7万亿元，广义货币 M_2 余额为73.56万亿元，同比增长17.2%。此处，GDP和 M_2 通常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流量，而前面提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一般是不被关注的存量。

在经济学界，人们普遍地认为广义货币的供应量 M_2 过高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其结果是导致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判断方法是，如果 M_2 增速快于GDP增速与通货膨胀率之和，便是出现了货币超发的现象。有关货币供给与物价或CPI的关系，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和武汉理工大学的两位学者在一篇题为《货币供应量、银行信贷与CPI的动态关系分析》的论文中，运用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Function）的计量经济模型，从技术层面分析了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对于国内物价的动态影响关系。他们认为：从总体上说，货币供应量、银行信贷的变化对物价均有明显的正效应。具体来说：①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较银行信贷对物价有更大的影响；②从短期看，银行信贷的变化比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物价又有更快的更为明显的效果，具有更好的时效性。

但是，也有少数专家对此持反对意见。例如，国内有专家的看法是，虽然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当前货币政策首要任务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过于简单的政策取向，只能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一方面，总量调节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有限，难以解决结构性膨胀的矛盾，需要根据不同成因对症下药；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效用存在临界点，超过临界点后，治理通胀的成本将显著上升，如果继续使用，则必然会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

2010年11月，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我国目前是物价上涨而非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原因主要应当从需求面来分析，例如，以前出现过的

第五章 创新的含义

猪肉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都与供给不足有关，不能仅从货币政策方面考虑。另外，国际油价、铁矿石、各种原料、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以及热钱涌入都能造成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如前文所述，2009 年流入我国的热钱折算成人民币，约在 3.4~5.5 万亿元之间，民间游资有 6.8 万亿元，两项相加的总额在 12 万亿元以上，这些钱显然并不会因为国家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消失。

从以上罗列的数据可以发现的问题是：①相对于 GDP 的产出而言，我国的总储蓄率过高；②无论是收入，还是投资，政府所占的份额过大；③在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中，宏观调控的成分大于市场调节；④消费不足的根源在于体制，并且这不是几项产业政策所能改变的；⑤由于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所造就的是一个开放系统，所以，以往建立在封闭系统下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和传统的调控手段已经不完全适用了，时代的发展需要创建新理论；⑥GDP 和 M_2 不仅体现了大多数经济学所关注的增量，同时也在改变着存量，制定政策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相关的量。

论及国内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在谈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两大难题时，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突破；腐败蔓延，侵入党和政府的机体，影响党性和政府公信力是我国面临的两大难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突破，在于体制性障碍。其中，政府掌握过多资源，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相反，一系列集权式的制度安排，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大量投入资源，获得 GDP 高速度增长这一“虚假繁荣”。他认为，腐败问题的根源仍在于体制性障碍。“官倒”现象严重，行政权力介入交易……“但清理审批制的行为，并未贯彻到底”。相反，近年来，行政审批用各种方式越发宽泛起来。他强调，铲除制度性障碍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革，目标是实现 1992 年第 14 次代表大会所说的，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建立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同时强化与市场化配套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这里完全有必要再次重温一下邓小平的告诫：“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四、危机的根源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为确保我国科技创新的能力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06 年我国政府积极地采取了一些措施：①定义为“中国创新元年”；②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发出了 15 年内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号召；③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等。

在科技人才方面，有资料显示：截至 2006 年，我国有科学院院士 705 人、工程院院士 703，对国家科技进步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5 206 人。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总数已达 2 174 万人，其中研发人员 120 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另外，近年来，我国的科技论文的总数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科技人员在国际上发表的科技论文也已经占到了世界总量的 5%，位居世界第五位。更为可喜的是，由于在我国的科技队伍中，高素质人才的比重不断上升，科研人员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占到了总人数的 80%。

然而，我国科技界所出现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其中存在的问题。与我国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相比，对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言，这些问题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制约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潜在的学术危机。归纳一下，这些问题大致包括：

- (1) 治学态度不严谨，粗制滥造；
- (2) 学术风气不正、投机取巧、弄虚作假、抄袭剽窃成风；
- (3) 追名逐利、垄断资源、拉关系、走后门、立门派、学术腐败严重；
- (4) 学术水平低、研究方法简单、学术论文质量差、缺乏创新能力；
- (5) 教育体制僵化，教育水平低，专家、教授的知识老化；
- (6) 知识面狭窄、理论脱离实际，学术团体、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新闻媒体乃至整个社会缺乏综合性人才；
- (7) 学术思想陈旧、学术文化落后。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当今在我国存在的学术危机是普遍性的，不仅限于大专院校所属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更包括了政府所属的重要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2004 年以后，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快速涨价阶段，为抑制房价的上涨，国家先后密集出台了十几项相关的调控措施，但结果却总是收效甚微。另外，我国的国民经济高速平稳地发展了 30 多年，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不到 20 年，但却有七八次的大起大落。2008 年我国股市下跌幅度全球第一。2010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率先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但我国股市的跌幅仍是全球第一。试问，这些现象都是偶然的吗？现象的背后又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的只能是政府所属重要研究机构提出的政策建议缺乏合理性，不符合实际，我国存在学术危机。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某些低水平经济学家对于政策所提的建议。

如果再做进一步的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现实性的，一个是历史性的。现实性的原因又可分为思想上的和体制上的。由于目前我国仍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社会上出现的追逐名利、利益至上和拜金主义对于科技界和学术界有所影响，这种情况在所难免。而涉及体制上的问题，在中央电视台 2009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年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公司的力量》中，有这样一段评论值得参考：为保护更多中小公司的创新能量，美国政府不得不遏止微软公司的技术垄断，“因为无论是行业垄断，还是技术垄断，都将破坏创新的生态环境。”由此，可以使人联想到的是，对于中国的发展和 innovation 而言，政府权力的过分集中，大型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以及学术界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思维，同样会成为不利的因素。

涉及传统的中国思维，其本身就具有落后和保守的一面，通过比较，便可看到，文化与思想意识的变革是人类社会革命的先导。在西方，欧洲处在所谓黑暗的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始于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结束于 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前期，前后约 1 000 多年。西方从中世纪后期到进入近代社会，前后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文化运动：

第一次是发生在 14 世纪至 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主要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但同时也是具有人文和反封建性质的思想运动，前后经历了约 300 年；第二次是发生在 17 世纪至 18 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前后经历了约 100 年；第三次是发生在从 1848 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到 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前后经历了约 70 年。如果将前两个看成是西方文明的主干，后一个则是西方文明的分支。总的说来，近代西方的这种在文化与思想意识上的彻底变革，前后经历了约 500 年。

与近代西方在文化和思想领域内所进行的变革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变革不但晚了 500 年，并且在美国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看来，中国只存在被动式的文化变革。因此，他将此称为“冲击——反映”模式，其含义是，中国社会缺乏突破传统的动力，中国只有在面对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各种入侵时，才会被迫做出反应。

第五章 创新的含义

当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对于中国的历史做评价时，费正清写道：“在西方观察者的眼里，中国有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矛盾现象——人的个性异常丰富多彩，然而几乎没有人享有公民自由权的传统。”他认为，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原因在于“仍未冲破儒家思想的樊篱，不关心物质技术……中国学者未能制订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在逻辑弱点的背后，还有中国文字在作祟。”

论及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简单地说来，儒家的思想虽然使封建社会的古代中国繁荣昌盛，但同时也束缚了中国人理性与创造性的发挥与发展。这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2000 年大趋势》中说：“试看中国历史，最辉煌的时代就是没有意识形态框框的时代，例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发明最多。及至明清，仅容儒家一家之言，中国人的创造力便消失了。”

思维方式的问题与思维结构、思维机理和思维模式等问题相关，属于思维心理学的范畴。人的记忆力、智力，主要由人种的生理因素决定；概念的产生、判断和决策依赖于人的生存环境、社会实践和知识结构，思维与推理方式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总体来看，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依赖于所有上述的一切。

与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范畴相对应，文化上的范畴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哲学上的方法论是指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而文化上所讲的思维方式是指逻辑方式、推理方式、分析方式、思维的整体性与科学性等方面的特征。在逻辑方式上，中国人传统的思维特征是，以辩证逻辑替代了形式逻辑；以归纳推理替代了演绎推理；在分析方式上，中国人习惯于综合归纳、定性分析，而疏于细化分析和定量分析；此外，中国人思维上的总体特征还表现出静态、循环、内向和保守，缺乏动态、进化、外向和创造。

诚然，从哲学的角度看，辩证逻辑、归纳推理和综合归纳并非劣于形式逻辑、演绎推理和细化分析，彼此之间并无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当地把握彼此之间的度，才最为有利。然而，缺乏形式逻辑、演绎推理、细化分析、定量分析，以及整体思维方式中的静态、循环、内向和保守则肯定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缺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原因当然是与中国观念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自然、社会与经济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其一，中国古代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封闭的，中国较早地进入了封建社会，其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与封建主义的文化相互适应，因而缺少了创新的动力。其二，周边不存在可与强大的汉文化相提并论的其他更为先进的文化，无法从与强者的交流中获得启发和吸取益处。

有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例如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Nisbet）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的西方文明，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儒教和道教为主的中国文化，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中国人的认知以客观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主观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在对此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尼斯比特持有“思维地缘学”的观点，他认为：从生态背景上看，古代中国文明基于具有复杂等级的农业社会，强调的是等级与和谐，因而中国人思维取向是人际式的；而古希腊文明除去农业外，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因而为适应这种生态环境，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

当然，尼斯比特的观点并不一定全面，如果从哲学的整体角度看待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那么儒家明显地属于现实主义，道家属于超现

第五章 创新的含义

实主义，而西方式思维的突出特点是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进一步地说，现实主义当然要注重社会的实践和经验；超现实主义有可能更为客观和更具有前瞻性；而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一方面可能更具有创造力，另一方面则可能更为主观、教条和唯心。因此，关键在于适度和均衡。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有经验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其形成与几千年所使用的汉语和文化史密不可分。中国思维的局限性，不仅表现为近代中国在科学理论与技术学科方面的不足，而且还体现为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应用技术，以及艺术方面的缺失。在近代以后，如果说中国思维的内向和保守，是一种完美的封建主义和成功者的落后文化；那么西方思维的外向和进取，则是资本主义在封建与宗教的压迫下，谋求发展与变革的进步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日益强盛相反，由于在思维方式、逻辑和数学方面的缺失，中国文明在进入近代以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从来没有出现过；而可以称为思想革命的，也仅限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变革不但晚于西方，而且只能是被动地进行呢？原因是：①中国的封建主义过于完美，其生命力必然比西方的封建势力更顽强；②中国人不注重逻辑与数学，中国文化缺乏西方所具有的理性主义的科学精神；③中国所处的封闭的地理环境阻断了与强者的交流。

除上述原因以外，体现中国思维局限性的还包括，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中国人缺乏的还有正确地看待传统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在中国，对于儒学和孔子的争论持续了几百年，对于道家的认识不够深入，对于中医、中药、传统建筑、传统音乐不能批评，所有这些所能反映出的是对于东西方文化的优劣到底在哪里并不清楚。这里，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跨学科的人才。总而言之，正是由于存在于现实和历史之中的多方面的原因，才导

致近代以后，我国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上的发展落后。而要想改变这一局面，没有我国几代人付出艰苦卓越的努力是很难实现的。

五、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1969年第一届颁奖，到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总共已经进行了42届颁奖仪式。对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情况做一个分析，可以看到以下现象：

（1）获奖人员共有65人，其中美国有44人，占获奖总人数的67.6%，为绝大多数。其余人员，除去2个前苏联人和1个印度人外，都是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中国人至今尚无人获得此奖项。

（2）经济数学上的进展是该奖项重点关注的领域，其中涉及的内容有计量经济学、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数理统计学、帕累托最优理论、经济实证分析、现代计量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信息经济学和现代宏观经济学等。

（3）一些多元的复合经济学理论创新也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前沿。这些创新理论包括，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有关经济机制设计的数理经济学、有关个体和家庭行为的实证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甚至是用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经济产权的所谓“制度变迁理论”。

有关经济数学和所谓多元复合经济学是否有用，答案自然应当由实践做出判断。胡锦涛主席曾经发出树立“科学发展观”以及“科技创新”等号召。一方面，这些号召并非只是口号；另一方面，这些号召也并非只是对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学家和其他各行各业的社会工作者。

通过分析这些现象，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

长已经持续了 30 多年，为世界瞩目，但是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获取此奖项呢？既然美国人有能力不断地开拓新经济理论，为什么美国也不能避免发生在自己国家里的金融危机呢？并且，那些以数学为基础，不断创新出来的新经济理论和方法，真的那么实用和有效吗？而那些用数学模型所表达的经济机制和经济体制，也真的都具有可操作性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虽然并不容易，然而却十分必要。首先，如果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学家做一下对比，便可看到，美国的经济学家大都具有良好的经济数学知识，新经济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是由他们自己完成的。然而，在中国，经济数学一般只掌握在少数数学工作者的手中，一些甚至是非常有分量的经济学家的数学基础其实并不强，这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至今也不能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十分关键的原因。

另外，虽然美国的经济学家有能力不断地提出新的经济理论和方法，但是，美国却是一个主要为国家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社会，所以对于这种体制上的矛盾，经济学家是无能为力的，并且其他任何人也同样难以做到，这不但包括历史上曾经想有所作为的美国总统，也包括美国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这一次由美国引起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难道还不能说明这一点吗？

其次，涉及经济理论的创新，这一问题与经济学的分类有密切的相关性。目前我国经济学的分类十分繁杂，且并不完善和统一，大致分为 8 个大类、40 几个小类和 150 几个子类。8 个大类的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经济发展史、经济思想史、数理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另一种分类方法是按 3 个范畴，即理论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和边缘经济学，分为 7 个大类。7 个大类，是将政治经济学包括在理论经济学之内的。在 40 几个小类中，经济发展史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的所属小类比较多，其小类的设定基本上是按国别、地区、行业和历史来

划分的。

在经济学分类中存在的问题是，对于产业经济、技术经济和数理经济的处理比较混乱。产业经济，或者称其为行业经济、部门经济，实际上是相对于理论经济而言的，都应属于应用经济。而技术经济，既不属于理论经济学，也不属于应用经济，应当是指在应用经济中带有共性的技术性方法，如工程经济和数理经济，所以，技术经济应当被列为独立的门类，不应被包括在应用经济的范畴之内。

从经济学的分类中可以看出，理论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和边缘经济学这三大类的经济学比较重要。因为理论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全部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重点服务于政府经济决策；微观经济学以市场经济中其他主体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包括生产企业和消费者。

数理经济学包括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创建于19世纪70年代，属于量化的经济学，是经济理论、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三者的结合，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可操作性，以及预测功能，是当代发展最快的经济学分支。绝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对于经济理论的贡献几乎都集中在这个领域。因此，我国的经济学家如果希望赶超世界经济理论的水平，就必须在这个领域内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边缘经济学，是与人口学、教育学、法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以及能源、资源和环境等非经济学科相交叉的复合经济学。边缘经济学主要以这些非经济领域所具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研究对象。这里，边缘经济学应当是独立的经济学分支与前面所提到的所谓多元复合经济学的一个中间环节。由于多元复合经济学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学所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因此，从边缘经济学入手，向多元复合经济学迈进，也应当成为发展我国经济理论的必由之路。

目前，在实践方面，中国已经获得了 30 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的原因，在以上许多的经济学领域，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却一直走在世界的前面，而中国的经济学家，难道就没有决心改变这个现状吗？

六、高级“智库”的对比

2009 年 3 月 20 日，为提升国家“软课题”的研究能力和增强国家战略决策咨询服务的水平，由原国家“发改委”下属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合并组成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亮相。该机构成立的目的是，希望将国家的战略决策咨询水平能达到国际一流咨询机构的标准。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国家科学院（U. 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美国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欧洲联盟研究论坛（The European Union Research Forum, EURF）和欧洲联盟研究协会（The European Union Study Association, EUSA）等。

以上这 7 个所谓国际一流咨询机构的名单，是相关媒体在对此次会议做报道时提出的。而在专业的咨询界，一般国际公认的世界三大顶级咨询机构是：美国的兰德公司、欧洲的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和日本的野村证券株式会社（NOMURA SECURITIES）。

兰德公司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也是当今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之一。其研究范围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个方面。兰德公司现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有内部员工约 1 600 名，以及在社会聘用的各类专家、教授或特约顾问约 600 名。

兰德公司每年可以向其客户提交大约几百份研究报告，合同总额可以达到数千万美元。其中，按报告的内容划分，70% 是具有保密性质的客户化报告，30% 是公开的报告；按客户的构成划分，65% 属于美国联邦政府，包括美国的国防部、卫生部、人力资源部、教育部、国家科学基金、国家医学研究院、统计局等，35% 属于美国的州政府、外国政府、私营公司、提供资助的基金会等。

1950 年，兰德公司在美国军界高层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准确地发出了中国将出兵朝鲜的预测。1957 年，兰德公司在预测报告中，详细地推断出了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间，预测的结果与实际发射时间仅有两周之差，其准确程度令五角大楼震惊。此后，对于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重大国际事件的发生，兰德公司也都进行了成功的预测。此外，近年来，兰德公司的研究领域还包括中东问题、台湾问题、朝鲜问题，以及诸多技术性很强的课题，如航天、卫星、空间飞行器、计算机、人工智能、数值计算、网络、系统科学等。

罗马俱乐部成立于 1968 年 4 月，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是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其宗旨是研究有关全球性问题、人类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及未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制订和国际舆论导向提供有用和可靠的信息，以期达到提高公众的全球意识，促使国际组织和各国有关部门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并采取有效的行动或步骤，使人类摆脱所面临的困境。罗马俱乐部所注重的的问题包括全球的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资源、贫困、教育等。

罗马俱乐部的机构主要来自于欧洲 10 个国家中的大约 30 名的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国际组织的高级公务员等组成，成员限制在 300 人以内，以保持其小规模 and 松散的特点，其领导机构是一个 7 人执行委员会。罗马俱乐部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基金会的赞助和研究课题的拨款。其主要从事的活动有三种：①每年举办一次大型国际专题学术会议，以及其他一些不定期的小型学术讨论会；②以“人类困境”为研究目标，组织其成员进行系统研究，并撰写研究报告；③出版研究报告和有关学术著作。

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是《增长的极限》。该报告指出：由于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因此全球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世界有可能面临一场不可避免的大灾难。当时，该报告的出版在国际上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成为有关环境问题最畅销的出版物，销售量达到了 3 000 万册，并被翻译成 30 多种文字。此后，罗马俱乐部又连续发表了《人类处在转折点》、《重建国际秩序》、《超越浪费的时代》、《人类的目标》、《学无止境》、《微电子学和社会》等出版物。

在罗马俱乐部的影响下，美国、英国和日本等 13 个发达国家，也先后建立了本国的“罗马俱乐部”，并开展类似的研究活动。在国际学术界，罗马俱乐部被批评为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和极端的“马尔萨斯主义”色彩。而来自美国的指责，更将其看成是一个具有左倾政治倾向的组织。

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成立于 1925 年，是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也是全世界最大证券公司之一。2002 年，其股票和债券资产规模达到了 13.6 万亿日元，公司净利润达到 1 680 亿日元。目前，该公司有职工约 9 000 名，在全球 28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机构，在日本国内有 113 个分支机构。

野村证券的业务范围包括：①证券经纪业务，包括从事组织股票、债券的买卖；②投资金融业务，包括认购政府债券及日元外债，发行公司债券和股票等；③投资信托业务；④离岸金融业务，包括进行银团贷款、项目贷款、中长期外汇贷款及短期资金拆借等；⑤其他金融服务业务等。野村证券的发展战略是：保持其在全球金融机构中的竞争力，充分地利用民间的资本，确保盈利，继续向实现业务全球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此外，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时，没有被提及的国际重要咨询机构还有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简称 IISS）。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成立于 1958 年，地址设在伦敦，由学术界、政界、宗教界和新闻界人士发起创立，当时称布赖顿协会，主要研究核时代的国防安全和防务政策。

1964 年经过改组，该研究所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赠款资助，正式成立。成员来自欧、美和第三世界 80 多个国家的 2 200 多名工作会员和 200 多个集体会员，研究领域逐步扩大到政治、经济与和平等问题，研究地域由原来的北约防区扩展到中东、非洲及世界其他热点地区，但仍保持着突出军事战略研究的特色。

近年来，该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以国际军事情报为主的研究机构，其经费的 2/3 来自美、英、加拿大的基金会和研究机构。研究所的会员有四种：①战略、防务或安全问题上的专家；②现任政府官员；③团体会员，包括政府机构、学校、使馆、公司、研究机构、新闻界和报社等集体组织；④学生会员，包括学生、研究生和少校以下的低级军官。各类会员，每年要按规定交纳不同的会费。这其中，美国、英国的成员占 60% ~ 70%。研究所的理事会成员由欧洲、北美、中东、东亚以及太平洋等的 16 个国家组成，常设机构是国际性的。

研究所主要有四项功能：①分析各国国防安全与冲突，提出和发展新

第五章 创新的含义

的战略构想；②搜集和提供军队和安全方面的情报，以及供记者、分析人员和学者广泛使用的信息；③举办年会、讲座和学术会议，讨论国际战略问题；④发表出版物。其中，最为有名的出版物是《军事力量对比》、《战略研究》、《论丛》、《生存》、《国际安全研究》、《地区安全研究》和《战略形势报告》等著作。

研究所的主要活动有三项：①每年举办1次年会，讨论对未来政策和公众有影响的重大战略问题；②每年举行1次讲座，请一些重要的国际知名人物、政治家、学者给研究所的人员作演讲；③就当前国际上所关心的一些具体问题，每月至少为其会员组织两次讨论会，作为对大的讨论会的补充。

除上述综合性的国际著名咨询机构以外，在经济领域内，还有专门为企业提供经营管理战略咨询服务的3大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波士顿（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和贝恩咨询公司（Bain & Company）；以及诸多其他各类专门从事市场研究的公司。这些专业的咨询公司均可能成为一个大研究项目的合作伙伴，或者分包机构。

那么，如何来看待中国的“智库”与国际的高级“智库”各自的特点和彼此之间的差异？这里或许需要先回顾一下中国高级“智库”的前两届会议论坛。2006年11月7日，在北京举办了首届由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社科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智库”论坛，其目的是加强中国“智库”的建设和发展，为国家决策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咨询服务的范围以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为主。会上，有“中国十大著名智库”首次被推出。这十大智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十大智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服务于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智囊机构，咨询服务集中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则侧重于外交政策研究；中国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以国家的军事战略、军队建设与发展为研究方向。

“第二届中国智库论坛暨世界著名智库上海高峰会议”于2007年7月在上海举办，举办方是中国太平洋地区合作委员会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①2020年世界发展趋势展望；②世界主要“智库”的建设与作用。

2009年3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成立，实际上是继前两届中国“智库”论坛之后的又一次比较大的事件。其目的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力图进一步加强国家在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合作方面的研究。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之后，国内有业内人士认为：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看上去是两个相似的机构。前者可能侧重于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研究，后者可能侧重于国家短期的策略。这种分工，与后者的所谓超级“智库”的身份似乎不相称。②后者的所谓超级身份，目前似乎还是仅仅体现在管理层面上，其核心研究人员是否超级，仍不得而知。③在课题选择和研究方式上，后者目前似乎尚没有自己的研究课题，而课题的完成也是以招标方式购买研究成果为主。从而在机构的组织结构上，有头重脚轻之嫌。总之，在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是官方色彩与计划经济的氛围始终难以改变。

另外，国内也有专家对于我国高级“智库”的发展战略提出了质疑，

第五章 创新的含义

认为确立我国高级“智库”的发展方向，应当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考虑，不能只是简单地按所有制形式将“智库”分为官方、民间、半官半民三类，而对于其他方面的问题，诸如“智库”的研究方向、研究机制、业务模式、服务流程和人员构成等问题，都不做事先的考虑。

对于中国某些专家低水平的经济预测，新华社《瞭望》杂志也曾有过报道。《瞭望》文章所列举的实例是：2007年底，社科院某经济专家强调，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为4%，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落。然而，两个月后，中国的CPI先上升到8.7%，而后又急转直下，跌到2008年12月份的1.2%。

国内也有学者用一些实例介绍了美国高级咨询机构的核心价值观和操作流程，并对中外“智库”的不同做了比较。例如，布鲁金斯学有三个重要的核心价值观：①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解决方案；②保持经济独立与政治独立；③注重对于社会公众的舆论导向与影响力。其操作流程是，智库——媒体——国会——政府——政策出台。同时，该学者还指出：这也是政府的决策过程。在美国“智库”的核心价值观中，独立性很重要，因为只有将咨询机构完全独立于政府，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政府决策的“外脑”，才可能比较客观。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是，对于政府的课题，“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不敢说，敢说的却没有影响力”。因此，其咨询服务的质量很难得到保证。

凡事有利必有弊。表面上看，我国高级“智库”的成立，都是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组合而成的。这样做，一方面，组建的过程简单快捷；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为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又是可靠的。然而，实际上，这其中的弊病也非常明显：

(1) 由于我国政府所属研究机构是长期计划经济的产物，所以，与国外研究机构比较，其研究领域单一，缺乏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能力和水平。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2) 由于研究经费来自于政府，是有所保障的，所以其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差，同时其研究的效率也不可能高。

(3) 由于服务对象单一，所以其经营的理念不可能强，并且其研究机制、业务模式、服务流程也不可能先进。

(4) 由于受到上述各种因素共同的影响，所以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研究人员的素质也不可能高。

第六章 发展的逻辑

一、多元思维的模型

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J P Guilford）提出了一个“智力三维结构”的模型。其第一维是指智力有4个方面的内容，即图形、符号、语义和行为；第二维是指智力的5种操作，即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评价；第三维是指智力的6种产品，即单元、类别、关系、系统、转化和蕴涵。

分析一下吉尔福特的这个“智力三维结构”，其第一维实际上是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的，因为图形、符号、语义明显地属于对于信息的表达；其第二维是从行为理论出发的，是对于在第一维中所提到的行为的解释，因为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聚合思维和评价明显地是指人思维行为的过程和特征；而其第三维的内容完全可以用系统论来取代。由此可以看出，吉尔福特的所谓“智力三维结构”，就是一个多元思维的模型，而构造这个模型的要素是信息论、行为理论和系统论。

说到此，或许有必要回顾一下西方开拓技术方法论的历程。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西方的学术界先后创建了“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以及70年代以后

的所谓“分形、混沌和超循环”等理论，使“三论”、“新三论”的各种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将吉尔福特的“智力三维结构”与西方的各种技术方法论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两点不同：①吉尔福特是一个心理学家，而其他技术方法论的创建者则属于数学家、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其中数学家占据绝大多数；②吉尔福特的“智力三维结构”可以用“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来覆盖。相比之下，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吉尔福特忽略掉了控制论。控制论显然属于一种人—机结合的系统，这里有行为因素，也有目标对象。

通过对于“三论”内容的分析，这其中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①科学具有整体性结构，因此，研究问题必须使用多元思维的方法论。②数学、细化与量化仍然是全部分析与研究的基础和关键。③西方的这些技术方法论固然好，但同时也存在结构、层次和边界上的含混不清的缺陷。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分析，这与西方人的思维特征强于分析和量化，但却弱于逻辑的概括与归纳不无关系。④中国人虽然在逻辑的概括与归纳上具有强势，但是却在分析和量化方面处于弱势。毕竟是西方人创建了几乎所有的人类现代的科技文明。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涵盖了人伦道德、价值观、社会责任、为人处事、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内容；而道家思想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在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观念。按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分类，《道德经》的理论思维主要是形而上学、宇宙进化论、伦理学、政治学。儒家与道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关注到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不同之处在于，儒学以人生哲学为主，道家以认识论和自然哲学为主。与西方哲学文化比较，中国的哲学文化缺少了科学哲学。

说到此，也许有人会想到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中国文明的起点，这一时期当然是历史上的中国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和科技上最为灿烂、辉煌和空前繁荣的时期。但是，应当看到的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近代，以至当代，西方的科技文明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主导。在科技文明的道路上，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可以预料，如果通过认真地学习西方人在分析和量化方面的优势，并充分地结合本民族在概括与归纳上的优势，中国人当然有希望能在西方人所创建的理论基础之上进行一次现代技术方法论的革命，并将其成果应用于推进经济发展的实践。不过，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既不可能是单纯的数学家，也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学家，而只能是具有双重学问的“数理经济学家”。

二、技术方法的共性含义

从上文所引述的“智力三维结构”和所谓“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中，可以看出，两者基本具有同一性。其不同在于，前者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的，而后者是从物理学和工程技术的角度出发的。如果将两者综合，并做进一步的引申，然后再将其应用扩展到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领域，那么我们便可能得到一种具有共性含义的技术方法。

一位法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曾经说过：“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学到化学，生物学、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依据马克斯·普朗克的观点，显然全部的人类文明有一个完整和统一体系结构，这无论对于科学知识还是科学方法都一样。因为科学知识一方面是理论，另一方面也是方法。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因此，如果以拓展技术方法在经济和社会工程领域内的应用为目的，或许同样可以构造出一些所谓共性的方法：

(1) 结构分析，用于描述与分析客体的整体与局部的结构、层次以及外部边界；

(2) 动态分析，用于描述与确定客体的整体与局部的状态与动态特征；

(3) 系统分析，用于建立系统模型，确定系统的总体特征、控制目标与方案；

(4) 机制分析，用于揭示客体内部的关联性与相互作用；

(5) 趋势分析，用于把握客体的发展方向、发展阶段、状态演变与质态突变；

(6) 环境分析，用于确定外部因素对于客体的作用与影响；

(7) 量化分析，用于提高所有分析结论的精确性；

(8) 行为分析，用于描述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对于客体的作用与影响；

(9) 选择并确定数据、信息、观点和结论的表达方式。

物理学家钱学森曾经说过：整个自然科学都可以看成是广义的物理学。因为无论是天文学、化学，还是生物学，从对象上看，都只不过是对客观世界、处于不同层次结构的物质的研究。由于客观物质世界的本质特征、运动形态，以及物质在相互作用与联系中所反映出的功能，都与物质所处的空间层次与结构紧密相关，所以对自然科学的传统分类大都是以物质所处的层次、结构为依据的。

根据钱学森的观点，从物理学分类的方式来看，大部分的物理学属于“对象的”物理学，如基本粒子物理学、原子物理学和分子物理学等。此外，同样存在所谓“状态的”物理学和“功能的”物理学，如固体物理

学、等离子物理学和高能物理学。另外还可以有所谓“方法的”物理学和“边缘的”物理学，如统计物理学和物理哲学等。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法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就发表了《物理哲学》一书。2006 年，中国学者韩锋也写了一本《物理哲学》的书。此外，国际上还多次举办过有关物理哲学的研讨会。从科学知识的整体结构上看，物理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物理学与哲学交叉的边缘科学。那么，为什么要提及科学知识和物理学的分类，并且，在哲学与技术方法论之间又有何种联系呢？

如果综合钱学森和马克斯·普朗克的观点，既然整个自然科学都可以看成是广义的物理学，并且人类全部的理论知识就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那么，为什么不存在共性的技术方法呢？从哲学的本体论上说，作为人类全部知识的最高抽象，哲学概念的基本要素是物质的质、量、时间、空间和运动，而运动所反映出的是，处在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结构的物质之间存在的作用与联系。

这其中，“质”统称为物质与事物，存在于自然、人、社会的客观与主观的世界中；“量”的规定性可由人类全部的数学知识来体现；“运动”为物质与事物的根本属性，是区别不同物质与事物的唯一途径和方式；“时间”是物质与事物存在的维度之一，“空间”是物质与事物存在的另一维度，包括物理上的空间和抽象的空间，体现了整体与局部在结构上的联系；“作用与联系”既是事物运动的原因，又是物质与事物运动的结果，因为运动本身就是物质与事物的根本属性。

另外，涉及理论与方法的层次。理论的最高抽象是哲学，方法的最高抽象是方法论。所谓共性的技术方法是全部方法论的基础，由各门类学科自身特定的研究方法所共同构成，如数学中，应用纯理性的演绎推理方法；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应用理论推导、实验和实证方法，以及其

他多种方法，包括直观法、计算机模拟和专家系统等。

就哲学方法论而言，方法实际是人的逻辑思维与行为的结果。因而，所谓共性的技术方法，正是由哲学的基本要素所描述的完整的物质属性，即质、量、时间、空间（层次和结构）、运动，以及逻辑与行为综合的结果。不过，这种综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罗列和机械的拼凑，而是一种灵活和有机的结合。而如前文所述，涉及结构分析、状态分析、机制分析、环境分析、趋势分析、系统分析、量化分析、行为分析，以及选择并确定数据、信息、观点和结论的表达方式的共性技术方法，也正是由此推论出的结果。

应当指出的是：经济和社会问题，实际上比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问题更具复杂性，有更高的模糊度和不确定性，因而，对其观点与结论的推理与论证也更难把握。在经济学上，尤其是在国家的宏观经济领域，使用计量经济学、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理论方法，量化分析问题、推导结论和预测发展已获得比较普遍的应用。而在社会学上，尤其是涉及到带有社会工程性质的项目，目前使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尚不充分。原因是，由于社会事物具有质和量的多方面的规定性和不确定性，需要一种对高模糊度系统进行量化分析的手段，因而难度更大，更难把握。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本文所提及技术方法论，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在技术经济学中所采用的那些方法，而是指从“三论”、“新三论”等现代科学方法中抽象出来并带有共性含义的方法。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内容上，技术方法论与技术经济学有些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涉及到结构分析、机制分析和环境分析等，然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以提高经济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平为目的，后者以解决技术产品的应用为目的。换句话说，由于目的不同，结果将自然不会相同。前者是广义的，后者是狭义的。

三、结构、动态、系统

从哲学上说，物质与事物“质”的规定性具有时间、空间和运动的属性，因此分析物质与事物质态的方法，可以分为结构分析、动态分析和系统分析。结构是物质与事物存在的另一基本属性，是物质与事物的空间构成。结构具有层次和多种不同的组合，可以显示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蕴涵着一定质态下的动能、规律、秩序与特性。

传统的观念认为，物质的基本结构存在于3维的几何空间之内，但是现代科学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多维空间，甚至是非整数空间的存在。简单的例子是描述炮弹的飞行需要有7维空间，即在3维的几何空间中，再加入时间、空气的摩擦力、风力的作用和地球引力的作用等维度，而上述从理论物理学引申出来的分形和混沌理论，都阐述了分数维度的存在。或许，这个所谓分数维度的概念与维度的权重有关。不过，情况究竟是否如此，大概只能由物理学家给出解释。

运动是物质与事物存在的基本形态和特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作为维度的。哲学家们说，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唯一不变的就是运动，因为运动是世界上唯一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东西。动态分析的其他语义是机制分析、机理分析和动能分析，强调的是物质与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

至于与系统分析相关的许多内容，实际上在前文引述的“三论”、“新三论”，以及“分形、混沌和超循环”等技术方法论中有所介绍。如果将这些技术方法论的理论再做进一步的归纳和简化，便可以构造出所谓共性的系统分析方法。

从现代系统动力学的观点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由动态发展变化着

的系统构成，每一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又可按横向和纵向扩展为不同的子系统。如果将人类的全部科学知识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并用模型来描述科学知识的整体结构及其相关性，或许图 6-1 可以作为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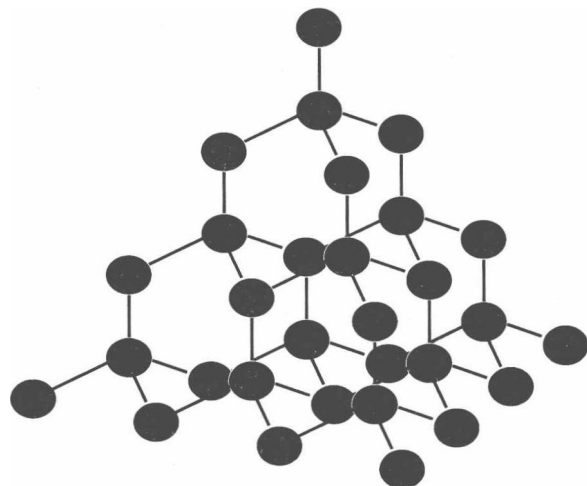


图 6-1 金刚石的碳原子空间结构

学习过化学的人都知道。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碳原子（C）的原子序数为 6，有 2 个电子层。其中第一电子层（内层）由 2 个电子构成，第二电子层由 4 个电子构成。由于每个碳原子外层的 4 个自由电子与周边的 4 个碳原子的外层自由电子构成了共价键，所以才使金刚石具有非常稳定的立方晶体结构。在这个空间网络结构中，人类科学知识所涉及的任何范畴，都可以被看成是这个等距立体空间点阵中的一个节点，并且每 1 个节点都与其他 4 个相临的节点保持等距离，形成一个空间正立体三角形。这些节点既不可能独立存在，也不可能失去与其他节点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人类的全部科学知识就是由这些相互关联的、无限多的节点所构成。

而这些节点群被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或子系统，完全是根据需要由人为设定的。

当然，用金刚石的碳原子结构来比喻客观物质世界的系统结构，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采用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在客观世界中，各种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是极其复杂和多变的，绝不可能是机械式的和静态的。为了进一步把问题说清楚，或许很有必要将金刚石的碳原子结构与人脑做一下比较。两者之间的相同是显而易见的，都是一种由多节点相互联结所构成的空间立体结构。两者的不同至少有三点：

(1) 人脑大约由 1 000 亿个神经细胞（神经元）构成，仅大脑皮层就有约 140 亿个神经元。按形态与功能划分，神经元有输入神经元、传出神经元和连体神经元三类。神经元之间的联结方式更为复杂，由生物电化学触发，形成瞬时回路，而不是由自由电子构成共价键。

(2) 神经元之间仅通过突触互相接触，在结构上并没有原生质相连。

(3) 每个神经元又与 $10^2 \sim 10^4$ 个其他神经元联结，构成极其复杂的空间网络结构。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系统结构以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而言，金刚石的碳原子结构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简化的模型，而人脑则是一种更为接近的模型。

四、机制、趋势、环境

除去语言文字以外，如果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待学术研究的表达法，一般常用的方式有系列表格、平面曲线图形、数学公式与表达式等，而诸如时序图、逻辑框图、路径与流量图或模型图等，则大多只在计算机设计和工程技术中使用，并没有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使用。

其实，学术方法上的这种不足，不仅是一种表达法上的缺失，同时也是一种思考方法和研究方法上的缺失。比如，在上文提及的共性技术方法中，用于揭示目标系统内部的关联性与相互作用的机制分析，以及用于建立系统模型，确定总体和局部的控制目标与方案的系统分析，均可能需要使用时序图、逻辑框图、路径与流量图或模型图等。举例来看，对于图 6-2 所表达的内容来说，用图形来描述，显然要比用语言描述更为简单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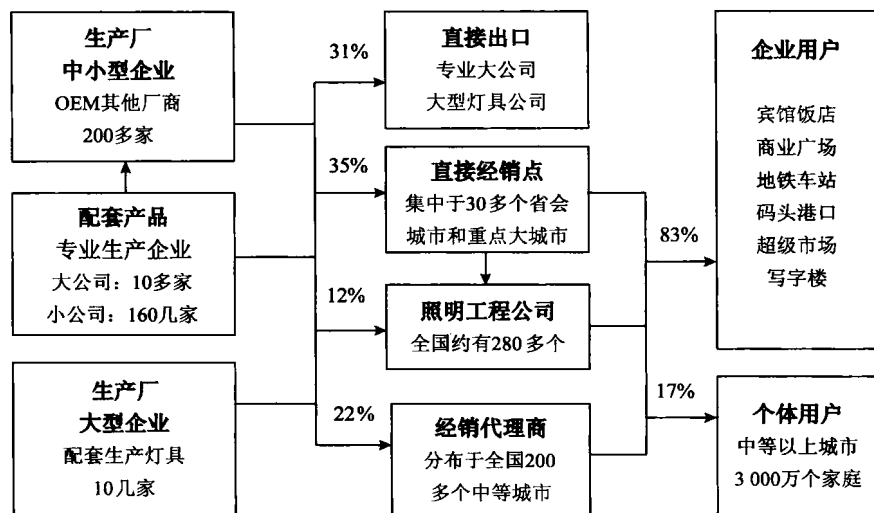


图 6-2 某电子产品的市场销售流向

图 6-2 仅是对于某种商品的市场流通情况的描述。如果要做的事情是对于一个经济或社会工程项目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可想而知，其信息量、工作量以及复杂程度必定要增加很多，例如前文所提到的有关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综合国力和美元等问题都会如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的方法必须从单纯地依靠传统的市场学，或是技术经济学的方法，提高到技术方法论的层次上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就是，“方法决定结论，细节决定成败”。

趋势分析是从时间的维度，考察物质与事物在质与量上发展变化的连续性、传递性和因果关系，是更为广义的历史概念。应用趋势分析同应用其他一切技术方法一样，决不是孤立和单一的，因为所有的技术方法论的内涵所构成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所以，趋势分析也不可能脱离结构分析、动态分析、系统分析和量化分析。趋势分析，一方面所要体现的是，物质与事物在某一种结构下的状态；另一方面所要体现的是，物质与事物的原有结构，在经过了动态的演变之后，所产生新的质态结构的过程。换言之，趋势性分析也是动态分析与发展分析，可应用于物质与事物的发展预测。前文在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论述中所引用的技术分析均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

五、行为与表达

从技术方法论的角度看，人的社会行为有三种含义。其一，是指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自身的思维、推理、论证和表达的行为方式，既要符合逻辑规律，又要有科学性；其二，是指对于市场主体，包括政府、供应商和消费者深入和细致的行为分析；其三，是指从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出发，对于由经济或社会工程所构成的人-机系统的目标管理。

逻辑思维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形式。涉及人类思维的逻辑方式，在概念和理论的体系中，横向的扩展是系统的维度，纵向的扩展是系统抽象的级。有一种看法，把人类思维方式的进程分为五类：直觉的模糊思维、定性的归纳推理、精确的定量分析、全面的系统动态分析和多维度、多层级的辩证推理。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表面上看，多维度和多层级的辩证推理与直觉的模糊推理十分相像，但实质上却已有了质的飞跃。如果按以上所说，将人类思维方式的五个进程看成一把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尺子，去衡量一下我们的经济研究，就会发现，我们的经济学术水平仍然还是处于低级阶段。

涉及到逻辑与数学的关系，有人说科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但实际上并不全面，这仅是为了强调数学的重要性，而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语言是以逻辑为基础的。语言逻辑是人类所有语言所必须共同遵循的基本规范。是数学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逻辑建立在数学之上。

另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关于人的逻辑思维与行为。传统的行为科学以动物行为为研究对象，包括动物生理、动物心理和动物的社会行为活动。而对行为科学的一种狭义的解释，又被限定在管理科学的范畴之内，成为应用学科。因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是复杂的和有层次的，并且不能仅被局限于管理的范畴之内，所以人类社会行为学，应当是建立在对个体的人、群体的人和社会的人的全面研究基础之上的。

生理行为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方式，包括生殖繁衍、生长发育、新陈代谢、运动、休息和安全等需要。在生理行为的驱使和诱发下，人的行为沿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从生理行为、心理行为到精神行为，即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涉足的范畴；另一个是从个体的生理行为、物质生活到群体的社会生活，即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所关注的范畴。这里，物质生活包括为满足衣、食、住、行等生活需要，以及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包括工作、娱乐、交际，以及人类从事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科学、教育、外交、政治、军事等社会活动。这其中，物质生活和经济活动是人类所有社会行为的基础。

人类社会进入 20 世纪以来，哲学界认为，除了运动是物质的一个基本属性以外，信息是物质的另一属性，是存在于事物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与联系。而当代的科学家们的看法是，信息通过一定的载体，如运动、能量

等进行传递，是物质与物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相互联系。信息是一种区别于材料和能量的独立的、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人类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由材料、能源和信息技术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物质、能量、信息都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资源，其中，物质和能量是基本资源，信息则是一种高级资源。物质资源能够供给各种材料，能量资源能够提供各种动力，而信息资源则能够提供给人类的是知识，并且信息是可以度量的。

人类的认识与行为，离不开对于信息的获取、变换、加工、处理和利用。在信息处理的过程中，人类通过对于信息的记录、传递，再现物质世界的方式与方法就是表达法。表达通过信息处理去完成，信息是表达的“语言”。客观世界信息的来源虽不同，但最终能通过对信息本质的揭示，寻求一种可被普遍接受的信息传递方式。人的语言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信号系统，而表达法正是包含了对信息的处理、转换，以及对信息的“构造”两个方面的内容。从综合的角度看，信息论不但具有系统分析的价值，而且也具有表达的行为价值。信息论实际就是科学的语言和科学表达的基础。

六、有关定量分析

萨缪尔森在其第12版《经济学》的绪论中，将经济学称为“社会科学之王”。在论及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时，他写道：“政治学、心理学和人类学都是和经济学有一定共同内容的社会科学。……在许多其他与经济学有关的学科中，统计学是特别重要的。……在经济学领域中，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也有许多极其重要的用途。然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仅仅需要逻辑推理。”

在上述的评论中，萨缪尔森清楚地描述了经济学的外部边界和内部核心。依照他的观点，统计学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而逻辑推理是一切学科的基础。那么，什么是数学呢？经济数学包含了哪些内容，又能解决哪些问题呢？

数学以物质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为研究对象，是一种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的学科。数学研究舍去了事物的具体形态，表现出的是事物纯粹量的概念，但却反映了事物的多样性在量的方面的联系和统一性。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存在于各种物质的运动形态中，只有通过对于物质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描述，才可能把握物质的运动性质、变化和规定性。

说到数学的重要性，哲学家和科学家可引用的名言已经有很多了，因此，也许再听一听经济学家的观点可能更有必要。现任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说：“数学确实可以把用语言逻辑不容易说严谨的问题说得很严谨，……我认为数学是加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数学是一种人力资本，目前国内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掌握数学，包括我自己。”“领导世界经济学思潮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出现在世界经济中心工作的当地或是外国学者。……所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将会随着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而逐渐转移到中国来，我们将会迎来世界的经济学大师辈出于中国的时代的到来。”

有关经济数学所包含的内容及能解决的问题，可以从其使用定量分析的数学工具和方式上来描述。在经济领域内，定量分析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1) 使用线型与非线型的二次函数，描述两个经济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如在供给函数中，反映供给与价格的正相关关系，在消费函数中，反映消费与价格的负相关关系，以及在宏观经济中，反映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的各类二次函数等；

(2) 使用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反映可用增长曲线描述的人口繁衍和复利现象；

(3) 应用微积分理论，计算成本函数中的边际成本；

(4) 应用线性代数理论，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测算由生产数量与成本之间的关系所导致的盈亏平衡点；

(5) 应用离散数学中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论，测算产品的质量合格率与废品率，求导由随机变量所构成的一元或多元的线性回归方程，用于解决如保险理赔、电话呼叫服务的发生频率和产品使用寿命等问题；

(6) 为解决人口、交通、环境、生态和宏观经济的调控等问题，建立几何模型、矩阵模型、微分方程模型、联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图论模型、规划模型和马式链模型等各类数学模型，以及使用白箱理论、灰箱理论和黑箱理论，解决带有模糊数学性质的经济问题。

当然，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定量分析不等于简单地引用单项的统计数值或数据，如 CPI、PPI、PMI、GDP 的数据等。

做定量分析的目的在于预测，而做预测的目的在于制定战略。有关具有普遍性的预测方法一般可分为以下四类：

(1) 定性预测法，即以人的逻辑判断为主的主观经验推测法，包括德尔菲（Delphi）法、类比分析法、加权平均法、集合意见法、形态分析法等，以强调状态为主。

(2) 因果关系预测法，即通过机理、机制或相关性分析预测。实际上，这是另一种以强调动态过程为主的逻辑分析方法。

(3) 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方法，包括移动平均分析、趋势分析、周期分析等，属于单维度数值化的动态过程分析。

(4) 定量预测法，即纯数学化的预测方法，包括数理统计、回归分析、非线性趋势分析、模型化方法等。

以上这四类预测方法并非是互不相干的，比如，在时间序列预测方法中，也都会采用定量的数学分析方法，并且，这里所提及的一些技术分析方法和预测方法，应用中也并非绝对没有误差，引述的目的仅在于为了强调治学态度、治学理念和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研究方法、分析方法、数据处理方法、预测方法、决策方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处理数据是预测的基础，而为决策管理服务是预测的目的。预测是制订战略的基础，没有预测的战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没有定量分析的预测也不是预测。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除经济理论以外，高水平的经济学家还必须掌握对于市场学方面的知识，并且对于技术方法论也应当有深入的研究。否则，对于我国的经济学家而言，赶超西方的经济理论家，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将成为一句空话！

主要参考书目

1.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货币数量论——一个重新表述》，1956 年
2. 周林，《科学家论方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年
3. 黄顺基，《大动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
4. 江南文化书院黄山分院，《道德经》，老子，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年
5. 黄顺基、李庆臻，《大动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
6. 保罗·A·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美），《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 年
7. 皮亚杰（Jean Piaget）（瑞士），《行为，进化的原动力》，商务印书馆，1992 年
8. 黄硕风，《综合国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9. 王杏芳、和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时事出版社，1992 年
10. 许晓峰，《技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年
11. 中国人民大学证券研究所，《证券与证券市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2.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德），《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

财富的量化分析——透视市场的真相

版社，1997 年

13. 乔迪，《兰德决策》，天地出版社，1998 年
14. 高键，《罗马俱乐部决断力》，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 年
15. Gilbert A. Churchill (USA)，《Marketing Value for Customers》，McGraw-Hill Company，1998
16. Alex Miller (USA)，《Strategic Management》，Third Edition McGraw-Hill Company，1998
17. 洪毅等，《经济数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年
18. 罗龙昌，《房地产业宏观管理》，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年
19. 张保法，《经济计量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年
20. 钟茂初，《微观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年
21. 李子奈，《计量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
22. 龙永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23. 弗朗西斯·X·迪博尔德 (Francis X. Diebold) (美)，《经济预测》，中信出版社，2003 年
24. 黄柏中，《螺旋规律》，地震出版社，2004 年
25. 张保法，《经济预测与经济决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年
26. 马丁·怀特 (Martin Wight) (英)，《权利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年
27.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美)，《大抉择》，新华出版社，2005 年
28. 约翰·斯蒂尔·戈登 (John Steele Gordon) (美国)，《伟大的博弈》，中信出版社，2005 年
29. 于歌，《美国的本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年
30. 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31. 胡宗山,《中国的和平崛起:理论、历史与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32. 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33. 杨亦乔,《房地产开发经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
34. 拉菲·巴特拉(Ravi Batra)(美),《格林斯潘的骗局》,中信出版社,2006年
35. 宋鸿兵,《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年
36. 李雨青,《立体操盘绝技》,海南出版社,2007年
37. 尚真,《看盘》,学林出版社,2007年
38. 斯蒂文·李柏(Stephen Leeb)、格伦·斯特拉西(Glen Strathy)(美),《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东方出版社,2008年
39. 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
40. 彼得·D·希夫等(Peter D. Schiff)(美),《美元大崩溃》,中信出版社,2008年
4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
42. 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德),《物理哲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
43. 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美),《金融帝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44. 威廉恩·道尔(F William Engdahl)(美),《石油战争》,2008年
45. 廖子光(美),《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46. 伊森·哈里斯(Ethan S Harris)(美),《伯南克的美联储》,2009年
47. 第一财经日报,《拯救全球金融》,中信出版社,2009年

48. 法里德·扎卡利亚 (Fareed Zakaria) (美),《后美国世界》,中信出版社,2009 年
49. 叶檀,《中国房地产战争》,山西出版集团,2009 年
50. 陈佳贵、李扬,《2010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
51. 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年
52. 唐风,《货币博弈》,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 年
53. 威廉·波纳、安迪森·维金 (William Bonner & Addison Wiggin) (美),《债务帝国》,中信出版社,2009 年
54. 罗伯特·库特纳 (Robert Kuttner) (美),《大国的陷落》,中信出版社,2009 年
55. 张键,《房地产理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年
56. 迈克尔·J·庞兹内 (Michael J. Panzner) (美),《当美国倒下》,中信出版社,2010 年
57. 刘军洛,《被绑架的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2010 年
58. 记录片《华尔街》主创团队,《华尔街》,中国商务出版社,2010 年
59. 何造中,《波浪理论新解》,广东经济出版社,2010 年
60. 何造中,《江恩数字与几何学》,机械出版社,2010 年
61. 陈佳贵、李扬,《2011 年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
62. 李扬、王国刚,《中国金融发展报告 (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
63. 资源问题研究会 (日),《世界资源的真相》,新世界出版社,2010 年
64. 马丁·雅克 (Martijn Jacques) (英),《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 年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Wealth

财富的量化分析

——透视市场的真相

科学一方面是理论，另一方面是方法。理论与方法既具有相对性，又具有统一性，人类的思维就是理论与方法的统一。

哲学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同时也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当哲学作为一个学术上的字眼停留在课堂和书本上时，它仅仅是一些概念；而当哲学作为一种行为的原则和目标时，它其实就是战略。

美元的贬值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美国可以借此赖掉大量的债务；另一方面，美国也能通过战略储备资源的增值，使其存量财富的总值得到大幅度的增加。

从长期看，作为一种终极的信用货币，黄金既是一种政治金属，也是一种终将枯竭的矿产资源；既是一种避险工具，也是一种度量工具；既是一种输出，也是一种输入。

图书上架建议 经济类

ISBN 978-7-80255-938-7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17号 邮政编码：100048
编辑热线：010-68701074, 68701661 网址：<http://www.emph.cn>
购书热线：010-68701638, 68701816, 68701073, 68417763, 68414644

定价：36.00元

ISBN 978-7-80255-938-7



9 787802 559387 >